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之一〇六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

澤登巴爾時期外蒙與中共
的關係（1952-1984）

藍美華 著

* 係個人研究，不代表機關立場 *

序 言

小時候，筆者認為蒙古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對「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大漠萬頃、草原千里的景象充滿嚮往，總期待有朝一日能夠踏上這片土地。殆年紀稍長、閱讀了一些與蒙古相關的書籍後，發現地理書上的「蒙古地方」早已變成「蒙古人民共和國」，心中十分震撼，極想了解中國失去外蒙的原因，因此對蒙古近代史產生濃厚興趣，在就讀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時，就選定以外蒙與中共的關係作為碩士論文研究主題。這篇論文就是由該論文稍作增修而成。

當時筆者為了避免陷入漢族主義的泥沼，希望設身處地，以外蒙為主體，因此將論文題目訂為「外蒙與中共關係之研究」，而非「中共與外蒙關係之研究」。如今增修後，改以「澤登巴爾時期外蒙與中共的關係」為題，稍作區分。由於該碩士論文完成於 1986 年，距今已有十餘年，重讀下當然無法令自己滿意，但論文完成多年以來，卻也是筆者自己需要或答覆別人詢問時常用的參考資料之一。因此，將其正式出版，可能也不是件沒有意義的事。至於論文的修訂，若要達到讓自己滿意的地步，可能得花上一兩年時間才可完成，而筆者目前另有其他蒙古研究課題，因此，決定僅就原有內容稍作增修。

本論文中所用「外蒙」一詞，主要係指「蒙古人民共和國」，「中共」一詞主要係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在少

數提及黨的關係之處指「中國共產黨」，至於「蒙共」一詞係指「蒙古人民革命黨」。在研究範圍方面，時間上是以1952-1984年澤登巴爾統治外蒙時期為主，而在第一章將1921至1952年的外蒙情況作背景式的介紹。研究項目包括外蒙與中共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的關係，而中共、蘇聯關係的發展情形對外蒙、中共關係的發展影響重大，因此在論文中也須作一概略介紹。

本論文試圖透過對澤登巴爾主政期間外蒙與中共關係的探討，進一步了解外蒙此一時期的歷史發展。外蒙如何在中共、蘇聯夾縫中求生存？中共、蘇聯的關係對外蒙、中共關係的發展有何影響？外蒙在對外關係上是否只能扮演被動的角色？本論文或許可以對這些問題提供部分答案。

本論文得以完成，除筆者當年的碩士論文指導教授李毓澍先生外，畢英賢、唐屹、葛敦華、蘇起數位老師曾給予協助，口試委員王明孫、趙春山老師提供了有用的意見；增修後的文稿，在蒙藏委員會的例行討論會中王吉林、王章陵、孫子和、廖淑馨、黃麗生、胡其德諸位先生均提供了寶貴的意見，在此一併致謝。當然，論文處理上，由於個人才力所限，不無顧此失彼、零亂脫落之處，祈望讀者不吝賜正。而論文中若有任何錯誤，均由筆者自行負責。

民國 89 年 8 月 9 日於政大

目 錄

論文提要

序言

第一章	一九二一至一九五二年的外蒙	1
	溫和派掌權時期的外蒙(1921-1928)	3
	從激進再到緩進時期的外蒙(1928-1940)	8
	喬巴山主政時期的外蒙(1940-1952)	15
第二章	進展中的外蒙與中共關係(1952-1960)	21
	外蒙與中共關係的積極開展	23
	中蘇共關係的變化及其影響	37
第三章	從搖擺到惡化的外蒙與中共關係(1960-1966)	47
	搖擺中的外蒙與中共關係(1960-1963)	47
	外蒙與中共關係開始惡化(1963-1966)	59
第四章	持續惡化中的外蒙與中共關係(1966-1978)	71
	文革浪潮沖激下的外蒙與中共關係(1966-1969) ...	71
	七〇年代的外蒙與中共關係(1969-1979)	84
第五章	中蘇共和解談判下的外蒙與中共關係(1979-1984) ..	97
	量增質低的外蒙與中共關係	97
	澤登巴爾下台事件與外蒙、中共關係	109
第六章	結論	119
附表 1	：外蒙駐中共歷任大使	127
附表 2	：中共駐外蒙歷任大使	125
附表 3	：外蒙與中共 1952-1984 年期間簽訂的條約、協定 一覽表	126
參考書目	133

第一章 一九二一至一九五二年的外蒙

二十世紀初，革命浪潮席捲亞洲，亞洲領土最廣的兩個國家—中國、俄國—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1905年10月，俄皇尼古拉二世發表「十月宣言」(October Manifesto)，承諾將儘速召開杜馬議會(Duma，即國會)，實施憲政，結束君主專制政體。¹然而示威動亂並未就此停息，終於在1917年由布爾什維克(the Bolsheviks)奪得政權，在俄國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共產政權。而在中國，滿清已至強弩之末，1912年初清帝退位，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也誕生了。

中俄兩國的革命對後來世界情勢的發展產生莫大影響，而外蒙也因為不滿清廷在其統治末期對蒙古地區增強政治控制、推行殖民政策，加上受到中俄革命浪潮的鼓舞，藉著清廷自顧不暇的機會，在1911年12月宣布獨立，²成立了新政

註 1 David MacKenzie、Michael W. Curran 著，蔡百銓譯，《俄羅斯·蘇聯·與其後的歷史》(台北：國立編譯館，民 84)，下冊，頁 652-653。

註 2 12月1日外蒙臨時政府發表告人民書，宣布獨立，12月28日哲布尊丹巴正式登基成為大汗。告人民書的原文內容，參見 Urgunge Onon and Derrick Pritchatt, *Asia's First Modern Revolution; Mongolia Proclaims its Independence in 1911* (New York: E. J. Brill, 1989), pp. 127-130; *Mongolyn ard түмний 1911 оны үндэсний эрх чөлөө, тусгаар тогтнолын төлөө тэмцэл, баримт бичгийн эмхэтгэл* (1900-1914) (Ulaanbaatar: Ulsyn Khevelelin Gazar, 1982), 110-111; 簡略的中文譯文，則可參見唐在禮、唐在章，《蒙古風雲錄》，南昌，民 1，頁 5 下 -6 下。有關登基大典，參見 G. Navaannamzhil, *Övgөн бичеэчиин үгүүлэл* (Ulaanbaatar: Ulsyn Khevelelin Gazar, 1956), 185; L. Dindub (Dendeв), *Mongghol-un tobchi teuke*, 頁 26，此書 1934 年在烏蘭巴托出版，後於 1977 年由 Bloomington 的蒙古協會 (Mongolia Society) 以 *A Brief History of Mongolia in the Autonomous Period* 為題重印，由 Gombojab Hangin 撰寫導讀，並加上索引，收為 The Mongolia Society Special Papers, Issue 6。

府。但因隨後在 1915 年簽訂的「中俄蒙恰克圖協約」中，規定中國對外蒙擁有宗主權，³於是外蒙就被視為自治。

1911-1919 年的自治階段，外蒙社會並未有根本的改變，政權仍掌握在以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Jebtsundamba Khutughtu) 為首的喇嘛手上。⁴在此期間遭逢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本土革命勢力蓬勃發展，沙皇政府自顧不暇，無力過問外蒙之事，加上中國政府西北籌邊使徐樹錚採用強硬手段，外蒙終於在 1919 年撤消自治。⁵

徐樹錚在外蒙採用的激烈手段，雖使外蒙撤消自治，但反華之心再度增強，而中國本身又因軍閥割據而未能統一，加以新成立的俄國共產政府的誘助，外蒙遂於 1921 年 7 月再次宣告獨立。⁶

以下筆者就按時間先後順序，把 1921 至 1952 年分成三期，介紹外蒙各期的發展情形，以有助於本篇論文正文的敘述。

註 3 畢桂芳，《外蒙交涉始末記》（台北：文海出版社，民 57），頁 39-40。陳崇祖，《外蒙古近世史》（民 11；台北：文海出版社，民 54），第二篇，頁 56。

註 4 Barry George Bartow, "The Policy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Toward China, 1952-1973," (Ph.D. Dissertation,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1974) p. 8.

註 5 關於外蒙撤治問題，詳見李毓樹著，《外蒙古撤治問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65 年 12 月，再版）一書。

註 6 1921 年 7 月 11 日，外蒙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參見茲拉特金著，陳大維譯，《蒙古人民共和國發展史》（北京：時代出版社，1953，三刷），頁 138。

溫和派掌權時期的外蒙（1921-1928）

1921-1924 年的外蒙政府，因民衆對藏傳佛教的信仰仍深，所以仍保留以哲布尊丹巴爲大汗的君主政體，稱爲「蒙古人民國」，但哲佛的權力已大受限制。⁷

「蒙古人民國」成立之初，內部就不平靜，反抗、整肅之事層出不窮。1922 年博多（D. Bodo）及其他十四人遭到整肅槍殺。這些人均曾擔任要職，和哲佛及寺院關係密切，是保守派及強烈愛國者。⁸博多更在政府中擔任總理及外交部長之職。⁹可是昔日的顯貴，今日皆成階下囚，連哲佛爲自保起見也不得不公開指責他們爲賣國賊。¹⁰他們被控企圖顛覆「人民政府」，重建附屬於中國的自治政府，和中國政府、美國領事、白軍、張作霖互通聲氣，又組織科布多地區喇嘛的暴動。¹¹

1924 年，功業彪炳、身任蒙共中央委員會主席、財政部長的丹增（S. Danzan）也遭到和博多同樣的命運，因爲他企圖背離蘇聯，和中國建立關係。¹²他在蒙共第三次代表大會的

註 7 《蒙古人民共和國發展史》，頁 135-136。

註 8 Robert A. 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1964), vol. 1, p. 192.

註 9 William A. Brown and Urgunge Onon, trans., *History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54.

註 10 Charles R. Bawden, *The Modern History of Mongolia*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8), p. 237.

註 11 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192.

註 12 同前註，p. 193.

開幕詞中請求真正獨立，更震驚了蘇聯的觀察員，結果被控為日本間諜，遭到槍決。¹³

儘管被整肅者多為溫和派民族主義分子，但這些整肅行動並不是基於政治意識之相左，而是權力鬥爭的結果。譬如丹增是由左派的倫琴諾（E. Rinchino）和右派的丹巴多爾濟（Ts. Dambadorj）在蒙共第三次代表大會中整垮的，此二人觀點不同，但為了自己的權力，可以聯手對付丹增。¹⁴這就是共產黨所謂的統戰：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

1924年5月20日哲布尊丹巴去世，¹⁵高層喇嘛們要求批准尋找活佛的繼任者。蒙共內部雖已決定不再讓哲佛轉世，但為了權力的穩固，不便立即禁止，直到1929年才正式宣布廢除呼畢勒罕制（*Khubilgaan*，即活佛轉世），不准哲布尊丹巴及其他活佛轉世。¹⁶哲佛的死為蒙共解決了政體的問題，蒙共中委會通過實行共和政體的決議，於6月13日由「人民政府」宣布外蒙為共和國，不設總統，共和國最高權力屬於大呼拉爾（*Ikh Khural*）。¹⁷

註 13 鐵瑞夫·杜畢著，扁舟、若如譯，《外蒙共黨之真相》（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 64），頁 81、534；Trevor N. Dupuy and others, *Area Handbook for Mongolia*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0), pp. 64, 421.

註 14 Bawden, *op. cit.*, p. 276.

註 15 《蒙古人民共和國發展史》，頁 157。

註 16 Bawden, *op. cit.*, pp. 261, 263.

註 17 《蒙古人民共和國發展史》，頁 157。雖說最高權力屬於大呼拉爾，其實它只是行使同意權，一切仍由黨中央來決定。

哲佛死後，蒙共在 8 月召開了第三次代表大會，¹⁸ 制定了黨的總路線，接受了列寧所說外蒙可超過資本主義直接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前進的說法，認為黨當時的直接任務是為將來逐漸過渡到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打下基礎。此次大會並把「蒙古人民黨」更名為「蒙古人民革命黨」。¹⁹ 當然，丹增的被整肅也是此次大會的重頭戲。

1924 年 11 月 8 日召開了第一屆大呼拉爾，26 日通過了「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部憲法。²⁰ 這部憲法是仿照 1918 年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RSFSR）的憲法制定的，政府結構也仿照蘇聯的模式。²¹ 會中並決定把首都庫倫更名為烏蘭巴托（Ulaanbaatar，意為紅色英雄）。²²

外蒙在 1921 年 7 月宣布獨立後，蘇維埃政權就於 11 月 5 日和其在莫斯科簽訂「俄蒙修好協約」，互相承認對方是各自領土上的唯一合法政府。²³ 俄國的這種作法等於承認外蒙獨

註 18 第一次代表大會是在 1921 年 3 月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是在 1923 年 7 月召開。

註 19 《蒙古人民共和國發展史》，頁 158。

註 20 內容參見楊汝舟著，《外蒙共黨之今昔》（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 63），頁 374-381。

註 21 M. T. Haggard, "Mongolia: The First Communist State in Asia," in Robert A. Scalapino, e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Asia: Tactics, Goals, and Achievement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69), p. 88.

註 22 《蒙古人民共和國發展史》，頁 163。

註 23 中俄交涉公署編，《中俄會議參考文件》，第肆類，中俄協商草案（台北：文海出版社，民 58），頁 43-45；Institut Narodov Azii Akademiia Nauk SSSR, *Sovetsko-mongol'skie otnosheniia 1921-1966, sbornik dokumentov* (Moscow: Nauka, 1966), p. 13。1923 年 7 月才正式組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所以在此之後才可用「蘇聯」一詞。

立，違反了 1915 年「中俄蒙協約」中國對外蒙擁有宗主權的規定。此外，紅軍自 1921 年進駐外蒙後，²⁴ 遲不撤軍，想進一步鞏固俄國在外蒙的勢力。²⁵ 中蘇雙方於 1924 年 5 月底簽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中國承認蘇聯政府，而蘇聯答應自外蒙完全撤軍，並承認外蒙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²⁶

蘇聯承認中國對外蒙的宗主權，事實上也是為其本身利益打算，因為如此一來就可阻止外蒙與中俄以外的其他國家發生政治上的接觸。²⁷ 而蘇聯雖與中國簽約，但事實上仍將外蒙視為一獨立國家，²⁸ 而外蒙對於中蘇協定的內容根本毫不理會，所以才會有通過憲法，宣布外蒙為一「獨立的人民共和國」²⁹ 的作法。

註 24 《蒙古人民共和國發展史》，頁 135。另蘇聯說是應外蒙之請而把軍隊進駐外蒙，可是實際情況是否如此，值得懷疑。參見 George G. S. Murphy, *Soviet Mongolia* (Berkeley and L. 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pp. 10-11.

註 25 蘇聯想阻止中國勢力重返外蒙，怕中國軍隊回駐，而且藉以防止外蒙內亂的發生。參見《外蒙共黨之真相》，頁 554；Robert Rupen, *How Mongolia is Really Ruled*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9), p. 44.

註 26 劉彥撰，李方晨補增，《中國外交史》（台北：三民書局，民 51），頁 771-772。

註 27 Gerard M. Friters 著，李約譯，《外蒙古》（台北：國立編譯館，民 41，台初版），頁 112。本書譯自 *Outer Mongolia and Its International Position* 一書。

註 28 在 1924 年年底，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齊采林（Georgii Chicherin）聲明外蒙雖然是自治，但可以獨立進行其內政、外交。參見李約譯，《外蒙古》，頁 114。

註 29 《蒙古人民共和國發展史》，頁 160。

「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雖然蘇聯在政治上擁有比中國更高的影響力，可是在經濟上，依舊是中國商人的天下。³⁰ 蘇聯對此情況耿耿於懷，一直想把中國的經濟勢力逐出外蒙。至 1928 年，外蒙貨品銷往蘇聯的總價已是銷往中國貨品總價的兩倍，但是由中國輸入的貨品總價仍遠遠超過由蘇聯輸入的貨品總價。³¹ 1928 年以前，中國在外蒙的經濟勢力依然十分穩固，並未被蘇聯打垮。

1924 年以來，外蒙傾向共產主義的激進派和傾向民族主義的溫和派之間，有相當激烈的權力鬥爭，而溫和派顯然是佔上風。1925 年蒙共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時，主席團的十五人中雖然似乎左派右派各半，但黨的最高職務—中央委員會的主席、副主席是由溫和派的丹巴多爾濟、札丹巴（Jadamba）擔任。³² 溫和派顯然想追求真正的獨立，而不想與蘇聯過分親近，溫和派的發言人澤彬（J. Tseveen）就曾說過外蒙必須成爲像瑞士一樣的中立國之類的話。³³ 溫和派雖然表面上也同意

註 30 1924 年外蒙和中國的貿易總值是和蘇聯貿易總值的六倍多；1925 年外蒙外銷羊毛有 86% 銷往中國，銷往蘇聯的僅有 13%。參見李約譯，《外蒙古》，頁 120；Rupen, *How Mongolia is Really Ruled*, p. 40；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199。

註 31 這是因爲本時期蘇聯工業不振，而且中國貨品比較符合外蒙需求的緣故。參見 Gerard M. Friters, *Outer Mongolia and Its International Position*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4, Reprinted), p. 137；李約譯，《外蒙古》，頁 121。

註 32 Bartow, *op. cit.*, p. 23。

註 33 "Short History of the MPRP 1917-1940, Part 4," in JPRS: 25,224, p. 74, 轉引自 Bartow, *op. cit.*, p. 24。

「消滅封建殘餘」，可是在其實際作為上並未如此。1926 至 1927 年外蒙全部牲畜有半數以上仍是屬於過去的王公貴族和寺院所有，³⁴ 這是因為王公喇嘛在黨政上仍擁有極大影響之故。

溫和派雖然一直面臨激進派的競爭，但溫和派在黨政上的勢力仍超過激進派，直到 1928 年蒙共第七次代表大會，雙方才遭遇到決定性的衝突。經過四十餘天（10 月 23 日 - 12 月 10 日）的鬥爭之後，激進派藉著蘇聯大力的支持，把溫和派逐出人民革命黨，³⁵ 完全控制了黨和政府，外蒙的發展也進入了另一階段。

從激進再到緩進時期的外蒙(1928-1940)

在 1928 年以前，外蒙的執政者在內政或外交方面，還有相當的自由。³⁶ 而這些溫和派的執政者雖免不了有權力的鬥爭，但也有心追求真正的獨立，想和其他國家多方接觸，³⁷ 不

註 34 《蒙古人民共和國發展史》，頁 190；Bartow, *op. cit.*, p. 23.

註 35 丹巴多爾濟、札丹巴、倫琴諾等人均被放逐到蘇聯。參見 Murphy, *op. cit.*, p. 105。

註 36 Bartow, *op. cit.*, p. 239.

註 37 當時有若干外國工程人員（大部份為德國人及瑞典人）進入外蒙，外蒙也曾派代表團赴德延聘科技專家及購買機器。參見李約譯，《外蒙古》，頁 33、117-118；Friters, *op. cit.*, pp. 32-33, 134. 外蒙也曾派教育代表團（由大約 40 名兒童組成）赴德接受西方教育，接受商業、經濟的訓練。（Bawden, *op. cit.*, p. 283.）1926-1928 年，外國公司可以在外蒙運作。（V. I. Pusarev, *MNR na puti k zaversheniu stroitel'stva sotsializma*, pp. 15-16, 轉引自 Francis J. Romance, "Sino-Soviet Policies Towards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1945-1965: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Involved," (Ph. D. Dissertati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1967), p. 109) 以上種種情形，雖然也是因為蘇聯對外蒙政策較為放鬆之故，但相信更是外蒙本身積極期望進行之事。1921 年時，外蒙就曾通知世界各國，希望與其建立外交、貿易關係。（*History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p. 166.）

欲完全依賴蘇聯，而想走出屬於自己的道路。可是在蒙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之後，激進派奪權成功，溫和派的發展路線遭到摒棄，代之而起的是左傾的激進路線。這些不滿現狀的激進份子，不顧外蒙當時的情況，妄想一步登天，迅速往共產主義邁進，結果卻給外蒙帶來了莫大的傷害。

1929-1932 年期間，外蒙各方面都明白顯示出激進主義的作風，尤其是在牧業集體化、消滅封建及私有經濟、反宗教三方面，更是如此。

外蒙在 1929 年開始設立集體牧場，在頭一年就完成了約 10% 的集體化。³⁸ 到 1932 年，成立了大約四百個集體牧場，為了領導集體化運動，1929 年 11 月設立了「全國集體牧場中央管理處」。³⁹ 從蒙共第八次代表大會（1930 年 2 月召開）草擬的五年計畫（1931-1935）中，更可明顯看出這些激進份子對迅速集體化的強烈企圖。他們期望五年計畫完成時，要使總人口至少 55% 集體化。⁴⁰

外蒙雖訂定了有關經濟和社會的五年計畫，可是這個計畫尚未執行，就註定要遭受失敗的命運。因為外蒙當時根本沒有完成這個計畫所應具備的條件—知識、機構、幹部等，⁴¹ 只是一味模仿蘇聯集體化的作法，而外蒙的經濟型態根本和蘇聯不同，⁴² 又怎能使用蘇聯的模式？

註 38 Bawden, *op. cit.*, p. 241.

註 39 《蒙古人民共和國發展史》，頁 200。

註 40 同前註，頁 203；Murphy, *op. cit.*, p. 122.

註 41 Bawden, *op. cit.*, p. 304；Murphy, *op. cit.*, p. 117.

註 42 外蒙經濟十分依賴游牧，而牧民的定居和集體化問題與蘇聯的農民問題基本上就不相同，參見 Murphy, *op. cit.*, p. 118.

在反宗教方面，1930年春，蒙共開始強迫喇嘛還俗，展開反宗教的宣傳。對寺院、喇嘛大幅增稅，又頒佈訓令，要求每次牧民向寺院租牧牲畜時簽訂書面合同，規定寺院向租戶算帳的條件，使寺院無利可圖，藉以沒收寺院牲畜。⁴³

在消滅封建經濟方面，1928年年底大呼拉爾通過法律，沒收封建主的牲畜、財產。⁴⁴在1929年登記的729戶以前的封建主中，有669戶的財產被沒收。⁴⁵1931年又沒收了837戶（其中有205戶是寺院封建主）。⁴⁶1928年外蒙總牲畜有11.1%是王公貴族所有，1931年則降至4.5%。⁴⁷

外蒙的領導者又以捐稅辦法來反對私營經濟，結果外蒙中央人民合作社成了唯一的買賣者，1929年11月蘇蒙合資創辦的蒙古運輸公司成了唯一的運送者。⁴⁸

外蒙左傾分子的激進作法，引起了群眾的恐懼和憤怒，展開了反抗的行動。集體化的推行使憤怒的牧民在三年內就屠宰了七百萬頭牲畜。⁴⁹1931-1932年期間牲畜總頭數減少了32%。⁵⁰反宗教的宣傳反而刺激了宗教的勢力。⁵¹不滿分子更

註 43 《蒙古人民共和國發展史》，頁 201。

註 44 蘇聯科學院，蒙古人民共和國科學委員會合編，巴根、余錦繡等合譯，《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頁 300。

註 45 Friters 的書上是說 670 戶被沒收。（Friters, *op. cit.*, p. 23.）

註 46 《蒙古人民共和國發展史》，頁 198-199。

註 47 *History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p. 255.

註 48 《蒙古人民共和國發展史》，頁 202。

註 49 《外蒙共黨之真相》，頁 85；Dupuy, *op. cit.*, p. 67.

註 50 《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頁 304。

註 51 《蒙古人民共和國發展史》，頁 201；Bartow, *op. cit.*, p. 26.

聯合起來，配合國外（尤其是日本）的力量，企圖推翻蒙古政權。⁵²而私人買賣的全面禁止，造成了嚴重的商品荒。⁵³牲畜的大量減少、私人貿易的急速摧毀、及蘇聯補給品的不足，造成普遍的飢荒。蒙民的反應趨向恐怖，把外蒙帶到內戰的邊緣，蘇聯不得不派出坦克和飛機，協助外蒙軍隊和秘密警察鎮壓這些暴動。⁵⁴

在這種情況下，加上日本侵略我國東北，勢力在 1931 年直接到達外蒙的邊緣，⁵⁵這時候若外蒙內部動盪，對蘇聯國防安全將有極大威脅，所以外蒙就根據共產國際和史達林 (Joseph Stalin) 的指令，在 1932 年取消了這些激進政策，⁵⁶整肅了施傑 (Z. Shijee)、巴德拉呼 (Ö. Badrakh)、登德巴 (Dyndyb) 等人。但上述這些人只是外蒙政黨首領喬巴山 (Kh. Choibalsan)、根登 (P. Genden) 的代罪者，更是史達林的代罪者，⁵⁷因為這次左傾激進政策的產生和取消，都是由

註 52 《蒙古人民共和國發展史》，頁 208-210；《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頁 305。

註 53 《蒙古人民共和國發展史》，頁 202-205。

註 54 《外蒙共黨之真相》，頁 85、384；Dupuy, *op. cit.*, pp. 67, 298. Nicholas Poppe 證實蘇聯派出飛機、坦克鎮壓 1932 年的暴動，參見 Rupen, *How Mongolia is Really Ruled*, p. 60.

註 55 《蒙古人民共和國發展史》，頁 208。

註 56 《蒙古人民共和國發展史》，頁 210-211。

註 57 Baabar (Bat-Erdene Batbayar), *Twentieth Century Mongolia*, trans. D. Sühjargalmaa, et al, ed. C. Kaplonski (Cambridge: The White Horse Press, 1999), p. 320; Alan J. K. Sanders,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Mongolia* (Lanham, MD. & London: The Scarecrow Press, 1996), pp. 15, 181-182; Murphy, *op. cit.*, p. 129. 1931 年喬巴山擔任農牧部長，集體化的強制推行自然與他有密切關係。(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234.)

他一手指揮操縱的。

因為客觀環境的限制，外蒙不得不停止激進的作風，解散了所有的集體牧場，⁵⁸ 取消了五年計畫，⁵⁹ 改採一種和緩的政策來繼續其社會主義化運動。新政策⁶⁰ 包括修訂稅則、鼓勵私有經濟、緊縮國家預算、實施信貸改革等等。外蒙的經濟在改採新政策後，很快得到復甦。1933 至 1934 年一年內，牲畜總數就增加了三百五十萬頭。⁶¹

在宗教方面，寺院、喇嘛的數目也因蒙共政策的緩和而增加。蒙共在表面上雖允許宗教活動，可是卻設下許多規定，⁶² 對其大加限制。這些規定使得喇嘛人數大為減少。到了 1940 年，喇嘛和寺院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對蒙共已不構成重大威脅。⁶³

蒙共雖解散了集體牧場，可是對集體化的企圖並未放棄。他們先鼓勵牧民組成集體化色彩較低、具有互助性質的合作社。1935 年起，又創立了集體化色彩較濃的合作社，牧民以部份牲畜做為入社費用，這些牲畜變成合作社的共同財產，而其他牲畜仍為牧民所有。到 1938 年時，外蒙共成立此種合作社 34 個，共有社員 190 名。雖然有種種優待辦法，可

註 58 《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頁 309；*History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p. 206.

註 59 Rupen, *How Mongolia is Really Ruled*, p. 55.

註 60 新政策 (New Turn Policy) 至 1936 年結束。(Bartow, *op. cit.*, p. 33.)

註 61 《蒙古人民共和國發展史》，頁 220-222、227。

註 62 同前註，頁 233-234；李約譯，《外蒙古》，頁 248。

註 63 Haggard, "Mongolia: The First Communist State in Asia," p. 100.

是只能吸引貧牧，富牧多不願加入。⁶⁴ 在這個時期，牧業也逐漸過渡到密集化的道路上去。割草機站設立了，哈向（Khashaan，圍牧的柵欄）、水井的數目也增加了。⁶⁵

這段期間，由於日本的威脅日增，1934年蘇聯和外蒙訂立所謂的「君子協定」，⁶⁶1936年3月提昇為雙方的互助議定書。此協定及議定書最重要的是雙方共同防衛的規定。⁶⁷1937年蘇聯派軍進駐外蒙，把外蒙納入其防衛體系。⁶⁸1939年8月，蘇蒙聯軍在哈勒欣河（Khalkhin Gol）戰役（日方稱為諾門罕事件，Nomonkhan）中徹底擊敗日軍。⁶⁹此次戰役使外蒙得免進一步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日本權力重心由陸軍轉至海軍，外交重點也移往東南亞、太平洋。⁷⁰

本時期是喬巴山竄升的時代。1928年他被任命為大呼拉

註 64 Murphy, *op. cit.*, pp. 140-141.

註 65 《蒙古人民共和國發展史》，頁 246-248。

註 66 此協定可能是口頭協定，（Bartow, *op. cit.*, p. 30.）也可能簽署了，而未公布。（外蒙共黨之真相，頁 539；Dupuy, *op. cit.*, p. 425.）

註 67 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 225-226;
Sovetsko-mongol'skie otnosheniia 1921-1966, p. 89.

註 68 Rupen, *How Mongolia is Really Ruled*, p. 45.

註 69 李約譯，《外蒙古》，頁 243；《外蒙共黨之真相》，頁 540-542；Dupuy, *op. cit.*, pp. 426-428；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226.

註 70 Bartow, *op. cit.*, pp. 31-32. 關於此一戰役，參見 Alvin D. Coox, *Nomonhan: Japan Against Russia, 193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一書。

爾主席團主席，1931年當上外交部長和農牧部長，1935年成爲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1936年開始執掌內政部，接管了祕密警察。1937年，喬巴山更接掌了軍部。⁷¹

外蒙在這段期間，反抗及整肅事件不曾中斷。1930年代喬巴山奪權鬥爭中的主要對手是根登、阿摩爾（A. Amor）和迭米德（G. Demid）三人。非軍人出身的根登和阿摩爾因爲國防日益重要，而權力大受影響，後來分別在1937、1939年以反革命、日本間諜的罪名遭到槍殺。⁷²1937年迭米德離奇死亡。⁷³此三人死後，喬巴山奪權路上的主要障礙已經清除，他在1939年接任部長會議主席（總理），在1940年蒙共第十次代表大會中被任命爲中委會主席。⁷⁴總攬了黨政軍大權，成爲外蒙的頭號人物。

蒙共此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第三個黨綱，認爲外蒙必須繼續消滅封建殘餘，確保非資本主義的發展路線，以備將來向社會主義前進。⁷⁵本次大會也主張制定新憲法，在隨後的第

註 71 Yu. Tsedenbal, "The Life and Achievements of Comrade Choibalsan," in Urgunge Onon, ed., *Mongolian Hero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AMS Press Inc., 1976), pp. 206-207.

註 72 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235.

註 73 迭米德在西伯利亞火車上遭下毒，也會和根登牽連在一起，同被指爲日本間諜，參見 Rupen, *How Mongolia is Really Ruled*, p. 48; Sanders,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Mongolia*, p. 56.

註 74 Tsedenbal, "The Life and Achievements of Comrade Choibalsan," p. 207; Bartow, *op. cit.*, p. 35.

註 75 《蒙古人民共和國發展史》，頁 258；*History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p. 364；N. V. Tsapkin, *Mongol'skaia narodnaia respublika* (Moscow: Ogiz 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Politicheskoi Literatury, 1948), pp. 61-62.

八屆大呼拉爾中批准、公佈了新憲法。⁷⁶ 此部憲法被稱為「喬巴山憲法」。⁷⁷

1940 年的外蒙，王公喇嘛已經欲振乏力，反蘇勢力也遭到摧毀，喬巴山的獨裁確立了，新憲法的頒佈象徵了另一個時代的來臨。

喬巴山主政時期的外蒙（1940-1952）

從喬巴山 1940 年總攬大權到 1952 年他死亡為止的這段期間是喬巴山個人獨裁時期，也是個人崇拜色彩極端濃厚的時期。

喬巴山是史達林的忠實信徒，他的境遇也和史達林相似。⁷⁸ 史達林是喬巴山的偶像，他不但在蘇聯實施個人獨裁，更透過喬巴山的手加強控制外蒙，把外蒙變成蘇聯化的共產國家。

在這期間，因為喬巴山既廣且深的控制，外蒙未有大規模的反抗或整肅事件發生。蒙共代表大會及中央委員會會議

註 76 《蒙古人民共和國發展史》，頁 258、260。此部憲法是仿蘇聯 1936 年憲法而制定的，參見 George Ginsburgs, "Mongolia's 'Socialist' Constitution," *Pacific Affairs*, vol. 34, no. 2 (Summer 1961), p. 142。此部憲法的內容，參見李約譯，《外蒙古》，頁 382-391。

註 77 《蒙古人民共和國發展史》，頁 266。

註 78 喬巴山被稱為「蒙古的史達林」，他們兩人均是經由激烈的鬥爭而獨攬大權多年，強調權勢而不講求技巧，消滅異己，招致境內的恐怖和損害，殘害了許多優秀的人才，兩人均搞個人崇拜，後來也都因此而遭批判。（Rupen, *How Mongolia is Really Ruled*, p. 59.）

召開的次數也不像以往那麼頻繁。⁷⁹

1941年3月25日外蒙部長會議和蒙共中委會決定改革文字，採用與俄文相同的息立爾字母（Cyrillic Alphabet）。⁸⁰這個決定自然是基於政治上的考慮，想藉以增進外蒙與蘇聯的關係，因為早先的決定是要採用拉丁字母，⁸¹而非俄文字母。就文字改革本身而言，這個決定也有其實用意義。⁸²因為新蒙文可以減輕學習舊蒙文時言文不一致的困難。⁸³它比舊蒙文簡單易學，而且較能符合現代科學知識的吸收溝通。這個決定對後來外蒙識字率的提高有其貢獻，但卻也斬斷了與傳統文學的關係，⁸⁴對傳統文化造成傷害。可能蒙共有心借用文字改革來幫助消滅封建色彩、民族主義和宗教。在決定採用俄文字母之時，有學者認為，蒙共可能是把此作法當作是完全改用俄文的先頭步驟。⁸⁵新蒙文直到1946年才獲普遍採用。⁸⁶而改用俄文一事，則從未實現。⁸⁷

註 79 Rupen, *How Mongolia is Really Ruled*, p. 70.

註 80 《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頁 345；Akademii Nauk SSSR, *Ocherki istorii kul'tury MNR* (Ulan-Ude: Buriatskoe Knizhnoe Izdatel'stvo, 1971), p. 222.

註 81 Rupen, *How Mongolia is Really Ruled*, p. 68; Bawden, *op. cit.*, p. 344. 但是拉丁字母個數較少，必須添加其他符號才夠用。（*History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p. 378.）

註 82 Bawden, *op. cit.*, p. 344.

註 83 《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頁 345；*History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p. 644.

註 84 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264.

註 85 同前註。

註 86 Rupen, *How Mongolia is Really Ruled*, p. 68; *Ocherki istorii kul'tury MNR*, p. 222.

註 87 外蒙今日不但未改用俄文，在其民主改革後，其小呼拉爾（Baga Khural）、大呼拉爾更分別在 1991、1994 年決議，加強實施恢復傳統蒙文為官方文字的工作。

哈勒欣河戰役的勝利雖使外蒙本身避免進一步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但由於外蒙與蘇聯彼此間的特殊關係，卻也使外蒙無法置身事外。在大戰期間，外蒙傾全力支援蘇聯，⁸⁸ 聲稱要「動員全國物資及勞力」，高喊「一切為助紅軍」、「一切為前線，一切為勝利」。⁸⁹ 大批的食品、衣物、金錢、馬被送往前線。⁹⁰ 外蒙還出錢組成坦克縱隊、航空中隊贈與蘇聯。⁹¹

在 1945 年 8 月 8 日蘇聯向日本宣戰，⁹² 兩天後外蒙也跟進。⁹³ 外蒙軍隊在喬巴山率領下，擔任蘇聯馬林諾夫斯基（Roman Malinovsky）外貝加爾部隊的右翼，向日軍在我國東北、內蒙境內的陣地進發，⁹⁴ 擊敗了日軍及內蒙部隊。⁹⁵ 8 月 14 日日本宣布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外蒙的經濟發展造成重大的傷害，其

註 88 蒙人是否真的誠心援助蘇聯，值得懷疑，恐怕蘇聯的強迫是更大原因。參見 Romance, *op. cit.*, p. 119.

註 89 I. Purevdorzh, "Sotrudnichestvo SSSR i MNR v gody vtoroi mirovoi voiny," *Problemy dal'nevo vostoka* (mart 1985), p. 38.

註 90 同前註，pp. 38-39; *History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pp. 418-419, 440-444, 450-454.

註 91 Purevdorzh, "Sotrudnichestvo SSSR i MNR v gody vtoroi mirovoi voiny," p. 40; *History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pp. 445-446; 《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頁 351。

註 92 《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頁 353。

註 93 *Sovetsko-mongol'skie otnosheniia 1921-1966*, p. 149; I. S. Kazakevich (Redaktor sovet'skogo vypuska), *Sovetsko-mongol'skie otnosheniia 1921-1974, dokumenty i materialy* (Moscow: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ia, 1979) tom. 2, p. 117.

註 94 《蒙古人民共和國發展史》，頁 281。

註 95 《外蒙共黨之真相》，頁 543; Dupuy, *op. cit.*, p. 429.

主要原因是傾力支援蘇聯的結果。⁹⁶ 戰爭雖使外蒙經濟發展的腳步加快，可是這僅是為了配合對蘇聯的支援，⁹⁷ 亦即配合蘇聯的需要，而非配合外蒙本身的需要。而外蒙在大戰期間，每年的國防預算均高達政府總預算的 50% 以上，軍隊的人數也大幅增加，⁹⁸ 再加上由蘇聯輸入的物品減少，又不允許與華商從事貿易，⁹⁹ 如此則外蒙在大戰期間的艱苦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1945 年 2 月 11 日，英美蘇三國在雅爾達簽署蘇聯參加對日作戰協議書，其第一項規定為：「外蒙古現狀（蒙古人民共和國）將予維持」。¹⁰⁰ 事後中蘇兩國對「現狀」一詞的解釋不同，蘇聯認為該條文的意義為獨立，而我國根據 1924 年中蘇條約，認為我對外蒙仍有主權。¹⁰¹ 我國在美國斡旋下，在 8 月 14 日與蘇聯訂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同意在日本戰敗後，如經公民投票，證實獨立是外蒙人民的願望，則我國將承認外蒙獨立。¹⁰² 10 月 22 日投票當天，98.4% 的外蒙公民前往參與，結果全部贊成獨立，¹⁰³ 我國也正式承認外蒙獨

註 96 Romance, *op. cit.*, pp. 120-121, 124.

註 97 同前註, pp. 118, 122.

註 98 《外蒙共黨之真相》，頁 551；Dupuy, *op. cit.*, p. 436-437.

註 99 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262.

註 100 《雅爾達會議紀錄全文》（台北：聯合報社，民 44），頁 294。

註 101 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257.

註 102 蒙藏委員會編印，《邊疆涉外關係》，民 51 年，頁 24；美國國務院根據檔案編輯，中華民國外交部譯印，《美國與中國之關係一特別著重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九年之一時期》，頁 75。

註 103 木村肥佐生訳，宮地亮一編，《モソゴル人民共和国のすべて》（東京：ヒブリオ，1977），頁 218。

立。¹⁰⁴

1946年2月底，外蒙與蘇聯把1936年簽訂的互助議定書改為友好互助條約，有效期定為十年。¹⁰⁵

同年夏天外蒙申請加入聯合國，我國表示同意，但外蒙的申請仍遭拒絕。1947年外蒙再度申請入會，但因外蒙入侵新疆北塔山，我國反對其加入。¹⁰⁶

註 104 民國34年8月24日，國民政府主席兼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在國防委員會與中央常務委員會臨時聯席會議中以「完成民族主義，維護國際和平」為題的致詞中說道：「外蒙自北京政府時代民國十一年起，事實上已完成其獨立的體制，如今已屆二十五年。當此世運一新之會，正重敦舊好之時。我們必須秉承國民革命的原則，和本黨一貫的方針，用斷然的決心，經合法的程序，承認外蒙之獨立，建立友好的關係，使得這個問題能夠圓滿的解決。否則將使中國與外蒙古之間永無親善之可能，其對於國內安定與世界和平，更將因此而發生重大的影響。」（《大公報》，民國34年8月25日，二版。）民國40年2月1日，聯合國大會表決通過我國所提控蘇案。我國在聯大控蘇經過及控蘇案全文，參見蔣廷黻，「三年控蘇的奮鬥」，「我國控蘇案全文」，《我們的敵國》（台北：中央日報社，民41），下集，頁262-309。民國42年2月25日，蔣中正總統根據立法院的決議，明令廢止「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其附件，也不再承認外蒙的獨立。（邊疆涉外關係，頁26。）關於大公報之資料，感謝政大民族系唐屹教授之提醒。

註 105 《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頁362；*Sovetsko-mongol'skie otnosheniia 1921-1966*. pp. 156-158; *Sovetsko-mongol'skie otnosheniia 1921-1974*, tom. 2, pp. 134-136.

註 106 1946年夏，外蒙申請加入聯合國，在安理會上討論時，美國、澳洲、埃及、荷蘭、英國都表示「現有資料不足以表明蒙古人民共和國力足履行憲章所規定的義務，更表示希望再有其他資料闡明某數疑點」。聯合國代理秘書長索布洛夫（A. Sobelov）遂拍電與外蒙外交部長，提出問題，要求外蒙提供資料答覆。是年8月再次討論時，我國建議擱置一年再行討論，但蘇聯要求迅速投票表決。表決結果，六票贊成（包括我國在內），但美英兩個常任理事國及荷蘭投票反對，埃及、澳洲棄權，外蒙申請加入一事遂未通過。孫福坤，《外蒙簡史新編》（台北：文海出版社，民67），頁72-75；Friters, op. cit., pp. 287, 291；李約譯，《外蒙古》，頁237、239。

1947年12月，蒙共舉行第十一次代表大會，通過有關經濟和文化的第一個五年計畫（1948-1952）。發展畜牧業是這個計畫的中心任務，¹⁰⁷可是外蒙並未達到其預期目標。到1952年外蒙牲畜頭數約為兩千三百萬頭，比預定目標差了八百萬頭。¹⁰⁸

1949年10月1日，中共政權成立，外蒙很快在10月6日加以承認，與之建立外交關係。在1950年2月15日公布的關於中共、蘇聯簽訂條約的聯合公報中，中共也確認外蒙獨立。¹⁰⁹

喬巴山於1952年1月26日在莫斯科去世，¹¹⁰外蒙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同時，中共對外蒙有了濃厚的興趣，開始摩拳擦掌，預備大展身手，和蘇聯在外蒙較勁一番。

註 107 《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頁 366-367。

註 108 Murphy, *op. cit.*, p. 168.

註 109 《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頁 364；*History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p. 479.

註 110 蘇聯宣布喬巴山是得癌症而死，但蘇共政治局在1950年責斥喬巴山仍未脫離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1951年又把外蒙參加韓戰不力的罪咎推給喬巴山，可見蘇聯對喬巴山似有不滿，所以喬巴山的死或許與蘇聯有關。參見：張大軍，《外蒙古現代史》（台北：蘭溪出版社，民72），第四冊，頁1606，第八冊，頁3681、3682。此外，札奇斯欽在其《蒙古之今昔》一書中亦對喬巴山之死因表示懷疑。（下冊，頁294。）

第二章 進展中的外蒙與中共關係 (1952-1960)

中共取得政權之後，雖然很快承認了外蒙的獨立，但事實上仍想把外蒙納回中國版圖。毛澤東在 1936 年就說過，當人民革命在中國勝利之時外蒙將會自願主動成爲中華聯邦的一部份。¹ 後來在 1944 年他又表示，中國首先必須承認外蒙是一個國家實體，然後組織一種中華聯邦來符合蒙古的期望。² 雖然有心，但在客觀條件限制下，中共暫時無法收回外蒙，只能設法增強其在外蒙的影響力，求擁一席之地。

而外蒙自獨立以來，一直在蘇聯的嚴密控制之下。在和中共建交前，與外蒙有外交關係的國家除了蘇聯外，只有北韓（1948 年 10 月建交）、阿爾巴尼亞（1949 年 5 月建交）二國。與這兩國建交，在實質上意義不大，所以外蒙的對外關係可以說就是對蘇關係。從外界來看，外蒙根本就是一個封閉的世界。這種情況對渴望追求真正的獨立、渴望加強與外界聯繫的外蒙來說，自然是無法滿足的。因此，在中共政權建立之後，外蒙就一心想加強與中共的關係，引進中共的勢力，以與蘇聯在外蒙的勢力相制衡，而且想經由中共，獲得更多與外界接觸的機會。

因爲外蒙、中共二者均有心強化彼此的關係，所以在喬

註 1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8), pp. 88-89, n. 1.

註 2 *History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p. 803, n. 85.

巴山死後（尤其是 1953 年史達林死後），雙方就頻頻接觸，積極往來，希望能達成各自的目標。

外蒙與中共關係的積極開展

遠在中共政權建立之前，外蒙與中共便有軍事方面的接觸，這些接觸均和蘇聯有密切關係，可說是在蘇聯主持下的接觸。

二次大戰結束後，中共更積極擴張勢力，而蘇聯和外蒙也不遺餘力加以支援。蘇聯和外蒙把擄獲的日本關東軍武器全部交給中共，使東北、內蒙成為中共擴張勢力的根據地。³1946 年 11 月，外蒙總理喬巴山、大呼拉爾主席團主席布馬正德（G. Bumtsend）應史達林密召，赴莫斯科會晤朱德，洽商蘇聯、中共、外蒙三方面軍事、政治、經濟共同聯繫發展等問題。獲得協議後，喬巴山和布馬正德飛返烏蘭巴托，召集外蒙各首腦會議，決定了數項軍事計畫，協助中共與國民政府作戰。⁴

中共政權建立之後，外蒙與中共迅速建交。1950 年 7 月，雙方派任的首任大使賈爾卡賽汗（Jargalsaikhan）與吉雅泰（蒙人）分別赴任。⁵

註 3 Purevdorzh, "Sotrudnichestvo SSSR i MNR v gody vtoroi mirovoi voiny," p. 44.

註 4 中華民國外交部駐新特派員公署檔案《情報彙編》油印本，民國 36 年元月份，轉引自張大軍，《外蒙古現代史》，第四冊，頁 1601-1602。

註 5 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272.

韓戰期間，外蒙與中共也在蘇聯指導下，於 1951 年秋簽訂「軍事互助協定」，雙方共同成立聯合防務委員會、聯合防禦總部、聯合訓練中心及聯合情報局。⁶

喬巴山去世之後，中共派團前往弔祭，由聶榮臻、王震擔任正副團長。⁷此行除弔祭外，外蒙與中共在蘇聯仲介下，開始展開締約談判，但未獲結論。雙方再將會談中心移往北京，由蘇聯駐中共大使羅申任調停人，外蒙大使賈爾卡賽汗和中共外次伍修權代表雙方談判，1952 年 7 月，才談判完畢。⁸

9 月底，外蒙總理澤登巴爾率領龐大的官方代表團到中國大陸訪問，毛澤東接見了他們。10 月 4 日雙方簽訂為期十年的「經濟及文化合作協定」，恢復了中國大陸與外蒙中斷了二十餘年的貿易關係，而蘇聯在外蒙獨佔的情況也因此有了改變。⁹

1952 年 9 月 15 日，蘇聯、中共、外蒙三方在莫斯科簽訂一項有關鐵路交通的協定，同意在 1955 年以前興建完成烏蘭巴托至集寧（在內蒙原綏遠境內）的鐵路幹線。此協定中指出，這條鐵路將和由烏蘭巴托到蘇聯的鐵路接通。從集寧經

註 6 張大軍，《外蒙古現代史》，第四冊，頁 1615；張遐民編著，《俄帝侵略下之外蒙古》（台北：蒙藏委員會，民 53），頁 126。

註 7 《人民日報》，1952 年 2 月 6 日，轉引自張大軍，《外蒙古現代史》，第四冊，頁 1614。

註 8 札奇斯欽，《蒙古之今昔》（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 44），下冊，頁 294。

註 9 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272.

二連到中國國境的鐵路，由中共負責修建；從烏蘭巴托經札門烏德到外蒙邊境的鐵路，由蘇聯和外蒙共同負責修建。¹⁰

中共負責修建的二連集寧段，於 1953 年 5 月開工，動用了兩萬五千名工人，在次年 12 月 11 日完工。這段長 337 公里的鐵路是中國境內唯一採用與蘇聯相同的寬軌的幹道。這條鐵路的烏蘭巴托－札門烏德段在 1955 年 12 月 31 日正式通車，第一列直達貨車由烏蘭巴托首次開往北京。這列貨車歷經 713 公里到達札門烏德後，在 1956 年 1 月 3 日參加烏蘭巴托－集寧鐵路接軌典禮後，再前往北京。澤登巴爾、丹巴、烏蘭夫等人也都參加了接軌典禮。¹¹

這條鐵路的通車對蘇聯、中共、外蒙三者都具有重大意義。對蘇聯來說，這條鐵路的完成使莫斯科到北京的鐵路距離縮短了七百哩，節省了貨運的時間、金錢。在軍事上也可

註 10 《人民日報》，1954 年 10 月 12 日，一版；*Sovetsko-mongol'skie otnosheniia 1921-1966*, pp. 184-185.

註 11 根據張大軍《外蒙古現代史》一書中表示，中共起初修築集寧－二連段鐵路，是採用標準軌距四呎八吋。後來蘇聯鑒於與俄蒙境內之寬軌五呎軌距不同，有礙國際聯運，1956 年 7 月，命令中共拆除，改鋪俄式寬軌。（第四冊，頁 1853。）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274; Robert A. Rupen,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and Sino-Soviet Competition," in Doak Barnett, ed., *Communist Strategies in Asia*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3), p. 268; 《人民日報》，1954 年 12 月 12 日，一版；1956 年 1 月 1 日，四版；1956 年 1 月 4 日，一版。烏蘭夫（Ulanfu/Ulaankhüü，意為「紅色之子」），內蒙人，漢名為雲澤。

以滿足蘇聯對中國潛藏的部份野心。對中共來說，這條鐵路是中共加強對外蒙關係的重要途徑，¹² 中共的貨物、勞工經由這條鐵路大批湧入外蒙。對外蒙來說，這條鐵路的意義更為重大。它縱貫外蒙，有利於鐵路沿線各地區的開發，經由這條鐵路，外蒙與外界有了較多的接觸，對其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有影響。這條鐵路的完成使得蘇聯、中共與外蒙三者的關係更加密切。

烏蘭巴托至集寧之間鐵路的完成，使外蒙與中共關係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最明顯的是雙方貿易額的急遽增加。若以 1952 年的貿易額作為基數 100 來計算，則到 1957 年的雙方貿易額如下：

1953 年 --- 685

1954 年 --- 1070

1955 年 --- 1488

1956 年 --- 3832

1957 年 --- 5095

雙方貿易額在五年之間增加了五十倍，¹³ 而鐵路完成後

註 12 烏蘭巴托—集寧鐵路得以建造，可能是蘇聯對於中共於 1952 年 9 月允許讓蘇軍繼續留在旅順而作的補償。參見 Harry Schwartz, *Tsars, Mandarins, and Commissars* (Philadelphia and New York: J. B. Lippincott Company, 1964), p. 149; David Floyd, *Mao Against Khrushchev*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3), p. 215.

註 13 「五年來的中蒙經濟合作」，《人民日報》，1957 年 10 月 4 日，六版。此外，外蒙第一副主席曾德曾表示，1952 年從中國大陸進口貨物總值為一百三十餘萬圖格里克，1957 年已增至四千萬圖格里克。（張大軍，《外蒙古現代史》，第四冊，頁 1985。）

的增長幅度尤其大。外蒙與中共的貿易額雖然迅速增長，但只佔外蒙對外貿易的第二位，佔首位的仍是外蒙與蘇聯的貿易。

1953年史達林的死造成蘇聯內部激烈的權力鬥爭，繼任的赫魯雪夫(Nikita S. Khrushchev)直到1958年才明顯鞏固權力，在此期間，蘇聯對外蒙的控制自然也稍微放鬆，中共就利用這大好機會，積極擴張對外蒙的影響力。¹⁴1954年赫魯雪夫和布加寧(Nikolai A. Bulganin)赴中國大陸參加中共國慶時，毛澤東就提出要求，希望蘇聯尊重外蒙獨立，放鬆對外蒙的控制，可是沒有得到結果。這件事當時並未公開，直到十年後毛澤東才向一群訪問北京的日本社會主義份子透露。毛澤東說：「蘇聯根據雅爾達協定，藉口保證蒙古的獨立，事實上卻把那個國家放在自己的控制之下。1954年赫魯雪夫和布加寧訪問中國時，我們提出這個問題，可是他們拒絕討論。」¹⁵此事公開後，蘇聯暗指中共要求合併外蒙，並說赫魯雪夫當然拒絕討論此事。¹⁶赫魯雪夫雖然拒絕討論此事，但也不得不同意毛澤東，讓外蒙進入中共的正當影響範圍之內。¹⁷

註 14 早在 1949 年 2 月，毛澤東與蘇共政治局委員兼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米高揚(A. I. Mikoyan)會面時，就曾提出合併內外蒙的問題，希望把外蒙納入中國，但遭到拒絕。參見 M. S. Kapitsa, *KNR: tri desiatletia - tri politiki* (Moscow: Politizdat, 1979), p. 31.

註 15 "China is Waging 'Expansionist' 'Cold War'," *The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vol. 16, no. 34, p. 7.

註 16 同前註，p. 5.

註 17 *New York Times*, vol. 43 (February 15, 1955), 18, col. 5, 轉引自 Larry W. Moses, "Inner Asi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ole of Mongolia in Russo-Chinese Relations," *The Mongolia Society Bulletin*, vol. 11 no. 2 (Fall 1972), pp. 65-66.

此事可能使蘇聯警覺到中共對外蒙領土的野心，所以蘇聯也開始加強爭取外蒙的向心。而中共遭到赫魯雪夫的拒絕後，一定對蘇聯刻意把外蒙培植成附庸的真面目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所以對外蒙的爭取就更加積極了。

中共爲了爭取外蒙人民的好感，採行了許多措施來迎合外蒙人民的民族情感。1954年4月成吉思汗逝世727年紀念日時，中共在內蒙集會紀念，並且決定重葬成吉思汗衣冠於蒙人傳統的聖地－鄂爾多斯（Ordos）的伊金霍洛（Ejen Khoroo），內蒙首領烏蘭夫大肆讚揚中共及毛澤東對少數民族深切的關注。這個成吉思汗的陵墓在1955年完成。¹⁸ 中共並且加強對蒙古的研究，¹⁹ 其科學院的「歷史研究所」中設有「蒙古史研究室」，該室主任爲翁獨健。此外，並在北京大學及呼和浩特進行研究。呼和浩特設有「蒙古語言研究協會」、「語文學院」及「內蒙古大學」（1957年10月創校）。²⁰ 在宗教方面，共產黨員本是無神論者，宗教不過是其

註 18 《人民日報》，1954年4月28日，一版；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281. Rupen, *How Mongolia is Really Ruled*, pp. 74-75; June Teufel Dreyer, *China's Forty Mill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19.

註 19 在1956年11月於烏蘭巴托舉行的蘇聯、中共、外蒙三方學者有關蒙古史的會議中，中共代表就宣布了他們將進行的三項計畫：翻譯有關蒙古的三本主要著作、整理出蒙文與中文的地理術語對照表、收集整理自元朝以來有關的原始資料。參見 Robert A. Rupen, "Russian-Mongol-Chinese Conferenc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17, no. 3 (May 1958), p. 540.

註 20 Robert A. Rupen 著，中央通訊社譯，《外蒙古（1957-1960）》（原載 *Pacific Affairs*, 1960年6月號），頁中六；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290.

用來達成政治目的的工具，中共的「中國佛教協會」（1953年設立）就是中共用來影響鄰近佛教國家的御用機構。

1956年5月22-29日，在內蒙呼和浩特舉行一次會議，會中宣布內蒙也將比照外蒙採用俄文字母，以加強與外蒙之間的文化合作。²¹此外，在是年10月，蘇聯、中共、外蒙三方面的學者在烏蘭巴托舉行十天的會議，會中完成三者合作編寫一套三冊外蒙歷史的詳細計畫，預定在1965年完成付梓。²²改採俄文字母及協助外蒙編史的計畫，雖然後來因為中蘇共關係發生變化而未能照原計畫完成，但中共在提出及參與計畫當時，可能有心以此來博取外蒙的好感。

中共對待中國境內（尤其是內蒙）蒙人的態度必然會影響外蒙對中共的觀感，所以中共在這方面也非常注意，在與外蒙打交道時，儘量派用蒙人，烏蘭夫就是最好的一個例子。烏蘭夫當時是內蒙古自治區的主席，也是中共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²³他率團參加蒙共第十二、十三次代表大會（1954及1958年），代表中共在外蒙邊界主持蒙古縱貫鐵路的通車典禮。而中共駐外蒙首任大使吉雅泰也是蒙人，這個職務在1954年由何英接任後，吉雅泰回到內蒙，擔任自治區的高級官員，後來並擔任「中蒙友好協會」（1958年5月設立）副主席。此外，在參加1959年9月於烏蘭巴托舉行的第一屆國際蒙古學家大會的中共五人代表團中，就有二位是住

註 21 《人民日報》，1956年5月24日，三版；1956年5月31日，一版。

註 22 Rupen, "Russian-Mongol-Chinese Conference," pp. 537-538.

註 23 烏蘭夫後來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員及國家副主席。

在呼和浩特的蒙人。²⁴

在外蒙獨立初期，蘇聯也利用布里雅特的蒙人在外蒙從事很多工作，甚至擔任外蒙政府的官員，但在 1930 年代中期之後，布里雅特蒙人在外蒙的影響力已經大為減弱。²⁵ 布里雅特蒙人在蘇聯的權力結構中，從來沒有人能擔任像烏蘭夫在中共那樣的高層職務，而且蘇聯從未派蒙人擔任駐外蒙大使之職，因此在對待境內蒙人方面，中共也能獲取外蒙一定的好感，儘管烏蘭夫原本是連蒙古話都不會說的。

除了迎合外蒙人民的民族情感之外，中共對外蒙更是大力提供金錢、人力方面的援助。這也是當初外蒙想加強與中共關係的主要原因之一。

外蒙在 1940 年以後，傳統社會結構已經大幅改變，王公喇嘛不再享有權力，宗教的影響力也大為削弱，蒙共堅持其非資本主義發展路線，外蒙已經由原先組織鬆散的游牧社會變成結構嚴謹的共產國家。在思想意識改造告一段落之後，外蒙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強經濟的發展，提高工業化的程度，以及改善人民的生活品質。對外蒙而言，這是一項十分艱苦的工作，單靠外蒙本身的能力，並不足以完成，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外蒙的經濟遭受到很大的傷害，所以爭取大量的外援是外蒙迫不及待的工作。

在獲得中共援助之前，外蒙的外援大多來自蘇聯。但因

註 24 Rupen,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and Sino-Soviet Competition," pp. 272-273.

註 25 關於布里雅特人 1920 年代在外蒙的活動，參見藍美華，《布里雅特人在外蒙古的活動，1921-1928》，台北：蒙藏委員會，民 88。

蘇聯援助外蒙的主要目的是想控制外蒙，而非提升外蒙的經濟水準，而且蘇聯原本的政策是重歐輕亞，所以一旦它可以控制住外蒙，則其對外蒙的援助並不積極，援助的數量也有限。到 1952 年左右，在經濟方面，蘇聯僅幫助外蒙建立幾項小企業，如酒廠、罐頭廠、皮革廠等，以及一個煤礦而已。²⁶直到中共的勢力進入外蒙，蘇聯眼見外蒙與中共的關係日益緊密，爲了繼續保有對外蒙的控制權，才開始大量對外蒙提供援助。因此，外蒙加強與中共的關係，實是一舉兩得之事，不但得到中共的援助，而且迫使蘇聯擴大對其援助。

外蒙的經濟依賴畜牧業，但其畜牧業密集化的程度不夠，而嚴寒的冬天又常常使牲畜大批死亡。此外，外蒙雖然蘊藏有豐富的礦產資源，但並未大量開採，可謂貨棄於地。因此，外蒙仍是一個貧窮的國家。除了貧窮之外，勞工不足是外蒙發展經濟的另一大阻礙。外蒙勞工短缺的原因有三：一是游牧生活的習慣使蒙人不喜歡有規律、有系統的工作時間；二是傳統上蒙人認爲某些使用勞力的工作（如建築）是低下的，不屑爲之；三是外蒙人口稀少，教育落後，具有技術的工人不易求得。²⁷外蒙既然要發展經濟，則金錢及勞力是其迫切需要的，而中共正可滿足外蒙這兩方面的需要。

在人力支援方面，中共於 1955 年年初和外蒙簽訂協定，由中共派遣華工赴外蒙工作（主要是建築方面的工作），新

註 26 Harrison E. Salisbury 著，《外蒙簡介》（原載紐約時報 1959 年 8 月 3 日—7 日，國防研究院譯印，民 48 年 11 月），頁 9。

註 27 廖淑馨，「外蒙驅華事件與匪蒙關係」，《匪情月報》，26 卷 2 期（民 72 年 8 月），頁 28。

資及工程的材料費均由中共所贈與或貸給外蒙的款項中支付。中共派遣的首批華工在 1955 年 5 月抵達外蒙，至是年夏天大約超過了一千人，至次年 8 月華工增至一萬名左右，1958 年又有兩千四百名華工抵達外蒙。1960 年 9 月，中共與外蒙簽訂新協定，繼續供應華工。中共提供華工的條件是華工可以取得外蒙永久居留權及公民權。²⁸ 這個條件自然是具有政治意味，但外蒙在不需花錢就可獲得大量勞工的誘惑下，也只有接受了。到 1960 年，在外蒙華工人數已經高達一萬五千名。²⁹

在金錢援助方面，中共於 1956 年的協定中答應贈與外蒙

註 28 中共與外蒙所簽訂的徵募華工協定，規定華工服務期限至少五年，期滿後繼續居留，取得蒙古公民資格，或返回中國，任由勞工自由決定。（張大軍，《外蒙古近代史》，第四冊，頁 1995。）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273; Rupen,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and Sino-Soviet Competition," p. 266; Murphy, *op. cit.*, p. 177.

註 29 Murphy, *op. cit.*, p. 177. 關於華工人數另有不同說法。Salisbury 著，國防研究院譯印的《外蒙簡介》中說，在 1959 年時，據說有華工兩萬人（頁 11）。《外蒙共黨之真相》一書中也說，1950 年代末期和 1960 年代初期，外蒙有華工兩萬多名（頁 446、456；Dupuy, *op. cit.*, pp. 345, 353）。Rupen 著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中說，到 1960 年 7 月，在外蒙華工有一萬兩千人。Vnesnnaia politika KNR 一書中說，1956-1964 年期間，有兩萬名中共的公民在外蒙，參見 Institut Dal'nego Vostoka, Akademiia Nauk SSSR, *Vnesnnaia politika KNR* (Moscow: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ia, 1971), p. 58.

一億六千萬圖格里克（Tugrik，蒙幣名，當時圖格里克和盧布的價值相等），以協助其建立紡織廠、紙廠、合板工廠、玻璃廠和建造道路與橋樑。³⁰1958年12月雙方簽訂的條約中，中共又答應提供外蒙一億圖格里克的低利貸款，而從1962年開始以貨品償還。³¹1960年5月，中共總理周恩來暨外長陳毅訪問烏蘭巴托時，答應提供兩億圖格里克的貸款給外蒙，以協助其第三個五年計畫（1961-1965）中工業、灌溉及公共事業的建設。³²中共所贈與及貸給的款項和外蒙的收入比較，算是相當龐大的數目。

由於外蒙和中共的努力，雙方關係有了極大的進展。在貿易方面，前面筆者已經提過在1952-1957年雙方貿易迅速增長的情形，而外蒙與蘇聯的貿易在1955-1958年卻有急遽減低的趨勢。³³不過，外蒙與中共的貿易額比起外蒙與蘇聯的貿易

註 30 《人民日報》，1956年8月30日，一版。

註 31 《人民日報》，1958年12月30日，一版。

註 32 《人民日報》，1960年6月1日，一版。外蒙第二個五年計畫是1953-1957年。隨後在蘇聯堅持下，採取了過渡期的三年計畫（1958-1960），目的在使外蒙的經濟計畫與蘇聯的經濟計畫以同一速度進行。（《外蒙共黨之真相》，頁388；Dupuy, *op. cit.*, p. 301.）

註 33 1955-1958年外蒙對蘇聯的貿易額如下表：

單位：百萬盧布

時 間	輸 入	輸 出	總 額	赤 字
1955	486.8	215.1	701.9	271.7
1956	413.6	217.2	630.8	196.4
1957	270.7	200.5	471.2	70.2
1958	259.4	188.7	448.1	70.7

（本資料參見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291.）

額仍有很大的差距。³⁴但外蒙與中共建交不過數年，能有如此成績，已經深具意義。

1956年，蘇聯軍隊完全撤出外蒙，在外蒙的俄國人也大為減少，³⁵而是年因為中共派遣大批華工進入外蒙，使得在外蒙的華人急遽增加。從這個在外蒙人數的消長情形，也可看出外蒙與蘇聯、中共關係的變化。這個改變自然是對中共有利的。

在文化方面，外蒙與中共的交流也極為熱絡，各種文化、科學、藝術代表團來往頻繁。中共加強蒙古研究的工作，而外蒙也把許多中國作家的作品譯成蒙文出版，³⁶雙方並簽訂文化合作計畫。當時在烏蘭巴托的大學生渴望到中國大陸求學，他們不僅僅是為了完成學業，更想學習中共「真正亞洲革命」的精神。在外蒙的知識份子對中共極具好感，在蒙共中也有親中共派系的存在。蒙人公開爭論他們應該選擇中共的方式向共產主義邁進，抑或遵照蘇聯的方式。若可選

註 34 1957-1960 年外蒙對中共及蘇聯的貿易額，根據 *The 1961 Statistical Handbook* 所提供的統計數字如下：（其中對蘇聯部份與前註之表有出入，係資料引用來源不同所致。）

單位：百萬盧布

時 間	輸 入		輸 出	
	中 共	蘇 聯	中 共	蘇 聯
1957	48	237	18	191
1958	72	203	11	179
1959	79	211	12	193
1960	89	236	13	220

註 35 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272.

註 36 《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頁 392。

擇的話，有很多人願意選擇中共的方式。³⁷雖然到中國大陸留學的外蒙學生比到蘇聯留學的少很多，³⁸但根據紐約時報記者薩利斯勃律(Harrison E. Salisbury)的觀察，自北京返回的外蒙知識青年，無不具有十字軍的精神，這種精神在赴蘇聯及東歐國家留學、考察的青年中並不多見。由此可知，當時中共較蘇聯對外蒙更具吸引力。³⁹

1958年，外蒙再度加速推進集體化的工作。其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將小合作社合併為大合作社。⁴⁰1958年外蒙有農牧業合作社727個，1959年時只有389個，這就是合併的結果。⁴¹如此一來，使得合作社的數目和蘇木(sum，縣)數目相差無幾，而且一個合作社的範圍往往就等於一個蘇木的範圍。因此，外蒙決定廢除蘇木以下的行政單位—巴格(bag)，而把蘇木和合作社結合起來。外蒙把370個蘇木和389個合作社結合重組為426個「蘇木合作社」。⁴²外蒙的這項措施和蘇聯沒

註 37 Harrison E. Salisbury, *War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69), p. 17.

註 38 1958年，有一千多名外蒙學生在蘇聯留學，而在中國大陸留學的外蒙學生只有三十名左右。(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285.)

註 39 Salisbury, 《外蒙簡介》，頁8。

註 40 Daniel Rosenberg, "Leaders and Leadership Roles in a Mongolian Collective: Two Cases," *Mongolian Studies* 7 (1981-1982), p. 29.

註 41 《外蒙共黨之真相》，頁403；Dupuy, *op. cit.*, p. 312. *History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中也說1958年的農牧業合作社是727個(p. 561)，但在Murphy的*Soviet Mongolia*(p. 157)和Rupen的*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p. 296)二書中都說是694個，可能是統計時間不同所致。

註 42 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 295-296.

什麼關聯，它極可能是模仿中共在內蒙的作法，因為中共在 1959 年，把內蒙的 3,200 個畜牧合作社合併為 150 個畜牧公社，而正常情況下，一個公社的範圍和一個蘇木的範圍是相等的。⁴³ 由此也可看出中共的影響力。

此外，從許多例證，我們亦可以看出外蒙、中共關係增進的情形。1956 年雙方簽訂了一項共同使用內外蒙牧場的協定。⁴⁴ 如此一來，則冬天時外蒙牧人便可把牲畜趕到內蒙，以減少天氣嚴寒、牧草不足所造成的牲畜死亡。1957 年 4 月，外蒙在內蒙呼和浩特設立領事館，使內外蒙的接觸更為加強。⁴⁵ 1958 年，外蒙贈送中共一萬五千匹馬，以支持中共農業的「大躍進」。⁴⁶

外蒙與中共的關係，在雙方的努力下，在 1950 年代有了很好的開始。一位亞洲國家的外交官說：「中國人的進取精神強，吸引力大，實在很難看出將來俄人在此，如何能保住其原有地位。目前它在外蒙固然勢力最強，但五年以後，情況很可能不再如此。」⁴⁷ 眼看中共在外蒙似乎將有更大的發展，可是往後中蘇共關係的變化，卻使外蒙對中共的政策遭到極大的考驗，也因此影響了雙方關係的發展。

註 43 Rupen,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and Sino-Soviet Competition," pp. 266-267.

註 44 Bartow, *op. cit.*, p. 56.

註 45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ug. 9, 1957, 轉引自 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275.

註 46 《人民日報》，1958 年 12 月 24 日，一版。

註 47 Salisbury, 《外蒙簡介》，頁 12。

中蘇共關係的變化及其影響

中共政權建立之初，勢力尚未穩固，加上中國大陸經歷大戰及內戰的破壞，百廢待舉，迫切需要蘇聯物質、技術上的援助，所以中共對蘇聯自然是百依百順，唯命是從，二者關係有如兄弟一般。

儘管中共基於事實需要，有求於蘇聯，不得不在表面上加以讚捧一番，並且大事吹噓中蘇友誼。可是在中蘇共領導人—毛澤東與史達林—心中，是否真有「偉大的友誼」存在呢？這是頗值得懷疑的。

依照毛澤東的看法，在中國搞革命一定要拉攏農民，而不是拉攏城市中的工人，因為農民在中國所佔的比例最高。毛澤東的這個想法違反馬克斯的觀點，史達林也不同意，因為他們認為農民是小資產階級，而工人才是無產階級。⁴⁸在二次大戰結束後，毛澤東要發動內戰奪取政權，但是史達林為了蘇聯在東北的利益，再加上認為中共的實力不足，希望毛澤東與國民黨妥協，共組聯合政府，可是毛澤東並未遵照史達林的意見行事。後來中共以武力取得政權，證明毛澤東的判斷是正確的，而史達林也承認自己的判斷錯誤。⁴⁹

註 48 Salisbury, *War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pp. 74-75; John W. Strong, "Sino-Soviet Relation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Adam Bromke, ed., *The Communist States at the Crossroads*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5), pp. 26-27.

註 49 Milovan Djilas, *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62), p. 182.

從這二件事情看來，史達林對中國的了解比不上毛澤東，自然無法令毛澤東心悅誠服。此外，史達林對毛澤東不無輕視之心，因為毛澤東並非莫斯科一手訓練出來的共產黨員。伏洛依德（David Floyd）在其「毛反赫魯雪夫」（Mao Against Khrushchev）一書中，就明白地用「史達林反毛」（Stalin Against Mao）的詞句來總括說明1949-1953年中蘇共的關係。⁵⁰可見毛澤東與史達林的關係並不友善。中共政權建立後二個多月，毛澤東首度訪問蘇聯，史達林卻未到車站迎接，⁵¹便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史達林死後，蘇共內部鬥爭的結果，赫魯雪夫登上了首位，但他的勢力是不能與史達林相比擬的。對於史達林，毛澤東已經無法信服，更遑論赫魯雪夫。而中共政權的建立提供了一種不同於蘇聯的共產革命模式，這個成功使毛澤東更是意氣風發，洋洋自得，豈甘心讓中共居於蘇聯之下。因此，毛澤東自然無法忍受赫魯雪夫在他之上，他要和赫魯雪夫一爭長短，看看誰才是全世界共產革命的領導者？看看中共或蘇共，哪個才是全世界共產革命的領導黨？

雖然對蘇共領導人不服，可是爲了得到蘇聯的援助，加上本身勢力尚未穩固，中共及毛澤東只好暫時隱藏自己的野心，培養自己的實力，靜待適當時機的來臨。

1956年2月，蘇共召開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雪夫在總結報告中，指示擴張軍備並不能鞏固和平，只會使戰爭的

註 50 Floyd, *op. cit.*, p. 11.

註 51 Joseph L. Nogee, *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Two*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Inc., 1984, 2nd Edition), p. 91.

危險變大，因此蘇共在今後的外交方面將採取和平共存的政策，而且要改善與南斯拉夫共黨的關係。⁵² 蘇共和平共存的原則是針對韓戰之後美國的圍堵政策所設計的，企圖稍緩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激烈對立。本次大會的另一個重頭戲就是批評史達林，譴責其個人崇拜。

當時中共對外希望保持和諧平靜，以便專心從事國內建設，所以中共支持蘇共和平共存的外交政策，但對清算史達林的激烈方式，作了相當的保留。⁵³ 1956年10月，毛澤東對蘇聯大使表示：雖然史達林該受批判，但中共不同意蘇聯過激的批判方式。⁵⁴

1957年8月，蘇聯成功的試射洲際彈道飛彈（ICBM）；10月，試放人造衛星成功。毛澤東眼見東西方力量有了決定性的變化，說出了「東風壓倒西風」一語，認為社會主義的武力遠超過資本主義。毛澤東又公開宣揚不怕核子戰爭，他認為，如果核子戰爭爆發，「帝國主義」將被完全消滅，全世界只有社會主義國家生存，暗指核子戰爭對共產世界來說，並不是件壞事。⁵⁵ 由此即可得知，毛澤東希望蘇聯對西方國家採取強硬態度，可是蘇聯的看法不像毛澤東這麼樂觀，他們並不認為自己的武力已超越美國。因此，當毛澤東指稱

註 52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總結報告」，《匪俄爭執原始資料彙編》（台北：國際關係研究所，民53），第一冊，頁14、36。

註 53 同前註，頁20。

註 54 Schwartz, *op. cit.*, p. 158.

註 55 Salisbury, *War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pp. 117-118.

美國是紙老虎時，赫魯雪夫就說：「美國或許是隻紙老虎，但它是一隻有核子牙齒的紙老虎。」⁵⁶蘇聯不受毛澤東說法的影響，依舊堅持其和平共存的外交路線。

1958年，毛澤東提出「繼續革命」的論點，與蘇聯和平共存的外交路線更是大相逕庭。此外，中共在其內政和外交方面也轉趨激烈，於同年正式發動「大躍進」，設立人民公社，期望超越社會主義，直接向共產主義邁進。中共想以此向其他共產國家顯示，它比蘇聯更有決心，更有魄力，更「共產主義」。

1958年8月，中共開始大規模砲轟金門、馬祖，企圖「解放」台灣。當時蘇聯為了實踐其和平共存的政策，擴展與美國的關係，不願得罪美國，所以無幫助中共奪取台灣。⁵⁷1959年6月，蘇聯撕毀與中共1957年10月所訂的協定，不願把原子彈的樣品及製造技術提供給中共。⁵⁸同年秋天，中印邊界發生多次衝突事件，蘇聯並未聲援中共，而是宣布中立。⁵⁹這當然是為了拉攏印度。這些事情使得中蘇共的關係更不友善，由此也可發現中蘇共二者的利益是互相衝突的，而為了各自的利益，這兩個馬列信徒之間的合作就無法顧及了。

註 56 Alvin Z. Rubinste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Two* (Cambridge, MA: Winthrop Publisher, Inc., 1981), pp. 121-122.

註 57 同前註, p. 121

註 58 Adam B. Ulam, *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8), p. 623.

註 59 Floyd, *op. cit.*, pp. 261-262.

中蘇共的關係演變至此，彼此的距離是愈來愈遠了，雖然雙方尚未公開決裂，但這只是遲早的問題。而中蘇共的爭執，在表面上似乎是思想意識之爭，實際上卻是共產領導權之爭，更是彼此利益之爭。

外蒙位於中共與蘇聯二者之間，中蘇共關係的變化，自然會影響到外蒙內部的組織運作，如此一來，外蒙與中共關係的發展自然也會受到影響。

1953-1958年，外蒙與中共的關係進展十分迅速，中共在外蒙的影響力日增，而蘇聯在外蒙的影響力卻有降低的趨勢。外蒙與蘇聯的貿易總額由1955年的701,900,000盧布降低到1958年的448,100,000盧布。⁶⁰由此可見二者關係降低之一斑。

中蘇共關係發生變化之後，外蒙的地位更形重要，蘇聯自然不願中共在外蒙的勢力日益坐大，所以在1957年5月派布加寧率團訪問外蒙，15日和澤登巴爾發表聯合聲明。在這份聲明中，宣稱在1947-1957年，蘇聯贈貸外蒙的款數高達九億盧布，並且宣布蘇聯將在外蒙1958-1960年的三年計畫中貸款外蒙兩億盧布。⁶¹此外，蘇聯並決定把「蒙古石油公司」及其在「蘇蒙金屬公司」的股份無條件讓與外蒙。⁶²1960年9月9日，蘇聯又宣布將在外蒙第三個五年計畫中提供六億一千五

註 60 同註 33。

註 61 *Sovetsko-mongol'skie otnosheniia 1921-1966*, pp. 221-223.

註 62 同前註，pp. 213-216; "Joint Soviet-Mongolian Statement," *The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vol. 9, no. 20 (June 26, 1957), pp. 27-28.

百萬盧布的貸款。⁶³

由蘇聯宣布貸款的時間及數目看來，這完全是針對中共對外蒙提供貸款而做的反應行動，蘇聯想用經濟援助作為武器，阻止中共在外蒙的進一步發展。不過，儘管蘇聯的援款高過中共，但外蒙人仍說，蘇聯的援助條件苛刻，而中共的援助差不多等於奉送。⁶⁴

從另外一件事情也可以看出蘇聯對中共在外蒙擴展勢力的反應。1954年11月，蒙共召開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中共派烏蘭夫率團前往參加，當時蘇共代表團由科馬羅夫（P. T. Komarov）率領，科氏的職務是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Commission on Party Control）的副主席，比起烏蘭夫，其職位自然是低一級。⁶⁵1958年3月，蒙共召開第十三次代表大會，此次中共代表團仍由烏蘭夫率領，而蘇共此次代表團的層次提高，改由政治局委員伊格納托夫（Ignatov）率領。⁶⁶

在1957年5月布加寧-澤登巴爾聯合聲明發表之前，中共和蘇聯在外蒙的關係多少還有合作的性質存在，但聲明發表之後，二者的關係已經轉為競爭了。

外蒙與中共關係得以迅速發展，除了中共的積極努力之外，外蒙本身的心態也是重要因素之一，這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外蒙領導人的心態。在喬巴山逝世之後，丹巴（D. Dam-ba）和澤登巴爾展開激烈的領導權之爭。1952年5月底，澤

註 63 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291.

註 64 Salisbury, 《外蒙簡介》，頁 11。

註 65 《人民日報》，1954年11月18日，一版。

註 66 Bartow, *op. cit.*, p. 64.

登巴爾被任命為總理。1954年4月，丹巴取代澤登巴爾擔任蒙共第一書記，但澤登巴爾仍保留總理的職位。⁶⁷在丹巴擔任第一書記的這段期間（1954年4月-1958年11月），正是中共在外蒙最活躍的時期，所以許多人認為丹巴是親中共的，但這卻未必正確，因為並沒有足夠的證據顯示。不過，雖然丹巴心中未必真傾向中共，但他的掌權對中共在外蒙的勢力發展絕對有助益，因為丹巴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不願外蒙過分親近蘇聯、依賴蘇聯。這是絕大多數外蒙人民的想法，當時在外蒙領導階層中，也有許多人持有此種想法。

在丹巴擔任第一書記期間，外蒙並未完全遵從蘇聯的要求。當蘇聯展開大規模貶史達林運動時，外蒙也批評了喬巴山，可是史達林的屍體被移出克里姆林宮，而喬巴山卻依舊留在其烏蘭巴托的陵墓中。1958年夏天，蘇聯逼迫外蒙割讓緊鄰唐努圖哇⁶⁸的一塊新發現的礦區，外蒙外長阿瓦傑德

註 67 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278.

註 68 Paul F. Langer, "Outer Mongolia, North Korea, North Viet-Nam," in Adam Bromke, ed., *The Communist States at the Crossroads*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5), p. 145. 1962年，外蒙展開另一階段的貶喬巴山運動，喬巴山的陵墓依然未受破壞，但以喬巴山命名的大學、工業組合（Combine）及省改名了。參見 Haggard, "Mongolia: The First Communist State in Asia," p. 89.

註 69 唐努圖哇即是唐努烏梁海，滿清時為中國領土，十九世紀時俄國開始大量移民此地區。1914年俄國把唐努圖哇變成自己的保護區，俄國十月革命後在此設立圖哇人民共和國，表面上是蘇聯保護下的自治國，實際上卻受莫斯科直接控制。1944年遭蘇聯吞併，成為俄羅斯共和國（RSFSR）內的自治區。蘇聯解體後，現為俄羅斯境內一共和國。

(S. Avarzed) 提出抗議，但很快被莫斯科強制撤回，阿瓦傑德也被解除外長之職，但他副總理的職務仍舊保留，可見丹巴雖然需要對蘇聯有所交代，但並不願完全屈服於蘇聯。⁷⁰

追求獨立自主是每個國家的期望，可是一旦外蒙領導人抱持著此種心態，那是絕對和蘇聯利益相衝突的，蘇聯自然要設法阻止，於是兩次的整肅行動便展開了。首次的整肅發生在 1958 年 11 月，澤登巴爾由丹巴手中奪回第一書記的職位，可是丹巴尚未完全失權，仍擔任第二書記。1959 年 3 月，展開第二次整肅，這次丹巴被逐出了政治局及中央委員會。這兩次的整肅尚包括書記處、政治局的多位人員，政府的人事也因此有所改變。⁷¹ 據說，在蘇聯國內奪權失敗而被放逐到外蒙擔任大使的莫洛托夫 (V. M. Molotov) 策畫了此次丹巴的下台。⁷²

經過兩次整肅之後，澤登巴爾的權位逐漸穩固。和丹巴相比，澤登巴爾比較傾向蘇聯，因此他的掌權自然是蘇聯所樂於支持的。相反地，中共卻不喜歡丹巴及其同夥遭到整肅。因此，蘇聯報紙對外蒙此次變動有比較詳細的報導時，中共的報紙只刊出短短一小段消息而已。⁷³ 不過，澤登巴爾一

註 70 Bartow, *op. cit.*, p. 66.; 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277.

註 71 Bartow, *op. cit.*, pp. 69-71; P. H. M. Jones, "Mongolia Between Two Fire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33, no. 7 (August 17, 1961) p. 306.

註 72 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277.

註 73 《人民日報》，1959 年 4 月 3 日，四版；Bartow, *op. cit.*, p. 71.

方面傾向蘇聯，一方面仍儘量與中共保持良好關係，企圖左右逢源。

當蘇聯決定再次鞏固其在外蒙的勢力時，這工作對蘇聯來說，一點也不困難，因為畢竟它已控制了外蒙三十餘年，而且外蒙的領導階層中有很多人受過蘇聯教育，有些人甚至娶有俄國妻子。此外，蘇聯也能提供外蒙比中共更多的援助。因此，蘇聯在外蒙的勢力很快就重新鞏固了。外蒙駐蘇聯的多位大使，回國後大多擁居高位，而駐北京的大使卸任後，除了首任大使賈爾卡賽汗外，其他人很少能在烏蘭巴托擔任重要職務。而1960年7月被任命為「蒙蘇友好協會」主席的曾德（L. Tsend），其職級也明顯高於「蒙中友好協會」主席巴爾金雅姆（D. Baljinyam）。⁷⁴

中蘇共關係生變之後，中共在1958年及1960年初宣布，內蒙將改採拉丁字母，放棄了1956年所提採用俄文字母的說法，以避免蘇聯對內蒙的可能影響。⁷⁵

1960年5月底，中共總理周恩來率團訪問外蒙，受到外蒙當局熱烈的歡迎，雙方並簽訂「友好互助條約」⁷⁶及新的經

註 74 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 275-276, 279.

註 75 《民族團結》，第二期（1958），頁6-7；第三期（1960），頁1-10；分別轉引自Rupen,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and Sino-Soviet Competition," p. 272及Dreyer, *China's Forty Millions*, p. 180.

註 76 本條約是於1960年5月31日簽訂，同年10月12日起生效。條約內容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友好條約匯編》（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頁14-17。

濟援助協定，中共除了答應提供兩億盧布的貸款外，並且答應繼續派遣華工及提供外蒙科技方面的援助。周恩來此次的訪問，使外蒙與中共的關係又達到一個高點。但周恩來此行，除了和外蒙簽約外，其最大目的是企圖把外蒙和蘇聯的距離拉遠，把外蒙拉向中共這一邊。⁷⁷

對於在 1960 年以前，中共與蘇聯在外蒙的影響力演變情形，美國政治學教授魯朋（Robert A. Rupen）曾訂了一個頗切合的時間表：

1949 年以前：蘇聯獨佔

1949-1953 年：蘇聯控制並佔絕對優勢，外蒙與中共的貿易、外交關係開始。

1953-1957 年 5 月 15 日：中共影響力增強，蘇聯影響力減低。

1957 年 5 月 15 日 -1960 年：蘇聯恢復其第一優勢，而中共繼續在外蒙活動。⁷⁸

史達林逝世之後，蘇聯因為忙於國內的權力鬥爭，對外蒙的控制自然不免放鬆，外蒙因此有了較多的自主權，而中共也正好利用這個大好時機，積極增強其在外蒙的活動。在這種情況下，外蒙與中共的關係進展迅速，而與蘇聯的關係反而減退，但在赫魯雪夫權力鞏固之後，又重新加強對外蒙的控制，恢復其在外蒙的優勢。在中蘇共關係發生變化的情

註 77 P. H. M. Jones, "Mongolia in Transitio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33, no. 5 (August 3, 1961), p. 214; Bartow, *op. cit.*, pp. 78-79; Rupen, *How Mongolia is Really Ruled*, pp. 79, 81.

註 78 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272.

況下，外蒙與中共的關係仍持續發展。可是往後中蘇共關係的演變，必然會影響外蒙與中共的關係。外蒙與中共在 1950 年代所建立起來的關係，將會產生何種變化，筆者將在下一章中繼續探討。

第三章 從搖擺到惡化的外蒙與中共關係 (1960-1966)

搖擺中的外蒙與中共關係 (1960-1963)

1960年開始，中蘇共之間的爭執日益明顯。是年4月，中共藉著紀念列寧九十週年誕辰，在《紅旗》雜誌上刊出「列寧主義萬歲」一文。¹這篇文章表面上是頌揚列寧主義，事實上卻是對蘇共和平共存修正路線的批判。

同年6月，羅馬尼亞共黨在其首都布加勒斯特 (Bucharest) 舉行第三次代表大會，中蘇共分別由彭真、赫魯雪夫率團前往參加。赫魯雪夫在會中指名攻擊毛澤東，說他是另一個史達林，除了自己的利益外，完全忽略其他人的利益。又指責毛澤東不了解真正的國際情勢。而彭真也加以反擊，強烈指責蘇共及赫魯雪夫本人。²這是中蘇共首次公開直接攻訐對方。

1960年7月，蘇聯突然撤走了它在中國大陸的大批專家及技術人員，並帶走藍圖，留下許多未完的計畫。蘇聯或許想藉此迫使中共讓步，但結果卻加深了中共的敵意。³

註1 「列寧主義萬歲」，《匪俄爭執原始資料彙編》，第一冊，頁200-242。

註2 Edward Crankshaw, *The New Cold War: Moscow V. Peking* (Baltimore, Maryland: Penguin Books, 1963), pp. 107-109.

註3 Rubinstein, *op. cit.*, p. 122.

11月，在莫斯科召開第二屆世界共黨大會，共有81個共黨組織參加，中共也由劉少奇率團參加，本來這個會議是爲了想解決中蘇共雙方的歧見而召開，在形式上雙方也有妥協之意，但在會場上，卻各堅持己見，互不退讓。⁴雙方都想利用這次大會宣揚自己的論點，爭取其他共黨的支持。在大會上，鄧小平大舉抨擊赫魯雪夫，反對他的外交政策。而由中共的表現，可看出它的目的是想取代蘇共，成爲共產運動的領導者。⁵此次大會中，雖然明顯支持中共的只有阿爾巴尼亞共黨，但在亞洲共黨中，除印度外，印尼、北韓和北越的共黨代表雖在表面上保持中立，實際上卻是支持中共的。⁶這次會議中發表一份聲明，⁷從內容看來，蘇共佔了優勢。中共本來拒絕簽字，但經過幕後的折衷，爲了維持共產集團表面的團結，中共簽了字。⁸這份聲明雖然發表了，但事後中蘇共對此聲明的解釋並不相同，雙方強調重點也不一致。第二次世共會議不但未能調和中蘇共對共產國際運動路線的歧見，反而使雙方的歧見加深。

註4 鄭學稼，《黑毛之爭》（台北：帕米爾書店，民52），頁90。

註5 Crankshaw, *op. cit.*, pp. 124-130.

註6 Donald S. Zagoria,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956-1961*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368; 葉伯棠，《中共與蘇聯衝突之研究（赫魯雪夫時期：1956-1964）》（台北：正中書局，民69），頁110。

註7 「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聲明」，《人民日報》，1960年12月6日，一—四版。

註8 葉伯棠，《中共與蘇聯衝突之研究》，頁110。

1961年10月，蘇共召開第廿二次代表大會。赫魯雪夫在會中雖未指名抨責中共，但對支持中共的阿爾巴尼亞共黨卻展開激烈的攻擊。⁹是年12月，蘇聯並且宣布與阿爾巴尼亞斷絕外交關係。相反地，中共卻一再強調與阿爾巴尼亞的友誼，對阿爾巴尼亞表示支持。

此後中蘇共的歧見日益加深，爭論的層次日益升高，雖然雙方也曾試圖改善關係，¹⁰但是由於看法的不同及利益的衝突，雙方的爭執不僅限於黨與黨之間，有把這種衝突擴大到政府與政府之間。中蘇共的衝突已成爲舉世所知的不爭事實，共產集團的領導權也一分爲二，不再完全由蘇共掌握了。

在中蘇共關係逐漸惡化的情況下，外蒙對中共的態度不免受到影響，但外蒙似乎想儘可能降低受影響的程度，在可能的範圍內，繼續與中共發展關係。而中共在無法改善與蘇聯關係的情況下，對於外蒙更是積極拉攏，即使不能使外蒙傾向中共，至少希望外蒙保持中立。至於蘇聯，它已恢復在外蒙的第一優勢，當然不願這種優勢再遭中共威脅，而且外蒙是蘇聯在處理對中共關係上的一項籌碼，因此它對有關外蒙種種問題的處理上也不敢大意。外蒙與中共的關係，就在三者這種微妙的心態下，繼續發展。

周恩來於1960年5月訪問外蒙時，曾提議要提供外蒙三十萬名華工。¹¹儘管外蒙非常需要工人，但對數量如此龐大的

註9 Zagoria, *op. cit.*, pp. 370-383.

註10 葉伯榮，《中共與蘇聯衝突之研究》，頁128、167-170。

註11 1956年時毛澤東就曾向外蒙當局提議派遣三十萬華人移往外蒙長期居住，但遭拒絕。(*Vneshniaia politika KNR*, p. 58.)

華工，心中難免有所疑懼，和蘇聯磋商後，拒絕周恩來的提議。¹²雖然三十萬名華工的建議未被接受，但1961年仍有華工進入外蒙。是年3月，外蒙代表團赴中國大陸磋商繼續提供華工之事，5月-7月便有數批華工赴外蒙工作。同時，許多華工完成的建築物也轉移給外蒙當局。¹³

1961年7月3-7日，蒙共召開第十四次代表大會，蘇共代表團由中央委員會書記蘇斯洛夫（M. A. Suslov）率領，而中共代表團仍由烏蘭夫率領，蘇氏是著名的共產理論專家，在蘇共中地位極高，對政策制定有其影響力，烏蘭夫自然是無法與其相提並論。¹⁴自蒙共十二大至十四大，蘇共代表團團長人選，其職位及重要性一再提高，而中共代表團一直由烏蘭夫率領，相形比較之下，中共似乎在作法上略遜一籌。在此次大會中，澤登巴爾強調蘇聯的角色，但也不忘提及中共對外蒙的大力援助。¹⁵

註 12 Rupen, *How Mongolia is Really Ruled*, p. 81.

註 13 《人民日報》，1961年5月11日，五版；1961年6月28日，六版。Survey of the China Mainland Press, March 24, 1961, p. 27; August 3, 1961, p. 35, 轉引自 Bartow, *op. cit.*, p. 92. Rupen 在其 *How Mongolia is Really Ruled* 一書中說，最後一批華工在1961年5月5日抵達外蒙（p. 82）。在《人民日報》1961年5月7日四版的報導中表示，這批華工共754人，是根據1960年所訂「關於中國派遣工人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國生產建設的協定」，而於1961年派遣前往外蒙的首批華工。

註 14 《人民日報》，1961年7月3日，三版；Jones, "Mongolia Between Two Fires," *op. cit.*, p. 307.

註 15 Iumzhagiin Tsendenbal, "Otchetnyi doklad tsentral'nogo komiteta mongol'skoi narodno - revoliutsionnoi partii XIV s'ezdu partii," *Kommunist* 11 (Iiul' 1961), p. 121.

從蒙共第二書記曾德於 1961 年 12 月與紐約時報記者薩利斯勃律的會談中，也可得知外蒙仍想與中共維持正常關係。當時曾德表示，外蒙與中共的關係和中蘇共爭執的結果無關，不會受其影響。外蒙想以這種態度繼續由中共、蘇聯二者手中獲取援助。¹⁶

可是外蒙企圖左右逢源的心願似乎並不容易實現。1962 年 5 月，開始有華工返回中國大陸的消息出現。5 月 16 日就有三千名華工離開外蒙。¹⁷而據報導，於 1962 年 4 月時，在外蒙的華工也僅有六千人左右，已不復往日盛況。¹⁸華工人數的大幅減少，有三個可能原因：一是基於外蒙的要求，害怕過多的華工成爲中共野心的工具；二是基於中共的政策運用，想藉撤回華工威脅外蒙勿傾向蘇聯；三是基於蘇聯的壓力，不願太多華人留在外蒙，影響蘇聯對外蒙的控制。這三個原因中，筆者認爲第三個原因的可能性最大。因爲在外蒙的華工，極盛時也不過兩萬人左右，而非周恩來所提議的三十萬人，所以華工在外蒙利多於弊，外蒙實在無需疑懼。此外，華工是中共增進對外蒙關係的有利籌碼，在外蒙的華工人數自然是多多益善，中共甚至想派遣三十萬名華工赴外蒙，又怎會撤回華工呢？而且在蘇聯對外蒙極具影響力的情況下，中共想撤回華工並不困難，但想再重新派遣華工就不是那麼容易了。所以華工返回中國大陸一事，應該不是出於

註 16 "Interview with Harrison E. Salisbury,"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7, 1961, p. 33, 轉引自 Bartow, *op. cit.*, p. 97.

註 17 《人民日報》，1962 年 5 月 17 日，三版。

註 18 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333.

外蒙或中共之心，而是蘇聯對外蒙施加壓力，逼迫外蒙要求中共撤回華工。大批華工離開外蒙，自然對勞動力原已不足的外蒙影響甚巨。

眼看本身在外蒙的勢力日漸衰退，中共當然力圖挽回。爲了爭取外蒙的好感，中共在 1962 年 12 月 26 日和外蒙簽訂「邊界條約」。¹⁹ 根據條約的內容，可知這是中共對外蒙的一項讓步，因爲在發生爭議的一萬七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外蒙取得了一萬兩千平方公里。²⁰ 哈嘎德(M. T. Haggard)認爲這項條約是中共對外蒙獨立的再度承認，²¹ 但筆者認爲這並非中共的本意，藉此讓步以爭取外蒙的親善才是中共原來的想法。

但是這項邊界條約似乎並未給中共帶來預期的效果。在條約簽訂兩週之後（1963 年 1 月 8 日），澤登巴爾就在蒙共一次有關意識型態的會議上，重覆前一天蘇共真理報對中共的攻擊，指名訐責中共爲教條主義者和冒進主義者。澤登巴爾

註 19 《人民日報》，1962 年 12 月 27 日，一版；1963 年 3 月 26 日，三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文件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4），第九集（1962），頁 405-420；《人民手冊 1963》（香港：大公報社，1963），頁 204-209。

註 20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uary 6, 1964, p. 2, 轉引自 Bartow, *op. cit.*, p. 118. 但若依照吳熙憲根據民國 64 年弘道文化事業公司出版的《蒙古地區現代演變圖》計算而得出的結果，則中共喪失了長六千公里，縱深約平均一百公里以上的土地。詳細內容參見吳熙憲，「毛、蒙分界後，失地之多少？」，《問題與研究》，16 卷 2 期（民 65 年 11 月），頁 193-196。

註 21 Haggard, "Mongolia: The First Communist State in Asia," p. 107.

的這些話等於宣布在中蘇共衝突中支持蘇共，對中共自然是一大打擊。1963年3月22日，中共也刊出澤登巴爾這番話，表示中共明白外蒙在中蘇共爭執中是採取親蘇的態度。²²

在中蘇共的爭執中，外蒙會支持蘇共必定是因為蘇聯能提供外蒙更多援助的緣故。這些援助不僅限於經濟方面，也包括外交方面。外蒙一直想打破其封閉的困境，擴展對外關係，多和外界(尤其是自由世界)聯繫，以爭取更多成爲一個獨立自主國家的可能性。外蒙在1961、1962年時，經由蘇聯的幫助，達成了部份心願。

自聯合國成立以來，外蒙一直想加入這個最重要的國際組織，但由於它濃厚的附庸色彩，無法令國際間承認其爲獨立自主的主權國家，所以一直無法加入。後來蘇聯改採整批交易的方式，試圖挾帶外蒙進入聯合國。1960年，蘇聯把外蒙的入會問題和非洲茅利塔尼亞(Mauritania)的入會問題扯在一起，威脅我國，若我國否決外蒙入會，則蘇聯將否決茅利塔尼亞入會。當時非洲國家都熱切希望茅利塔尼亞能成爲聯合國會員，因此他們也要脅我國，若我國導致茅利塔尼亞無法入會，則當聯合國大會討論中國問題時，他們將支持由中共政權取代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在慎重考慮之下，我國不得不棄權，以方便茅利塔尼亞的入會並維持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外蒙就在這種情況下，於1961年10月28日加入聯合國。²³在表決外蒙入會問題時，安理會的十一個會員國中，除

註 22 *Pravda*, January 10, 1963, pp. 3-4, 轉引自 Bartow, *op. cit.*, pp. 119-120; 《人民日報》，1963年3月22日，六版。

註 23 Thomas Perry Thornto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Asian Communist Satellites," *Pacific Affairs*, vol. 35, no. 4 (Winter 1962-1963), p. 343.

我國外，美國也棄權，未參加表決。²⁴

對於外蒙成爲聯合國的會員，中共雖然在表面上表示祝賀之意，但實際上中共內心未必樂意，因爲中共當時尚被排除在聯合國之外，而且一旦外蒙進入聯合國，則它和中共的主要敵人—美國—的關係或多或少都會有所改善。事實上，1961年時，美國爲了便利監聽中蘇共關係的發展，曾有心與外蒙建交，但遭我國反對，所以並未實現。²⁵後來也曾數度傳聞美國要和外蒙建交，但雙方直至1987年1月才正式建交。

除了挾帶外蒙進入聯合國，以便利蘇聯在國際事務上的運用外，蘇聯並在1962年6月7日讓外蒙加入「經濟互助委員會」(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簡稱爲CMEA或Comecon)。外蒙是當時經互會中唯一的亞洲國家，它得以進入經互會，似乎是蘇聯對中共的一種懲罰，因爲中共並未能加入這個組織。此外，也可能包含了些許經濟動機在內。²⁶一旦外蒙加入經互會，勢必與蘇聯集團進一步結合，這也有助於拉遠外蒙與中共的距離。當然，加入經互會也是蘇聯對外蒙忠心的一種獎勵。

成爲聯合國和經互會的一員，對外蒙自然有很大的幫助。前者使其得以進入國際舞台，增加與非共產國家之間的接觸，而且因此獲得許多國家的外交承認；後者使外蒙獲得

註 24 Haggard, "Mongolia: The First Communist State in Asia," p. 115.

註 25 Jones, "Mongolia Between Two Fires," p. 307.

註 26 Rupec, *How Mongolia is Really Ruled*, p. 79; P. H. M. Jones, "Jenghiz Over Mongoli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37, no.4 (July 26, 1962), p. 165.

東歐共產國家更多的援助。能夠加入這兩個組織，完全是由於蘇聯的協助，外蒙自然對蘇聯心存感激，這多少會影響日後外蒙對中共的態度。

民族主義在外蒙與中共的關係上是一項不可輕忽的因素，中共也常常加以運用。因此，蒙古人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成吉思汗－的誕辰紀念也成為中共運用的大好時機。

1962年恰逢成吉思汗八百週年誕辰紀念。在是年6月的頭兩個星期內，中共在內蒙伊金霍洛的成吉思汗陵墓處舉行盛大的紀念會，參加的人數高達三萬名，包括蒙人、漢人及回教徒。紀念會的儀式根據蒙古傳統習俗舉行，中共內蒙自治區的副主席並且在紀念會上大事讚揚成吉思汗的成就。6月22-26日並在內蒙舉行學術會議，對成吉思汗重新加以評價。根據中共的報導，與會學者一致承認成吉思汗是位偉大的軍事領袖及政治家，但對成吉思汗各項作為評價有好有壞，基本上認為他是個帶有些許缺失的建設性人物。他們強調成吉思汗在統一蒙古部族及奠定元朝統一中國的基礎上有其貢獻，但批評蒙人進入中原時造成的破壞。對於蒙古的西征，與會學者認為這雖然造成西方的破敗，但卻促進了中西文化及經濟的交流，而且西征造成的破壞反而促進某些地區的統一與進步。²⁷

外蒙官方的紀念會是在5月31日舉行。在二個星期前，外蒙科學院院士達姆丁蘇倫（T. S. Damdinsüren）就在第三屆

註 27 《人民日報》，1962年6月19日，一版；Paul Hyer, "The Re-evaluation of Chinggis Khan: Its Role in the Sino-Soviet Dispute," *Asian Survey*, vol. 6, no. 12 (December 1966), pp. 698-699.

作家會議上，指責學校不重視歷史課程，忽略成吉思汗的重要性。紀念會當天，外蒙科學院的歷史研究所舉行會議，參加者包括學者及文化界人士，有蒙人，也有外國人。外蒙著名的歷史學家納察克多爾濟（S. H. Natsagdorj）在會議上，讚揚成吉思汗在組織、政治和軍事各方面的才能，並且認為成吉思汗採用畏兀字母（Uighur Script）對於蒙古文化的發展有莫大貢獻，而大札薩（Jasagh，札薩即法典之意）更是成吉思汗的文化成就。又說，成吉思汗的確征服了歐亞許多國家，但這些反動的行為並不影響他成為一個歷史人物，也不影響他對社會發展的貢獻。外蒙為了紀念成吉思汗八百週年誕辰，在成吉思汗的出生地－肯特省（Khentei Aimagh）的迭里溫孛勒荅黑（Delum Boldog）－建造一座高達 36 呎的紀念碑，並且發行紀念郵票。²⁸

外蒙大力讚揚成吉思汗及熱烈紀念其八百週年誕辰的情況很快有了完全不同的轉變。這是因為蘇聯對成吉思汗展開尖刻批評的緣故，而蘇聯的批評是不可忽視的，於是外蒙當局不得不把熱心推崇成吉思汗的人加以整肅，領導這次紀念活動的蒙共政治局委員兼中委會書記吐莫·奧其爾（D. Tömör-Ochir）便首當其衝，在 1962 年 9 月遭到整肅。10 月 18 日，蒙共真理報（Ünen）批評吐莫·奧其爾進行反黨活動、鼓吹民族主義及崇拜成吉思汗；並且說，成吉思汗除了在統

註 28 Hyer, "The Re-evaluation of Chinggis Khan: Its Role in the Sino-Soviet Dispute," pp. 697-698. 紀念碑及紀念郵票可參見 Charles Bawden 所著 *The Modern History of Mongolia* 一書中的照片附頁。後來此套郵票被撤銷。（Bawden, p. 418.）

一蒙古部族、建立蒙古國一事上扮演建設性的角色外，後來的行動完全是反動的。納察克多爾濟、達姆丁蘇倫等人也被迫進行自我批判。²⁹

成吉思汗八百週年誕辰正值貶史達林及貶喬巴山的熱潮，蘇聯自然不願有個人崇拜色彩的成吉思汗紀念活動進行，所以成吉思汗就成了政治運作下的犧牲品，一個雄才大略的歷史人物被貶成反動份子。法國 1975-1978 年駐外蒙大使布帖業 (G. de Bouteiller) 曾表示，他在外蒙時仍看不到任何讓人憶起成吉思汗的東西，沒有他的雕像，現鈔和郵票上也沒有他的畫像。³⁰ 而從這次成吉思汗八百週年誕辰事件的演變情形，可知道中共的目的並未達成。

外蒙第二號人物曾德在 1963 年 12 月也遭到決定性的整

註 29 Hyer, "The Re-evaluation of Chinggis Khan: Its Role in the Sino-Soviet Dispute," pp. 699-702. 有關成吉思汗八百週年誕辰的概念、紀念活動的籌備與進行、以及後來的發展，參見 J. Boldbaatar, "The Eight-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Chinggis Khan: The Revival and Suppression of Mongolia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Stephen Kotkin and Bruce A. Elleman, eds., *Mongoli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andlocked Cosmopolitan*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9), pp. 237-246. 關於此一事件，亦參見 Bawden, *op. cit.*, pp. 417-419.

註 30 Georges de Bouteiller, "La Mongolie Dans le Conflit Sino-Sovietique," *Defense Nationale* 36 (Juin 1980), p. 77. 外蒙民主改革之後，成吉思汗再度成為蒙古人的歷史英雄，他的名字、畫像出現在鈔票、酒類及各種事物上，有關成吉思汗的研究也大幅增加。參見廖淑馨，「民主改革後外蒙對成吉思汗的評價」，《成吉思汗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蒙藏委員會，民 87），頁 179-190。

肅，被解除了政治局委員、第二書記、中委會委員及大呼拉爾主席等職務。他被控的罪名之一是支持民族主義，但事實上他是因為企圖要取代澤登巴爾才遭到整肅的。³¹曾德因為想削減澤登巴爾的勢力，所以在作法上配合外蒙民族主義高漲的傾向，反對完全親蘇的路線，並且宣稱華工的撤回對外蒙經濟發展有害。³²他的態度被認為有親中共的傾向，但從他所受俄式教育、曾任蒙蘇友好協會主席、多次發表反中共的言論等情況看來，這種看法未必正確。³³他遭到罷黜，應該是權力鬥爭的結果。

1963年5月29日，外蒙經濟代表團抵達北京，討論中共對外蒙經濟技術援助問題。這個代表團在中國大陸整整停留了一個月，但卻沒有獲致任何結果，也未訂立新的經濟協定。³⁴是年，更多的華工離開外蒙。9月22日有309名華工返回中國大陸，10月9日又有七百多名華工離開。³⁵留在外蒙的華工人數更少了。

在外蒙華工人數的銳減使得中共在外蒙的影響力減小，而外蒙在中蘇共爭執中支持蘇聯的態度也大致確定，即使中共在邊界條約上多所讓步似乎也無濟於事。外蒙與中共關係

註 31 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 322-323.

註 32 Bartow, *op. cit.*, p. 101.

註 33 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323.

註 34 *Current Background*, November 4, 1963, p. 24; SCMP, July 8, 1963, p. 36, 轉引自 Bartow, *op. cit.*, p. 123.

註 35 《人民日報》，1963年9月24日，三版；1963年10月10日，三版。

發展至此，再也無法恢復 1950 年代的熱絡情形了。

外蒙與中共關係開始惡化(1963-1966)

華工赴外蒙幫助各項建築工程是外蒙與中共在 1950 年代後半關係迅速增進的重要因素之一。華工「藍色螞蟻」的勤勞形象，贏得外蒙的感謝。而華工集居一處，與蒙人隔離，可避免雙方產生爭執。³⁶ 在這種情形下，華工與外蒙的關係一向良好。1962 年 5 月部份華工返回中國大陸時，外蒙爲其舉行歡送會，並發表聲明，讚揚華工的巨大貢獻。而華工們爲了提醒外蒙並對外蒙要求撤回華工表示抗議，在 1963 年 3 月 20-23 日的華工及技術人員會議上，提到已有 67 名華工爲了幫助外蒙的建設而犧牲了自己的性命。³⁷

但隨著外蒙與中共關係的變化，在外蒙表示支持蘇共之後，華工在外蒙的形象也有了變化。1963 年 6 月，外蒙外交部向中共提出正式函件，抗議在烏蘭巴托的華工散發書報，散播中共領導們對許多重要問題的錯誤觀點。³⁸

1964 年續有華工離開外蒙，外蒙官員在歡送會上照例讚揚華工的表現，並且頒贈華工勳章、獎狀。³⁹ 中共新華社 1964 年 6 月 22 日電訊透露，到 6 月 21 日爲止，已有 27 批華

註 36 Romance, *op. cit.*, pp. 156-157.

註 37 《人民日報》，1963 年 3 月 26 日，四版。中共新華社烏蘭巴托 1964 年 4 月 5 日電訊表示，已有八十多名華工犧牲性命。（《人民日報》，1964 年 4 月 6 日，三版）

註 38 *China News Analysis* 534 (September 25, 1964), p. 3, 轉引自 Bartow, *op. cit.*, p. 123.

註 39 《人民日報》，1964 年 4 月 24 日，四版。

工離開外蒙，返回中國大陸。⁴⁰又說，這 27 批華工共五千兩百多人，而留在外蒙的九百多名華工短期內也要返回。⁴¹是年 7 月 8 日，此波離蒙華工中的最後一批返回中國大陸。⁴²對於華工離開外蒙一事，外蒙與中共雙方說法不同，外蒙說華工離開外蒙是因為契約期滿的緣故，而中共說是基於外蒙的要求，意指外蒙主動毀約。外蒙並且拒絕再與中共簽訂新的華工供應協定。⁴³中共的華工政策到此告一段落。

除了華工問題外，1964 年另有一事對外蒙與中共關係影響甚大。毛澤東在是年 7 月 10 日向日本訪問團表示，中共曾在 1954 年向赫魯雪夫提及外蒙問題，但遭拒絕討論。此事在 1964 年公布後，蘇聯指稱當時中共企圖併吞外蒙。外蒙對此事反應激烈，不但抨擊中共對外蒙的野心，而且批評毛澤東本人，說他暴露了真面目，又說中共對外蒙的野心證明中共是種族主義及擴張主義者。⁴⁴毛澤東向日本訪客公布此事，本意可能是想提醒外蒙，讓外蒙認清蘇聯把外蒙當附庸的事實，但卻讓蘇聯反咬一口，造成外蒙對中共更加仇視。

中共為了爭取外蒙的好感，在言論方面十分謹慎，儘管外蒙對中共時有批評，但中共絕少反擊。在外蒙與中共組成

註 40 這 27 批華工是從 1964 年 4 月 24 日算起，非從 1962 年 5 月算起。參看《人民日報》，1964 年 4 月 26 日，四版。

註 41 《人民日報》，1964 年 6 月 24 日，一版。

註 42 《人民日報》，1964 年 7 月 10 日，四版。

註 43 M. T. Haggard, "Mongolia: The Uneasy Buffer," *Asian Survey*, vol. 5, no. 1 (January 1965), p. 20.

註 44 同前註，p. 19.

的聯合勘界委員會舉行三次會議之後，雙方於 1964 年 6 月 30 日在烏蘭巴托簽訂「邊界議定書」。⁴⁵1965 年 9 月 29 日，中共外長陳毅在記者會中答覆香港記者有關中共為何與外蒙畫界一事時表示，中共承認外蒙為社會主義國家，雙方之間畫界是很自然的。他也表示反對大漢族主義。又說，雖然外蒙領導集團追隨赫魯雪夫修正主義者反對中共，但中共並不因此撤消對外蒙的援助。陳毅最後還說，是否認為和中共合作更為有利，要由蒙古人民自己抉擇，中共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他們身上。⁴⁶陳毅的這番話雖然表達的並非中共內心真實的想法，而且中共對外蒙的援助已經大幅減少（這是因為中共本身經濟情況不好，蘇聯對中共的援助也已停止，而且外蒙又已明顯支持蘇聯的緣故），在 1965 年時，中共幫助外蒙修建的工程，其中有七項進行，四項未完成，十二項根本就未開始；⁴⁷但從陳毅的這番話，仍可明顯看出中共不遺餘力爭取外蒙好感的心態。

1964 年還有許多事情對外蒙與中共關係具有負面影響。是年 1 月，澤登巴爾不顧中共和印度之間的戰鬥，致電印度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對印度表示支持，這自然是中共不友好的表示。⁴⁸是年 5 月，外蒙國防部長宣布將擴大慶祝哈勒欣河戰役勝利廿五週年紀念。特別強調這個戰役是以

註 45 《人民日報》，1964 年 6 月 15 日，三版；1964 年 7 月 3 日，三版。

註 46 《人民日報》，1965 年 10 月 7 日，二版。

註 47 Rupen, *How Mongolia is Really Ruled*, p. 90.

註 48 Langer, "Outer Mongolia, North Korea, North Viet-Nam," pp. 145-146.

往未曾有的事。⁴⁹ 外蒙這個行動分明是對中共的一項警告，把中共比成 1939 年的日本，當時蘇聯和外蒙的聯軍打敗了日本侵略者。

是年 6 月，外蒙公布了蒙共在 1939 年年底第五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所通過的一項決議。這是有關國際共產運動中的爭論及蒙共地位的決議，在此決議中，中共遭到全面的批評，而且外蒙明確站在蘇聯那邊，這項決議的公布，可能與 1964 年 2 月蘇斯洛夫在蘇共中委會會議上公開大事抨擊中共有關。⁵⁰ 而蒙共延遲了半年才公布這項決議，可能是早先仍想與中共維持較友好關係的緣故。

1964 年 8 月有報導指出，中共已關閉所有經中國大陸到外蒙的貿易通路，外蒙被迫使用較長且花費較大的經由西伯利亞的貿易通路。⁵¹ 在此之前，中共早已降低到烏蘭巴托的鐵路貨運。是年中共並且把由集寧到外蒙邊界的鐵路改為標準

註 49 *New York Times*, May 24, 1964, p. 8, 轉引自 Romance, *op. cit.*, p. 196.

註 50 Romance, *op. cit.*, p. 195. 蒙共中委會在 1963 年 12 月 22 日的決議中，提及近年來中共領導們公開攻擊世界共產運動的總路線，而這個總路線是 1957、1960 年各個共黨共同發展出的。1964 年 6 月 12 日，蒙共中委會寫給中共中委會一封信，強調中共領導們分裂、破壞的伎倆嚴重威脅社會主義合作的統一和世界共產運動，把共產主義者和勞動階級的注意力拉離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參見 O. B. Borisov and B. T. Koloskov, *Soviet-Chinese Relations, 1945-1970*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250.

註 51 蒙藏敵情月報》，5 期，頁 1。

軌距。⁵² 這二項措施應該是針對蘇聯而設，既懲罰蘇聯，也有助於中共邊界的安全，但對外蒙也造成嚴重打擊，或許這也是中共對外蒙支持蘇聯所給予的懲罰吧！

華工與蒙人在 1964 年兩度發生鬥毆衝突事件，均導致外蒙向中共使館提出抗議。⁵³ 是年外蒙並且就中共使館散發刊有不當言論的資料一事提出第四度抗議，認為中共使館這種宣傳活動已構成對外蒙內政的干預。前三次的類似抗議分別在 1963 年 3 月、7 月、9 月提出。⁵⁴

由於中蘇共關係的惡化，1964 年 9 月有報導指出，中共在與外蒙邊界上聚集了部份軍隊，中共這個行動一方面是爲了邊防安全，一方面也有可能是爲了防止內蒙人民逃往外蒙。⁵⁵

赫魯雪夫在 1964 年 10 月遭到罷黜，布里茲涅夫 (Leonid I. Brezhnev) 當選爲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而柯錫金 (A. Kosygin) 被任命爲部長會議主席。⁵⁶ 儘管中共反對召開而且

註 52 Moses, "Inner Asi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ole of Mongolia in Russo Chinese Relations," p. 70.

註 53 一次是因爲工資問題發生鬥爭，導致十五名華工、蒙人受傷送醫。另一次是發生在烏蘭巴托舉行的外蒙與中共自行車比賽時，數名華人毆打一名外蒙觀眾，並且向外蒙選手投擲石子，迫使外蒙選手離開賽車道。參見《蒙藏敵情月報》，4 期，頁 3；張大軍，《外蒙古現代史》，第五冊，頁 2124-2125；Haggard, "Mongolia: The Uneasy Buffer," p. 21.

註 54 Haggard, "Mongolia: The Uneasy Buffer," pp. 20-21.

註 55 同前註，pp. 19-20.

註 56 「赫魯雪夫下台」，《匪俄爭執原始資料彙編》，第六冊，頁 287。

拒絕參加，但 1965 年 3 月 1-5 日仍然在莫斯科召開了十九個共黨⁵⁷參加的協商會議（Consultative meeting），在會議中主張「停止具有對兄弟黨不友好的和侮辱性質的公開論戰」。⁵⁸雖然中共認為此次會議是一個分裂會議，認為蘇共新的領導階層仍舊是沿循著赫魯雪夫修正主義的路線，因此並未停止對蘇聯的攻擊，但蘇聯對中共的抨擊卻有減少的現象。外蒙追隨蘇聯的作法，在 1965 年對中共的批判也暫停，所以外蒙與中共在 1965 年的關係顯然較為平靜。⁵⁹

1965 年外蒙與蘇聯的關係更加密切，雙方互訪頻繁。是年 1 月 27 日，蘇共主席團委員謝勒平（A. N. Shelepin）率團前往外蒙訪問十天。他不但訪問了烏蘭巴托，也到了接鄰內蒙的南戈壁省，當地的第一書記甫於 1964 年 12 月遭到整肅。據報導，外蒙部份地區有反蘇傾向，尤其是緊鄰內蒙的戈壁地區。⁶⁰外蒙存有反對澤登巴爾的勢力，一方面反對澤登巴爾過於親蘇的路線，一方面也反對澤登巴爾本人的獨裁作風。蘇聯和澤登巴爾絕對不容許這種勢力的存在，於是整肅行動便無法避免，1964 年 12 月召開的蒙共中央委員會會議便是一

註 57 蘇聯本來邀請二十六個共黨參加，但阿爾巴尼亞、北越、印尼、中共、北韓、羅馬尼亞、日本等七個共黨未參加。「評莫斯科三月會議」，《匪俄爭執原始資料彙編》，第六冊，頁 106。

註 58 「評莫斯科三月會議」，《匪俄爭執原始資料彙編》，第六冊，頁 115。

註 59 M. T. Haggard, "Mongolia: New Soviet Moves to Bolster Ruling Group," *Asian Survey*, vol. 6, no. 1 (January 1966), p. 13.

註 60 Bartow, *op. cit.*, pp. 140-141.

個整肅會議，⁶¹而謝勒平的訪問和蒙共內部的紛爭多少有所關聯。1965年蒙共內部大致已平靜，但對那些「反對份子」仍有批判。⁶²

1965年4月11-23日，澤登巴爾率外蒙高級官員訪問蘇聯，布里茲涅夫、柯錫金親往機場迎接。訪問期間外蒙代表團的各項動態在蘇聯報紙上均刊載於頭版上。這次訪問的結果是雙方簽訂了新的經濟與技術合作協定，⁶³蘇聯將在外蒙第四個五年計畫（1966-1970）中提供六億六千五百萬盧布的援助，此項援助大約佔外蒙這個五年計畫總投資額的三分之一。除了金錢的援助外，蘇聯並且答應幫忙外蒙建造房屋和公共建築物。8月，又宣布要協助外蒙訓練大批建築工人，已緩和華工離開外蒙後產生的勞工不足問題。⁶⁴

註 61 這次會議開除了參加「反黨派系活動」的中央委員三人：柴·洛呼茲（Loohuudz）、柏·梁門布（Nyambuu）、柏·蘇爾馬沙夫（Surmaajav）。梁門布就是南戈壁省第一書記。從這次整肅就可看出中共曾在外蒙建立「蒙古民族上層分子」的派系組織，也可得知蘇聯是在竭力防止外蒙投向中共。參見王啓中譯，「今日偽蒙」，《今日大陸》，238期（民54年8月16日），頁24-25，本文譯自1965年5月28日西德《播種》周刊；《蒙藏敵情月報》，10期，頁2；Alan Sanders, "A Purge Postscrip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24, no. 14 (April 5, 1984), p. 40.

註 62 Haggard, "Mongolia: New Soviet Moves to Bolster Ruling Group," pp. 14-15.

註 63 內容參見 *Sovetsko-mongol'skie otnosheniia 1921-1974*, tom 2, chast' 1, pp. 498-504.

註 64 Bartow, *op. cit.*, p. 142.

外蒙與中共在 1965 年仍保持接觸，雙方在 3 月 24 日簽訂了例行的年度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⁶⁵4 月 25 日，中共工會代表團赴外蒙參加五一國際勞動節慶祝活動，由黑龍江省總工會副主席于雄飛率領。⁶⁶5 月 30 日，雙方致電祝賀彼此友好互助條約簽訂五週年。⁶⁷6 月 9 日在烏蘭巴托簽訂雙方文化合作協定 1965 年執行計畫。⁶⁸當天外蒙射箭隊也到達中國大陸訪問比賽。⁶⁹7 月及 10 月時，雙方也各有慶祝對方國慶的活動。⁷⁰9 月底及 11 月初中共分別把興建完成的烏蘭巴托-那萊哈（Nalaikha）煤礦公路和位於色楞格省的布東（Budun）大橋移轉給外蒙。⁷¹外蒙並且在 11 月的聯合國會議上支持中共加入聯合國。⁷²從這些接觸可看出，這都是例行性的活動，沒有什麼特別意義，只能證明雙方還有接觸而已。

據紐約時報報導，1965 年夏天時仍有四千五百名華工留

註 65 《人民日報》，1965 年 3 月 26 日，六版。

註 66 《人民日報》，1965 年 4 月 26 日，五版。

註 67 《人民日報》，1965 年 5 月 30 日，四版。

註 68 《人民日報》，1965 年 6 月 14 日，五版。

註 69 《人民日報》，1965 年 6 月 10 日，四版。

註 70 《人民日報》，1965 年 7 月 10 日，三版；《蒙藏敵情月報》，19 期，頁 1。

註 71 《蒙藏敵情月報》，18 期，頁 1-2；《人民日報》，1965 年 11 月 7 日，三版；A. J. K. Sander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Mongol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42.

註 72 《蒙藏敵情月報》，20 期，頁 1。

在外蒙，但相信是年年底前將全部撤回。⁷³而1961年開始興建的達爾罕（Darhan）工業中心，在1965年也興建完成。達爾罕原本是周恩來在1960年提議要幫外蒙建造一座鋼廠的所在，但是後來這個工業中心完全是由蘇聯幫忙興建，華工並未參加這個工程，達爾罕工業中心也沒有設置鋼廠。⁷⁴蘇聯無意幫助外蒙發展鋼鐵工業，它所希望的只是開採外蒙的煤、鐵及其他礦產，以供應蘇聯本身的需要。

1966年1月12日，布里茲涅夫率團抵達外蒙訪問，15日雙方簽訂為期二十年的「友好、合作與互助條約」。這個條約中的第五款具有特別意義，它規定蘇蒙雙方「將聯合採取所有必要辦法，包括軍事辦法，已確保兩國的安全、獨立及領土完整」。⁷⁵雙方並簽有祕密議定書，讓蘇聯軍隊重新駐防外蒙，但這項議定書只是確認事實而已，實際上蘇軍早已回駐外蒙了。它所駐防的主要地區是外蒙與中共交界處。⁷⁶1965

註 73 *New York Times*, August 9, 1965, p. 2, 轉引自 Bartow, *op. cit.*, p. 143. 最後一批華工也可能是在1966年撤走。（Rupen, *How Mongolia is Really Ruled*, p. 183, note 8.）

註 74 Rupen, *How Mongolia is Really Ruled*, p. 82; Haggard, "Mongolia: New Soviet Moves to Bolster Ruling Group," p. 16.

註 75 *Sovetsko-mongol'skie otnosheniia 1921-1966*, pp. 320-322; 張大軍，〈外蒙古現代史〉，第五冊，頁2341-2342。

註 76 Robert A. Rupen,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The Slow Evolution," *Asian Survey*, vol. 7, no. 1 (January 1967), pp. 18-19. 蘇軍約在1961年就已重新駐防外蒙。（《外蒙共黨之真相》，頁555）

年 12 月 25 日，中共就曾抗議蘇聯軍隊侵擾中國大陸邊界。⁷⁷

蘇聯與外蒙在 1966 年簽訂的這項條約和 1946 年的條約有所不同：(1)簽訂舊約的蘇方代表是當時外交部長莫洛托夫，而新約是由蘇共第一書記布里茲涅夫代表簽約的；(2)舊約條款只有三項，而新約增為十項；(3)舊約時限是十年（1956 年時又延長十年），而新約時限是二十年。⁷⁸從這三點看來，外蒙與蘇聯的關係更加密切。而此次布里茲涅夫訪問外蒙是蘇共最高領導人首次訪問外蒙，由此也可看出蘇聯對外蒙的重視；但這不是因為外蒙本身的緣故，而是因為中蘇共關係惡化而導致外蒙地位更加重要的緣故。事實上，蘇聯對外蒙的各種援助大多是基於政治上的考慮。對於這項條約的簽訂，中共認為這是蘇聯企圖圍堵中共的表現，抨擊蘇聯準備配合美國對抗中共。⁷⁹

綜觀 1960-1966 年（周恩來訪問外蒙－布里茲涅夫訪問外蒙）外蒙情勢的發展，我們可以發現，外蒙與蘇聯的關係日益增進，而與中共的關係卻每下愈況。雖然周恩來在中共「大躍進」失敗、經濟挫敗時仍答應提供外蒙大筆援助，雖然中共在邊界條約上對外蒙多加讓步，但已無法挽回頹勢，1950 年代後半的美景已經一去難返了。

註 77 *Radio Peking*, June 20, 1966, 轉引自 Maury Lisann, "Moscow and the Chinese Power Struggle,"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18, no. 6 (November/December 1969), p. 36.

註 78 Bartow, *op. cit.*, p. 144.

註 79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1966)* (Stanford,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p. 344.

1960-1963年，外蒙與中共的關係雖因蘇聯的阻擾而有停頓或稍降的情況，但外蒙仍在中共、蘇聯間搖擺，仍未下定決心，表明支持蘇聯的立場。對於中共很少直接指責，即使有所指責也都較為溫和且限於意識型態上的指責。

1964年起，外蒙與中共的關係步入另一階段。外蒙已明顯表達支持蘇聯的決心，對中共的指責也較強烈，而且由意識型態上的指責進展為實質上的指責（如對中共領土野心的指責）。中共對外蒙支持蘇聯的作法也採取了些許的報復行動（如減少援助、關閉貨運路線）。但雙方儘管關係有所惡化，官方正常接觸卻仍然維持著。

雖然對外蒙關係受挫，中共爭取外蒙的心態並無改變。它大事慶祝成吉思汗八百週年誕辰，以符合外蒙人民強烈的民族情感，企圖利用在邊界條約上的讓步博取外蒙的好感，而且中共在言論上從未對外蒙有任何抨擊，它所抨擊的對象都是蘇聯。雖然用心良苦，可惜時不我與，一切都是枉然。

外蒙本來一直想在蘇聯和中共之間保持中立，以求左右逢源，得到更多援助，而且想藉此爭取更多獨立自主的可能性，為何又放棄中共，投向蘇聯呢？主要原因有下列幾點：(1)無論是在經濟、科技或外交方面，蘇聯能提供給外蒙的援助比中共多；(2)中共人口眾多，對外蒙在心理上造成威脅，外蒙害怕中共的殖民及領土野心（尤其有內蒙的例子作為殷鑒），而蘇聯人口較少，對外蒙這方面的威脅自然較小；(3)中蘇共關係的惡化迫使外蒙必須做一決定，若不投向一方，可能變成中蘇共雙方的敵人；(4)澤登巴爾較為親蘇的作法在外蒙境內有反對力量，為確保自己的權位，澤登巴爾更需藉

助蘇聯的力量，以整肅其對手。

1961-1964 年期間，外蒙和中共的貿易減少為十分之一，而由於中共和蘇聯、東歐貿易量大減，使得通過外蒙的鐵路運輸量降低了六倍。外蒙由烏蘭巴托到北京鐵路貨運所得到的收入由 1958 年的三千萬盧布降至 1963 年的九百萬盧布，1966 年更降至三百三十萬盧布。⁸⁰ 此外，在外蒙的華工也由 1960 年的一、兩萬人降到微不足道之數，華工與蒙人之間的衝突也開始提及。由小觀大，從這些地方便可看出外蒙與中共關係已走向下坡了。

註 80 *Vneshniaia politika KNR*, p. 63；張大軍，《外蒙古現代史》，第六冊，頁 2567。

第四章 持續惡化的外蒙與中共關係 (1966-1979)

文革浪潮沖激下的外蒙與中共關係 (1966-1969)

外蒙與蘇聯在 1966 年簽訂「友好、合作與互助條約」之後，雙方關係更加密切，而外蒙與中共的關係卻日趨惡劣。自中共政權建立以後，蒙共每次舉行代表大會（十二大-十四大），中共均鄭重其事地派代表團參加，藉機向外蒙示好，但是年 6 月，蒙共舉行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中共卻沒有派代表參加。這件事被倫敦每日電訊報視為中共退出外蒙的一種跡象，認為中共已承認外蒙完全為蘇聯的勢力範圍。¹

早在 1966 年 3 月時，中共就已經被外蒙蓄意忽視。當時澤登巴爾曾在蒙共刊物「黨的生活」（*Namyn Amdral*）上提及外蒙經濟的進步，認為外蒙能完全改變其落後的面貌，除了歸功於外蒙人民的勤勞不倦外，也要感謝蘇聯、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東德及波蘭等國所給予的幫助。²澤登巴爾在感謝的名單中，故意遺漏中共，這是以往未曾有的事。即

註 1 《蒙藏敵情月報》，27 期，頁 1；*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1966)*，p. 344.

註 2 Yu. Tsendenbal, "Revolutionary Party and Social Reforms," *Namyn Amdral* 3 (March 1966), pp. 3-16 in *JPRS*: 39, 091 (December 13, 1966), p. 10, 轉引自 Bartow, *op. cit.*, p. 156.

使當初外蒙驅逐華工的時候，都不免舉行歡送會，對華工給予外蒙的協助加以感謝一番，而今澤登巴爾提及東歐五國的幫助，卻沒有提到援助不知超過這五國援助總和多少倍的中共，這顯然是故意的。此外，在是年7月外蒙革命四十五週年的慶祝會上，澤登巴爾的演說中也只提及外蒙與蘇聯的密切關係和蘇聯的重要援助，對中共的援助仍然不置一語。³澤登巴爾這種作法，該是中共當初大幅援助外蒙時所意想不到的吧！

1966年6月20日，中共向外蒙提出抗議，指稱外蒙邊防軍在是年4月1日越過邊界進入內蒙，並且綁架了一名牧人，將其非法拘禁達二十七天之久。⁴

中共雖然沒有派代表團參加蒙共十五大，但在1966年7月仍然派遣代表團參加外蒙革命四十五週年慶祝大會。⁵這表示外蒙與中共黨與黨的關係已不存在，但國與國的關係仍然存在，只是這種關係已經相當淡薄，從1966年雙方的接觸都是些例行性接觸（如簽訂年度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簽訂科技合作執行計畫議定書、簽訂年度文化合作協定執行計畫，祝賀對方國慶）⁶便可得知。此外，是年10月1日合衆國際

註3 *Unen*, July 11, 1966, pp. 2-4 in *JPRS*: 38,094 (October 11, 1966), pp. 5-9. 轉引自 Bartow, *op. cit.*, p. 160.

註4 Sander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Mongolia*, p. 43.

註5 《人民日報》，1966年7月8日，五版。

註6 《人民日報》，1966年3月29日，四版；1966年6月2日，五版；1966年9月30日，四版；1966年7月11日，一版；1966年10月1日，八版。

社倫敦電訊透露，中共爲了誘使外蒙脫離蘇聯懷抱，曾向外蒙提議與內蒙合併成爲一個新的「全蒙國家」，但遭外蒙拒絕。該報導並說中共首次公開提及與外蒙的邊界事件，並指稱這些事一再發生，已有多時。⁷我們無從查證中共是否曾有內外蒙合併的提議，但從邊界事件卻可看出外蒙與中共的關係已大不如前。

1966年8月，中共「文化大革命」正式揭幕。這個運動一方面是另一次「大躍進」，所謂「破四舊、立四新」，一方面也是毛澤東企圖奪回權力、整肅異己而發起的瘋狂行動。⁸當文革狂潮席捲整個中國大陸，紅衛兵在毛澤東「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下開始激進而無理性的盲動時，中共的外交也進入了「革命外交」時期。外蒙和中共的關係也在文革狂潮沖激下更加惡化。

對於文革，蘇聯的態度是抨擊，認爲文革的重點是反蘇。⁹外蒙也追隨蘇聯的腳步，對文革加以攻擊。1966年10月，澤登巴爾在接見美國共黨總書記格斯霍爾（Gus Hall）時，首度公開批評文革。隨後外蒙同業公會中央委員會主席雅達姆蘇倫（D. Yadamsüren）在同業公會的大會上演說時，一再提到「中共領導們所發起的所謂文化大革命，不但絲毫不能加強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反而有助於帝國主義者」。在烏蘭巴托舉行的慶祝蘇聯十月革命四十九週年的集會上，

註7 《蒙藏敵情月報》，31期，頁1。

註8 毛澤東在1962年被解除國家主席的職務，改爲劉少奇擔任，毛澤東雖然繼續擔任中共黨主席，但權力遭到架空。

註9 Borisov and Koloskov, *Soviet-Chinese Relations, 1945-1970*, pp. 291-297.

蒙共政治局候補委員拉姆蘇倫（B. Lhamsüren）又批評中共領導們「把分裂活動提昇為正式的政策」，「以新動力從事充滿敵意的反對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活動，加強反國際共產運動的分裂活動」，這些話使得中共大使憤而離場。而在北京慶祝中共建政十七週年的集會上，外蒙代表也因為林彪攻擊蘇共而離開會場。¹⁰

1967年，外蒙與中共的關係更進入前所未有的惡劣地步，外蒙對中共的批評更加激烈。據中共新華社表示，從是年1月25日到2月19日這段期間，外蒙報刊上登載的反中共文章就超過一百二十篇。¹¹而雙方人民之間的衝突也大幅增加。

是年1月，紅衛兵首度在北京外蒙大使館前示威，塗污一輛使館座車，並且在使館周圍高舉反外蒙反蘇聯的標語。¹²是年5月，外蒙以不守法的罪名，驅逐中共設在烏蘭巴托的華文小學教師三名。當他們離開時，火車站聚集了四百名華人（中共報導為兩百多人）舉行示威，高呼敵對口號，並且和外蒙警察、民衆起了衝突，有二十多名華人遭外蒙當局逮捕。被驅逐的三名教師回到北京時，受到大批紅衛兵英雄式的歡迎，他們並且揮動「毛語錄」，高喊「打倒美帝、打倒

註 10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1966)*, p. 344.

註 11 Joe Hart, "Mongolia: 20th Year of Economic Planning," *Asian Survey*, vol. 8, no. 1 (January 1968), p. 25.

註 12 *Izvestia*, February 1, 1967 in *FBIS-DR*, February 2, 1967, p. BB2;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0, 1967, p. 3, 均轉引自 Bartow, *op. cit.*, p. 161.

蘇修、打倒蘇修的走狗蒙修」等口號。¹³

1967年8月，發生更嚴重的衝突，北京外蒙使館的一輛汽車遭紅衛兵焚毀，因為司機涉嫌踐踏毛澤東的像。大批紅衛兵包圍外蒙使館達數天之久，舉行示威，中共並且把踐踏毛像的司機驅逐出境。¹⁴

上述種種衝突事件均造成雙方提出嚴重的外交抗議，並且展開激烈的爭論叫罵。除了這些衝突事件外，意識型態問題和民族敵對問題也是外蒙與中共雙方爭論的重點。

在民族敵對問題上，外蒙領導們批評中共對外蒙領土的要求，認為中共和滿清、國民政府一般無異，都是「大漢沙文主義」。在意識型態方面，中共批評外蒙是蘇聯修正主義的共謀者，企圖使資本主義在國際上復活。中共並且利用列寧帝國主義的理論批評蘇聯如同十九世紀的歐洲殖民者一樣，企圖把外蒙變成自己的殖民地，而且大罵澤登巴爾分子是賣國賊，把外蒙往變成殖民地的路上推。中共又稱外蒙是世界上負債最多的國家，批評外蒙本是畜牧最發達的地區，但卻把牲畜出口到蘇聯，在由蘇聯進口皮鞋、毛織品、罐頭肉和奶粉等東西，而且一匹馬只抵得一雙皮靴，一隻羊只抵兩罐肉。又舉例說在1963年外蒙的牛羊就有80%出口到蘇聯。結果是外蒙牲畜數目迅速減少，而欠蘇聯的債卻如雪球般愈滾愈大。儘管中共批評蘇聯對外蒙的榨取，但外蒙卻一再強調與蘇聯的友誼、合作，並對其表示無限感謝。¹⁵雙方類

註 13 《人民日報》，1967年5月24日，八版。

註 14 《人民日報》，1966年8月11日，六版；1966年8月12日，六版；1966年8月15日，五版。

註 15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1968)*, pp. 404-406.

似的爭論不只在 1967 年發生，在以後的日子裡也不斷重複。

中共除了大肆指控蘇聯對外蒙的榨取外，並且抨擊蘇聯在外蒙駐軍，說蘇聯把數以萬計的紅軍開入外蒙，準備從事直接的軍事佔領。¹⁶而事實上，蘇軍的確大批進駐外蒙。據報導蘇軍在 1967 年進駐外蒙的兵力多達十萬人，包括一個戰車師、五個機械化步兵師，有一萬人的工兵部隊，防衛烏蘭巴托和喬巴山的地對空飛彈部隊，以及中程機動彈道飛彈部隊。此外，報導中雖未提及，但因地對空飛彈已進駐外蒙，則必然附設有防空雷達、管制中心及攔截中隊。¹⁷蘇聯除了大批軍隊駐紮外蒙外，也致力於外蒙國防現代化。1967 年 11 月，外蒙爲了慶祝蘇聯十月革命五十週年，舉行了外蒙史上最盛大的閱兵，展示的武器包括戰鬥火箭和各種最新軍事裝備，¹⁸蘇軍也參加了這次的閱兵。¹⁹東歐國家也參與了外蒙的國防。1967 年 7 月，保加利亞就曾提及它和外蒙的軍事合作日漸增強，雙方並且決定交換軍官。²⁰

約在 1963 年以前，外蒙的年度國防預算佔總預算的 5-6% 左右。後來，外蒙把國防預算併在其他行政預算中，而

註 16 《蒙藏敵情月報》，41 期，頁 2；Hart, "Mongolia: 20th Year of Economic Planning," p. 25.

註 17 《外蒙共黨之真相》，頁 547；Dupuy, *op. cit.*, p. 433.

註 18 Hart, "Mongolia: 20th Year of Economic Planning," pp. 25-26.

註 19 《蒙藏敵情月報》，46 期，頁 1；*New York Times*, January 3, 1968, p. 5; *London Times*, January 3, 1968, p. 1, 均轉引自 Bartow, *op. cit.*, p. 174.

註 20 Hart, "Mongolia: 20th Year of Economic Planning," p. 27.

不單獨列出。1967年時，外蒙把國防預算併在「維持軍隊、公共安全及維持政府行政、公共組織的支出」項目之下，這項預算約佔是年總預算的11%。²¹外蒙的這種作法是要隱藏國防費用的數目，其國防預算可能增加了。

烏蘭夫一直是中共權力結構中地位最高的蒙古人。他在本身權位穩固之時，儘可能設法保存蒙古傳統文化，反對漢人移民內蒙，原本不會蒙文的他也開始學習蒙文，並且堅持新的漢族幹部要到內蒙工作前必須先學會蒙文。他的作法溫和，也獲得了中共民族事務領導幹部的支持。²²但當文革狂潮淹沒整個中國大陸之際，內蒙自然也無法避免，鼓勵民族情感的烏蘭夫也成爲鬥爭的目標。1967年4月，烏蘭夫遭到罷黜，被撤除內蒙古軍區司令員、政委、內蒙古自治區人民委員會主席等職務，被指控爲「分離主義者、蘇聯的特務、反毛擁護者」。²³烏蘭夫遭到罷黜後，事情並未結束，批判烏蘭夫罪行的活動仍然持續不斷，內蒙一片混亂，衝突四起。內蒙情況更加深了外蒙對文革的批判。

外蒙和中共關係在1967年極度惡化。雙方在是年除了年度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外，未簽訂任何貿易、文化協定。8月18日中共廣播指責外蒙進行反中共活動，無故辭退數千華工，並令其返回中國大陸；又指出外蒙一再破壞雙方簽訂的

註 21 同前註，p. 26; Sander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Mongolia*, p. 44.

註 22 Morris Rossabi, "China and Inner Asi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and Inner Asia: from 1368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 Pica Press, 1975) p. 272.

註 23 《蒙藏敵情月報》，37期，頁3-4。

經濟技術援助協定及貿易文化等各項協定。²⁴9月5日，中共並且就外蒙破壞雙方「文化合作協定」、斷絕雙方的文化往來一事提出強烈抗議，並警告外蒙追隨「蘇修領導集團」絕沒有好下場。²⁵外蒙和中共並且是在是年8月北京外蒙使館衝突事件後撤回雙方大使，二者的外交關係也因此降低了。²⁶

1967年12月下旬，外蒙第一副總理兼政治局委員魯布桑（S. Lubsan）率領一個代表團取道中國大陸前往北越訪問。在中共境內時，中共的女性空服員激烈批評蘇共和其他共黨，紅衛兵又拿著擴音器強迫外蒙代表團聽他們批評外蒙。1968年1月，外蒙就此事向中共提出抗議，聲稱這種行為證明了中共領導們反外蒙的政策。²⁷

1968年外蒙和中共雖然彼此依舊相互大力抨擊，但比起1967年是平靜多了，因為雙方並未發生實際上的衝突。1968年5月13日，雙方簽訂了年度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²⁸7月11日，中共人員也參加了外蒙駐北京使館慶祝外蒙革命四十七週年的招待會。²⁹雙方國與國之間的接觸就藉此象徵性地維持著。

註 24 《蒙藏敵情月報》，41期，頁2；《人民日報》，1967年8月19日，六版。

註 25 《蒙藏敵情月報》，42期，頁1。

註 26 Bartow, *op. cit.*, p. 172.

註 27 *Izvestia*, January 16, 1968, p. 2 in *The Current Digest of Soviet Press*, vol. 20, no. 3, p. 16.

註 28 《人民日報》，1968年5月14日，六版。

註 29 《人民日報》，1968年7月12日，五版。

因為中蘇共關係日益惡化，蘇聯不斷加強在外蒙的軍力，不但派遣大批紅軍及裝甲部隊進駐外蒙，而且在外蒙的不毛之地建立飛彈基地。³⁰ 蘇聯並且鼓勵東歐等附庸國和外蒙簽訂軍事協定。³¹ 這一切措施均是針對中共而設。而中共也在內蒙邊界增強兵力，1969年2月23日路透社透露，中共在內蒙邊界地區派駐有三整個野戰軍、一整個坦克軍及另二個野戰軍的部份軍隊。加強兵力的目的，除了鎮壓內蒙的反毛分子外，也和蘇聯的軍事威脅有關。³²

外蒙和中共關係顯著惡化之後，中共在政治經濟上開始對外蒙施加壓力。雙方儘管每年仍照往例簽訂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但互換貨物量卻大幅減少。此外，中共對通過中國大陸運往北越、日本等地的貨物也多方阻撓。³³ 1969年2月，外蒙抗議中共於2月3、4日在邊界無故扣留烏蘭巴托到北京的火車達14小時之久。³⁴ 3月，外蒙再度提出抗議，指責中共在3月11、12日不但無故在邊界阻撓火車通行，而且非法扣留外蒙鐵路工作人員達八小時之久。外蒙指稱中共這種行為是「蔑視兩國之間的協定」，是「嚴重的挑釁」。³⁵ 這些事件使得外蒙和中共的關係又趨惡化。

註 30 《蒙藏敵情月報》，49期，頁1；52期，頁1；55期，頁1；57期，頁1。

註 31 《蒙藏敵情月報》，56期，頁1。

註 32 《蒙藏敵情月報》，59期，頁1-2。

註 33 張大軍，《外蒙古現代史》，第六冊，頁2566-2567。

註 34 Montsame, February 5, 1969 in *FBIS-DR*, February 5, 1969, p. IIF1, 轉引自 Bartow, *op. cit.*, p. 176.

註 35 TASS, March 12, 1969 in *FBIS-DR*, March 13, 1969, p. IIF1, 轉引自 Bartow, *op. cit.*, p. 176；《蒙藏敵情月報》，60期，頁2。

1969年3月是中蘇共關係的一個轉捩點，雙方的爭執、對抗到此時引發了實際的戰爭。戰爭是發生在烏蘇里江上的一個小島—珍寶島，共有兩次戰鬥，一次發生在3月2日，一次在3月15日。第一次戰事可能是中共發動的，³⁶而第二次則是蘇聯的報復行動。雙方均就此事提出了嚴厲的抗議，而且大肆抨擊對方。³⁷

緊接著珍寶島事件蘇聯大舉報復之後，中共利用華沙公約國召開高層會議的日子，於1969年3月17日在《人民日報》上譴責蘇聯「社會主義國家有限主權」的理論，指責蘇聯利用經互會和華沙公約組織作為侵略他國的工具，並藉此把外蒙變成蘇聯的殖民地。³⁸同年7月6日，中共新華社由北京發出的電訊也抨擊蘇聯，指其通過強加於外蒙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和協定，向外蒙派駐大軍和所謂的「專家」、「顧問」，直接操縱外蒙黨、政、軍大權。又說蘇聯和外蒙簽訂的「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是全面侵略的條約，使外蒙的內政、外交完全從屬於蘇聯的需要；而在經濟上假借所謂的「國際分工」和經濟「一體化」，不准外蒙建立冶煉工業和機器製造業，只許外蒙集中發展畜牧業，把外蒙變成蘇聯的牧場。蘇聯又以加強援助建設為名在外蒙增設「建築工程公

註 36 當時蘇聯正牽涉於柏林危機、中東問題及與尼克森新政府的微妙談判中，因此不太可能再加上與中共邊境的冒險。而當時中共對於越南戰事的趨向感到失望，可能期待另一國際問題的發生。（《蒙藏敵情月報》，60期，頁1。）

註 37 Nogee, *op. cit.*, pp. 230-231.

註 38 《人民日報》，1969年3月17日，二版。

司」，直接進行掠奪和壟斷。該電訊又說，在軍事上，蘇聯妄圖使外蒙成為反中共包圍圈中的一環。³⁹

中共對蘇聯的這些指控雖然是存心離間外蒙與蘇聯的感情，但也不乏真實性。可是對外蒙而言，這些都是依附蘇聯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假使蘇聯無法從外蒙處得到任何利益，那麼蘇聯又何必在外蒙投資大批人力物力呢？而外蒙的地位看似被動，實際上也存有若干主動性。儘管外蒙必須付出代價，但它可設法減少這些代價，而且外蒙選擇依附蘇聯，利用蘇聯及東歐提供的援助，使得外蒙在生活水準上超越中共控制下的內蒙，這種「兩害相權，取其輕」的作法，也顯示了外蒙的若干主動性。假如外蒙在中蘇共衝突中選擇依附中共，則外蒙可能面臨中共的大量移民，其僅存的獨立國家表象能否繼續維持很值得懷疑。

因為珍寶島事件導致中蘇共關係更加惡化，外蒙的戰略地位更形重要，蘇聯與外蒙的軍事聯繫也更為加強。1969年7月，蘇聯更換遠東軍區司令的同時，外蒙也撤換已經任職十年之久的國防部長，任命受蘇聯訓練的多爾濟（B. Dorj）為新的國防部長。多爾濟上任後，立即在8月6-12日赴蘇聯作官式訪問。⁴⁰8月18日，外蒙國防部第一副部長佐格中將也率

註 39 《人民日報》，1969年7月7日，六版。

註 40 Robert A. Smith, "Mongolia: In the Soviet Camp," *Asian Survey*, vol. 10, no. 1 (January 1970), p. 29. *New York Times*, August 7, 1969, p. 23; *JPRS*: 49,219 (November 6, 1969), p. 7; *Pravda*, August 9, 1969, p. 4; *Izvestia*, August 12, 1969, p. 2 and August 13, 1969, p. 2, 轉引自 Bartow, *op. cit.*, p. 178.

團到莫斯科訪問。⁴¹是年8月也是哈勒欣河戰役三十週年紀念，外蒙和蘇聯更是公開大事慶祝，極盡宣傳之能事。外蒙並且頒發「蘇赫巴托勳章」和「蒙古人民共和國英雄」的頭銜給哈勒欣河戰役的蘇聯指揮官朱可夫元帥（Marshal G. K. Zhukov）。⁴²

雖然發生珍寶島事件，但中蘇共雙方似乎並不願意使事態擴大，因此珍寶島事件並未造成中蘇共雙方全面性的大規模戰爭。相反地，經過珍寶島事件之後，雙方儘管在宣傳上仍互相攻擊，但也使雙方重新覺察到和解的必要，因此在某個時期蘇聯和中共政府與政府間的關係似乎有所改善。1969年4月1日，林彪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發表的政治報告中，就曾提到：「3月29日，蘇聯政府發表聲明，一方面仍然堅持其頑固的侵略者的立場，一方面表示願意恢復『協商』。」⁴³1969年9月，蘇聯總理柯錫金在赴河內參加北越領導人胡志明的葬禮之後，過境北京，在機場的會談中，他和周恩來均同意雙方必須開始就領土問題展開談判，以改善雙方的關係，並同意意識型態上的爭論不應該影響國家關係的正常化。是年10月，蘇聯與中共重新恢復邊界談判。⁴⁴

註 41 《蒙藏敵情月報》，67期，頁1。

註 42 *Pravda*, August 15, 1969, p. 4, 轉引自 Bartow, *op. cit.*, p. 178.

註 43 「林匪彪在「九大」的政治報告」，《匪俄爭執原始資料彙編》，第十三冊（民60年4月），頁26-27。

註 44 Borisov and Koloskov, *op. cit.*, p. 338; Rubinstein, *op. cit.*, p. 128; 《人民日報》，1969年9月12日，二版；1969年10月21日，三版。

綜觀 1966-1969 年期間外蒙與中共的關係，我們可以發現，雙方除了簽訂例行的年度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出席對方使館的國慶招待會外，就是不斷的衝突、抨擊。1967 年更是雙方關係最為惡劣的一年，1966 年仍有簽訂的年度文化合作協定執行書在 1967 年也不再簽訂。⁴⁵ 雙方並且在是年撤回大使，外交關係降至代辦級的程度。此外，每年相互供應貨物的數量也逐年減少，出席對方使館國慶招待會的代表職位層級也不高。雙方貿易額在 1961-1969 年期間減少了 94.5%。⁴⁶ 紐約時報在 1969 年 5 月 26 日刊出該報助理編輯薩利斯勃瑞（Harrison E. Salisbury）的報導中說：「外蒙和中共之間的貿易現已減少到幾等於零。」⁴⁷

在 1969 年 4 月召開的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中，中共認為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⁴⁸ 這個瘋狂的運動在表面上也暫告一段落。⁴⁹ 此外，中共和蘇聯的關係似乎也有了改善的跡象。在這情況下，外蒙和中共的關係將如何發展，筆者將在下一節裡繼續探討。

註 45 這可能也和蘇聯有關，1967 年也是蘇聯與中共之間首度未簽訂年度文化科學交換合作計畫。（Borisov and Koloskov, *op. cit.*, p. 343.）

註 46 「毛澤東集團反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陰謀」，《匪俄爭執原始資料彙編》，第十三冊，頁 946。

註 47 《蒙藏敵情月報》，62 期，頁 5。

註 48 「林匪彪在『九大』的政治報告」，《匪俄爭執原始資料彙編》，第十三冊，頁 18。

註 49 文革在 1966 年正式展開，直到 1976 年才算真正結束。第一階段的文革在 1969 年 4 月告一段落，第二階段的文革在中共十大（1973 年 8 月）後展開。

七〇年代的外蒙與中共關係(1969-1979)

中共和蘇聯在 1969 年 10 月重新坐上談判桌後，外蒙和中共的關係也隨著稍有改善，對彼此的譴責也有緩和減少的跡象。⁵⁰

1969 年 12 月，外蒙和中共、蘇聯、北韓、北越五個共黨政權在烏蘭巴托舉行鐵路計畫會議，簽訂一項 1970-1971 年的「五國鐵路客貨聯運協定」，決定了八條聯運路線，其中包括由莫斯科經烏蘭巴托至北京線及北京到烏蘭巴托線。⁵¹這對本已降到 10% 的烏蘭巴托-札門烏德鐵路使用率⁵²必有提升之效，對外蒙收入不無小補。

1970 年外蒙與中共實質關係並沒有很大進展，雙方只是在是年 7 月簽訂「1970 年度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⁵³10 月，澤登巴爾表示外蒙願和中共重新提升外交關係到大使層級。⁵⁴同年年底，在中斷三年之後，中共和蘇聯重新互派大使，⁵⁵而外蒙與中共互派大使則是 1971 年的事。1971 年 8 月，中共新任駐外蒙大使許文益向外蒙大呼拉爾主席團主席桑布（J. Sambuu）遞交國書。⁵⁶同年 12 月，外蒙新任大使索蘇爾巴拉

註 50 Robert B. Cassidy, Jr., "Mongolia: At Plan's End," *Asian Survey*, vol. 11, no. 1 (January 1971), p. 90.

註 51 《蒙藏敵情月報》，84 期，頁 9。

註 52 張大軍，《外蒙古現代史》，第六冊，頁 2567。

註 53 《人民日報》，1970 年 7 月 15 日，六版。

註 54 Montsame, October 13, 1970, 轉引自 Cassidy, Jr., "Mongolia: At Plan's End," p. 90.

註 55 Rubinstein, *op. cit.*, p. 128.

註 56 《人民日報》，1971 年 8 月 26 日，六版。

姆 (S. Sosorbaram) 到任。⁵⁷ 雙方自 1967 年以後中斷的大使級外交關係重新恢復。

外蒙大使在中共大使到任後三個多月才到達北京，其延遲原因可能是爲了 9 月 12-13 日軍機墜毀事件的緣故。根據外蒙報導表示，中共軍機闖入外蒙領空，繼續深入外蒙領土，後來不知何故墜毀。外蒙向中共提出抗議並要求解釋。⁵⁸ 據中共後來透露，機上坐有中共國防部長林彪，他因爲企圖謀殺毛澤東失敗，想飛往蘇聯要求庇護。⁵⁹

外蒙和中共每年都簽訂「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從 1970-1973 年簽訂議定書的時間就可以看出雙方關係有所改善：1970 年-7 月，1971 年-6 月，1972 年-5 月，1973 年-3 月。除了簽訂議定書的時間提前外，1970 年簽訂議定書的外蒙代表是外蒙使館的臨時代辦，中共代表是對外貿易部副部長，而自 1971 年以來雙方簽約代表又回復 1966 年的標準，均是雙方對外貿易部副部長，外蒙不再以使館臨時代辦充當簽約人員。⁶⁰

註 57 《人民日報》，1971 年 12 月 16 日，五版。

註 58 Montsame statement released by TASS, September 30, 1971 in *FBIS-DR*, September 30, 1971, p. IVF1, 轉引自 Bartow, *op. cit.*, p. 188.

註 59 周恩來在中共十大中的演說，見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 1973, p. 6, 轉引自 Bartow, *op. cit.*, p. 188. 但在姚明理著，莫昭平、傅依萍合譯，《林彪的陰謀與死亡》（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民 72 年 11 月，三版）一書中提到，林彪根本未在墜毀的那架飛機上，林彪在當天於北京遭毛澤東以火箭射死在其座車中。（頁 201、204-205）

註 60 《人民日報》，1971 年 6 月 7 日，六版；1972 年 5 月 13 日，六版；1973 年 3 月 3 日，五版。

進入 1970 年代之後，中共對外蒙本身的攻擊大幅減少，對外蒙又恢復爭取的態度，但外蒙對中共仍時有攻擊。從澤登巴爾在蒙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提出的「總結報告」中，我們就可看出外蒙雖然想和中共改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但在黨與黨的關係上，仍循照蘇聯的說法，對中共加以抨擊。澤登巴爾在報告中表示，在加強與各國人民友誼的原則下，今後仍將實行恢復和發展同中共友好合作與睦鄰關係的方針。但他又表示，對中共領導人的分裂行動，企圖離間社會主義國家、破壞和分裂共產主義隊伍，使工人階級和各國勞動者在帝國主義反動勢力瘋狂進攻的面前解除武裝等反馬克思主義的路線，則進行原則性的鬥爭。他又指責中共領導人以贖武的民族主義和反蘇主義武裝自己後，使中國脫離社會主義國家，對蘇聯發動武裝挑釁。蒙共十六大，蘇聯派契爾年柯（K. Chernenko）率團參加，但中共仍然沒有參加。⁶¹

雖然中蘇共並未把珍寶島事件擴大成全面戰爭，而且雙方也重新恢復領土問題的談判，但彼此仍無法互信，雙方自關係惡化後開始的擴軍活動仍一直在進行。蘇聯在遠東地區的兵力，1967 年有十五師，1969 年有二十一師，1970 年有三十師，1973 年夏天更昇至四十師左右。⁶² 倫敦「國際戰略研

註 61 《1972 匪情年報》（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民 61），頁 2：308；蒙古消息報，1971 年 6 月 12 日，二版、八版。

註 62 Rubinstein, *op. cit.*, p. 128. Neville Brown 在 "The Myth of an Asian Diversion" 一文中認為蘇聯貝加爾湖東邊的駐軍，1969 年中期有二十師，1971 年有三十師，1973 年夏天達四十師，1974 年 1 月為五十師左右，參見 *Military Review*, vol. 54, no. 1 (January 1974), p. 34.

究所」在其發表的「1971年戰略調查」中指出，從1968年以來，蘇聯駐屯在中蘇邊界地區以及外蒙的師級部隊，已達過去的三倍。⁶³在中共方面，因為武器落後蘇聯，所以採用人海戰術，以量取勝，駐軍人數就更多了。據估計，在1970年以前，中蘇共在其共同邊界上的駐軍人數就高達一百五十萬人。⁶⁴在中共、蘇聯軍事對峙下，外蒙也成了蘇聯駐軍的一個重點。據專家估計，1972年時外蒙本身的軍隊只有三萬人左右，而蘇聯在外蒙的駐軍就高達五十萬人。⁶⁵外蒙的邊界實際上成了蘇聯邊界的延長。

1971-1973年，外蒙對中共儘管仍有言辭攻擊，但語氣已較緩和。雙方除了簽訂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互賀國慶等例行性活動外，已經在1971年恢復派遣大使，並且在1972年12月開始討論華工重返外蒙問題，建議由中共派遣部份華工返回外蒙，完成1966年華工離開外蒙後所留下的未完工程。但討論結果是中共在1973年5月把尚未完成的七項建築移轉給外蒙。⁶⁶雙方也分別在1971年11月、1972年9月、1973年

註 63 《蒙藏敵情月報》，99期，頁1。

註 64 Smith, "Mongolia: In the Soviet Camp," p. 25; "The Sino-Soviet Border Dispute," *Military Review*, vol. 50, no. 1 (January 1970), p. 77.

註 65 William Heaton, "Mongolia: Troubled Satellite," *Asian Survey*, vol. 13, no. 2 (February 1973), p. 249. 周恩來在1971年10月5日與一群美國人會晤時表示，蘇聯在外蒙駐有三十萬軍隊（《蒙藏敵情月報》，90期，頁8）。日本對蘇聯在外蒙的駐軍估計為二十萬人（《蒙藏敵情月報》，95期，頁5）。這三個數字的估計可能以周恩來所言較正確，因為當時蘇聯在遠東地區的軍力大約在30-40師之間，而蘇聯一師大約有10,000-11,000人。

註 66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1973)*, p. 521; Rupen, *How Mongolia is Really Ruled*, p. 90.

11月簽訂與二者國境鐵路聯運有關的議定書。⁶⁷1972年5月，蒙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外蒙人民大呼拉爾主席團主席桑布因病去世，中共代國家主席董必武及人大常委會副主席郭沫若等人前往北京外蒙使館弔唁，⁶⁸此外，中共河北省張北縣革委會自1972年開始，在每年3月外蒙建軍節時均前往縣境內的蘇蒙聯軍烈士紀念塔獻花圈，向對日本作戰而死的外蒙軍人致敬。⁶⁹中共雖然自己前往獻花，但卻一直拒絕外蒙派人前往獻花。⁷⁰這可能因為中共獻花時只針對陣亡蒙軍，而外蒙的獻花對象必定包括陣亡蘇軍的緣故。

1971年聯合國通過接納中共入會的提案，我國宣布退出聯合國，中共接替我原有常任理事國的位子。中共進入聯合國後，許多國家紛紛與我斷交，與中共建交。同是共產政權的外蒙對中共進入聯合國一事一直採支持態度，而在這種情況下，外蒙也因此得到不少好處。當某國和我斷交，它就不再考慮我國對外蒙主權的要求，於是在它和中共建交後，往往也和外蒙建交。1971年時與外蒙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共五十五個，1972年再增加四個。⁷¹1967年4月，外蒙放棄向日本要

註 67 《蒙藏敵情月報》，94期，頁5；115期，頁23；《人民日報》，1973年11月5日，四版。

註 68 《人民日報》，1972年5月24日，三版。

註 69 《人民日報》，1972年3月19日，二版。

註 70 《蒙藏敵情月報》，120期，頁9；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1978)，p. 296.

註 71 Heaton, "Mongolia: Troubled Satellite," p. 251; William Heaton, "Mongolia: Looking Forward at Fifty," *Asian Survey*, vol. 12, no. 1 (January 1972), p. 75.

求戰爭賠償金，去除了彼此建交的一大障礙，1972年2月19日，日本與外蒙正式建交。⁷²與日本建交使得外蒙對外的貿易接觸角度增廣，1973年時外蒙與二十餘國有貿易關係。不過，外蒙的貿易仍有90%以上是和其他共產國家的貿易。⁷³

中蘇共的衝突到了1960年代末期成爲國際政治的焦點之一。從均勢的觀點來看，這種情況使得中蘇共開始試圖拉攏美國以爲己助。在這方面，中共的速度比蘇聯稍快一點。1968年10月，中共第十二次中央全會中就同意尋求改善與美國的關係。⁷⁴但是因爲美國介入越戰的關係，中共只能緩慢進行此事，直到1971年中共才加快腳步。1971年1月，雙方在華沙舉行大使級的會談。4月，美國桌球隊受邀訪問中國大陸。在這期間，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也曾兩度前往中國大陸安排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訪問事宜。1972年2月，尼克森正式訪問中國大陸。⁷⁵蘇聯原則上並不反對中共和美國關係正常化，但它很怕美國和中共聯合

註 72 Paul Hyer, "Mongolia's Measured Steps,"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21, no. 6 (November/December 1972), p. 33; 《中央日報》，民國 61 年 2 月 20 日，一版。外蒙與日本的建交比中共與日本的建交早數個月。（Heaton, "Mongolia: Troubled Satellite," p. 251.）

註 73 Heaton, "Mongolia: Troubled Satellite," pp. 247, 251.

註 74 Richard C. Thornton, "Soviet Strategy and the Vietnam War," *Asian Affairs* 4 (March/April 1974), p. 221. 轉引自 Noguee, *op. cit.*, p. 232.

註 75 Noguee, *op. cit.*, p. 232; 《人民日報》，1971年4月11日，六版；1972年2月22日，一版。

起來對抗蘇聯。⁷⁶外蒙消息報就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一事發表評論時暗指，中共和美國聯合就是反蘇、反共、反革命和反社會主義國家，認為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一事根本不值得中共敲鑼打鼓，大呼勝利。⁷⁷外蒙雖然如此評論，但實際上外蒙也一直期望能和美國建交，以便進一步參與國際事務，增強真正獨立的可能性。

1973年下半年，中共和蘇聯的關係又再度惡化。是年夏天，中共、蘇聯的邊界談判破裂，莫斯科撤回其談判人員。同年6月中旬，布里茲涅夫向中共提議簽訂「互不侵犯協定」，遭中共拒絕。如此一來，中共、蘇聯關係正常化的腳步又停下來，外蒙和中共的關係也因此受到影響。⁷⁸

1973年8月下旬，中共召開第十次代表大會。烏蘭夫在這次大會中重新入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雖然再度擠入權力核心，但烏蘭夫被迫留在北京，無法長住內蒙，遠離了他的政治勢力範圍。⁷⁹這次大會中，周恩來要求蘇聯自外蒙撤軍。很快地，外蒙嚴厲攻擊周恩來，並斥責中共想鼓吹戰爭狂熱以掩飾其內部問題。⁸⁰

註 76 Rubinstein, *op. cit.*, p. 129.

註 77 《蒙藏敵情月報》，101期，頁13-14。

註 78 《蒙藏敵情月報》，114期，頁16；Bartow, *op. cit.*, pp. 192, 200.

註 79 《人民日報》，1973年8月30日，二版；Dreyer, *op. cit.*, pp. 247-248.

註 80 Ram Rahul, "Mongolia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Asian Survey*, vol. 18, no. 7 (July 1978), p. 663, 亦見於 *Modern Central Asia* (New Delhi: Vicas Publishing House, 1979), p. 75；《蒙藏敵情月報》，115期，頁20-21。

同年 9 月初，外蒙文學與藝術報（Utga Zohiol）表示，從 1969 年到 1973 年 7 月，中共方面曾在邊界附近舉行了 151 次軍事演習，有時距邊界僅 30-50 公尺，且曾直接侵犯外蒙邊界。該報又指責說，儘管外蒙多次提出抗議，但中共士兵及軍官仍蓄意闖入外蒙領土，有時深入 15-20 公里。他們進行偵查拍照，殺死牲畜及稀有動物。又指責中共譏謗及歪曲外蒙的社會主義現況，以及外蒙和蘇聯的廣泛合作。該報又抨擊中共和「帝國主義的反動部隊」結盟，企圖以欺騙的手法贏取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友誼。該報的總結表示，中共的目的是在取得第三世界的領導權，進而取得世界的霸權。⁸¹ 中共對外蒙的指責加以否認，反責其「捏造、譏謗、別具用心」，並認為這可能是蘇聯故意慫恿造成。⁸² 由此可知，外蒙和中共的關係又再度惡化，而中共並不願指責外蒙，它把罪過都推到蘇聯身上。但據外交人士推測，外蒙這次對中共如此廣泛的抨擊，極可能真的與蘇聯密商過。⁸³

註 81 《蒙藏敵情月報》，114 期，頁 12-13；張大軍，《外蒙古現代史》，第六冊，頁 2540-2541；Alan Sanders, "Poetry of Dissen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82, no. 39 (October 1, 1973), p. 31. 日本人川中真子於 1977 年 6 月 25 日在《產經新聞》上發表文章，報導其在蘇聯、外蒙、中國大陸邊境見聞。當時有外蒙嚮導告訴他：「自 1921 年革命以來，中國人也好，蘇聯人也好，對外蒙都沒有進行過侵略，也沒有發生過邊界爭端。」（《蒙藏敵情月報》，160 期，頁 6）可見外蒙與中共的邊界問題實際上也許並不像外蒙宣傳的那麼嚴重。

註 82 《蒙藏敵情月報》，115 期，頁 22。

註 83 《蒙藏敵情月報》，114 期，頁 13。

1974-1979 年期間，除了在 1976 年 9 月毛澤東死後曾經略微停止外，外蒙對中共的指責、攻擊未曾中斷。外蒙批評中共的內容非常廣泛：

- 一、在意識型態上，指責中共為分裂主義，與帝國主義結盟，背棄馬列思想，反對蘇聯。
- 二、在民族問題上，指責中共迫害蒙藏人士，企圖同化少數民族，十足大漢沙文主義。
- 三、在對外關係上，指責中共為大國沙文主義、種族擴張主義，對其周邊各國懷有侵略野心，企圖以欺騙手段爭取第三世界領導權。
- 四、在內政上，指責中共不顧人民生活水準低落，把龐大經費用於戰備，把經濟軍事化。
- 五、在歷史解釋上，指責中共對歷史真相認識錯誤。外蒙認為中亞游牧民族本是獨立於中國之外，蒙古帝國並不是中國帝國，蒙古臣服於滿清，而非臣服於中國，並認為蒙古的自治、革命是進步的。⁸⁴

此外，外蒙多次指責中共核子試爆，並在聯合國中指控中共侵略，阻礙國際間的合作。⁸⁵ 中共極少直接指責外蒙，但卻不時指責蘇聯對外蒙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控制、壟斷。

1975 年 12 月，一名任職烏蘭巴托「華人公民委員會」的

註 84 外蒙對歷史的解釋可參看 Rupen, *How Mongolia is Really Ruled*, pp. 92-94.

註 85 《蒙藏敵情月報》，117 期，頁 5；138 期，頁 6。

中共幹部遭外蒙驅逐出境，因為他從事「反蒙活動」。⁸⁶1974年2月，中共駐外蒙大使許文益離任返回北京，新大使張偉烈同年10月才赴外蒙就任。⁸⁷1976年5月，外蒙駐中共大使索蘇爾巴拉姆離任返回外蒙，11月新任大使楚龍巴特爾（L. Chuluunbaatar）赴任。⁸⁸舊大使及新大使離任、赴任時間相隔過長，也看出雙方關係並不友善。1978年4月，中共大使張偉烈離任，同年8月新大使孟英赴任，⁸⁹中間也隔了三個多月，1976年6月中旬，蒙共舉行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中共仍然未派代表參加。⁹⁰1978年中共和日本簽訂和約，1979年中共攻打越南，同年並和美國建交等事，外蒙都加以攻擊。⁹¹

在蘇聯的心目中，多少認為毛澤東個人是阻礙中蘇共改善關係的因素之一，對毛澤東個人的批評也不計其數。1976年9月毛澤東死後，蘇聯期望中共在政策上會有所轉變，於是暫時停止對中共的攻擊，先後發出弔唁毛澤東及祝賀華國鋒當選中共新任主席的電文加以試探，但電文均遭中共退

註 86 Rupen, *How Mongolia is Really Ruled*, p. 95; 《蒙藏敵情月報》，128期，頁11。

註 87 《人民日報》，1974年3月1日，五版；1974年10月17日，四版。

註 88 《人民日報》，1976年5月29日，二版；1976年11月14日，三版。

註 89 《人民日報》，1978年4月18日，五版；1978年8月9日，五版。

註 90 Alan J. K. Sanders, "Mongolia 1976: Drawing Together Frankly with the Soviet Union," *Asian Survey*, vol. 17, no. 1 (January 1977), pp. 28-29.

註 91 William R. Heaton, Jr., "Mongolia 1978: Continuing the Transition," *Asian Survey*, vol. 19, no. 1 (January 1979), p. 62; "Mongolia 1979: Learning from 'Leading Experiences'," *Asian Survey*, vol. 20, no. 1 (January 1980), pp. 81-82.

回，理由是彼此間沒有黨與黨的關係存在。⁹² 外蒙弔唁和祝賀的電文也以同樣的理由遭中共拒收。⁹³ 後來蘇聯、外蒙發覺中共的政策並無轉變，中共領導人們執行的是「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主義」(Maoism without Mao)，在各種問題上仍堅持己見，於是對中共的批判又再度展開。的確，中共對蘇聯、外蒙的政策在毛澤東死後並未改變，華國鋒在 1978 年對第五次人大會演說中依然要求蘇聯從外蒙撤軍。外蒙很快就華國鋒此一要求在是年 4 月向中共使館及外交部提出抗議，指責中共此種要求是干預外蒙內政，威脅外蒙主權，並聲稱蘇軍駐防外蒙乃是基於外蒙當局的邀請。⁹⁴

在外蒙與中共的實質關係上，雙方每年仍然簽訂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1977 年 8 月，雙方在呼和浩特舉行的「國境鐵路聯合委員會」例會簽訂了新的協定。同年 12 月，雙方在烏蘭巴托簽訂了一項有關氣象通信的議定書。⁹⁵ 1977 年 4 月，

註 92 Rubistein, *op. cit.*, p. 130.

註 93 《蒙藏敵情月報》，150 期，頁 6；151/152 期，頁 11-12。1978 年 3 月、4 月，外蒙人民大呼拉爾主席團主席澤登巴爾和部長會議主席巴特孟和 (J. Batmonh) (兩人於 1974 年 6 月起擔任該職) 打電報給葉劍英和華國鋒，祝賀他們分別擔任人代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和國務院總理，因為這是國與國之間的賀電，所以葉劍英、華國鋒二人非但未拒絕，反而回電表示謝忱。(張大軍，《外蒙古現代史》，第七冊，頁 3193；《人民日報》，1978 年 3 月 13 日，五版。)

註 94 Heaton, Jr., "Mongolia 1978: Continuing the Transition," p. 62.

註 95 《人民日報》，1977 年 9 月 1 日，四版；1977 年 12 月 16 日，五版。

外蒙警告要將居住在外蒙的華人學童納入外蒙正規學校系統內，對華文學校造成威脅。同年 10 月，外蒙根據西方資料刊出長篇文章指責中共販毒的行徑。⁹⁶1979 年 3 月，外蒙驅逐數名華人，指責其破壞法律、盜用國家財產、投機、從事黑市買賣、賄賂、走私麻醉品等等。同年 6 月，更多華人也被控以從事非法活動而遭外蒙驅逐。6 月外蒙主辦第五屆「亞洲佛教和平會議」，邀請達賴喇嘛參加，這個會議發表一篇強烈的反中共聲明，斥責中共在東南亞的霸權主義。⁹⁷

1969-1979 年期間，外蒙和中共在國與國的關係上雖然稍有改善，雙方也重新派任大使，簽訂了一些協定，可是雙方的關係仍然不友善。外蒙對中共的指責幾乎不會中斷，而中共對蘇聯全面控制外蒙的攻擊，也一如往昔，只是中共往往是攻擊蘇聯，而不直接指責外蒙。相反地，外蒙和蘇聯關係在這時期更為密切。1974 年 11 月，布里茲涅夫二度訪問外蒙，祝賀外蒙政權成立五十週年，並提及中共要求蘇聯把軍隊撤出「爭論地區」一事是絕對無法接受的。⁹⁸蘇聯對外蒙第五個、第六個五年計畫的援助數目依舊十分龐大。1977 年 9 月，蘇聯宣布將派其財政部代表直接駐守在外蒙財政部中，此舉顯然是為了監督外蒙對蘇聯援款的使用情形。⁹⁹蘇聯和外

註 96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1978)*, pp. 295-296.

註 97 Heaton, Jr., "Mongolia 1979: Learning from 'Leading Experiences'," pp. 81-82

註 98 Alan J. K. Sanders, "Mongolia 1975: 'One Crew in Battle, One Brigade in Labour' with the USSR," *Asian Survey*, vol. 16, no. 1 (January 1976), pp. 60, 70.

註 99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1978)*, p. 295.

蒙更在黨、政府、部會、省、工廠、農場、研究機構各單位建立所謂的「直接聯繫」，雙方各同級單位間可以不經過上級單位而彼此直接聯繫。外蒙認為藉此可吸收更多蘇聯的「先進經驗」，而實際上蘇聯則利用這個方法控制了外蒙的每一個層面。¹⁰⁰ 在 1960 年代雙方便開始建立「直接聯繫」，1970 年代推動更加積極。¹⁰¹ 中蘇共關係的長期惡化使得外蒙更加倒向蘇聯，在各種問題上均支持蘇聯，雙方的關係更加密不可分。

從外蒙對蘇聯的支持和對中共的斥責來看，二種關係實有天壤之別。外蒙和中共的關係非常脆弱，二者關係的大幅改善在當時看起來似乎仍遙遙無期。

註 100 Rupen, *How Mongolia is Really Ruled*, pp. 111-112, 124.

註 101 Alan J. K. Sanders, "Mongolia: From Sambuu to Tsedenbal," *Asian Survey*, vol. 14, no. 11 (November 1974), p. 983; "Mongolia 1975: 'One Crew in Battle, One Brigade in Labour' with the USSR," pp. 67-69.

第五章 中蘇共和解談判下的外蒙與中共關係（1979-1984）

量增質低的外蒙與中共關係

經過中共三十年來的統治，中國大陸非但沒有變成「共產主義的天堂」，反而在各方面呈現一片落後的景象，尤其是文革的十年浩劫更造成無法估計的傷害。在軍事上，中共落後蘇聯一大截，甚至在攻打越南時都力不從心；在經濟上，情況更是惡劣，使得毛澤東以後的中共領導人必須藉助市場經濟的力量來加以挽救；在政治上，中共又面臨「信心危機」。種種情況迫使中共不得不檢討，不得不開始現代化的工作，以求穩固其政權。既想從事現代化，就必須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對外無後顧之憂，對內才可專心進行現代化。在1970年代後期，中共的頭號敵人早已不是美國，而是北方的蘇聯，中蘇共關係的長期惡化，使得中共必須花費大筆金錢在軍事防衛上。爲了現代化，中共有必要改善和蘇聯的關係，而蘇聯爲了減緩中共和美國的接觸，也有心與中共和解。在這種情況下，雙方於1979年9月開始第一回合改善關係的談判。¹

對於中共、蘇聯關係的改善，外蒙在心理上有其矛盾之處，一方面它希望中共、蘇聯能和解，因爲雙方若能恢復

註1 此段分析參看 Su,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Current History*, vol. 83, no. 494 (September 1984), pp. 245-246.

1950年代的親密關係，則外蒙的軍費負擔可以減輕，經濟上可有更大進展，勞工不足的問題得以解決，外蒙又可恢復昔日左右逢源的美好時光。但另一方面，外蒙又擔心中共和蘇聯改善關係的過程中，外蒙的利益會遭受損害、被當成犧牲品。外蒙的這項顧慮並非庸人自擾，而是有其可能性的。事實上，一直有人相信，爲了獲取中共更大的讓步，蘇聯有可能把外蒙歸還中共。² 儘管依照當今事實的發展，外蒙已不再是昔日的外蒙，它與蘇聯的關係由於「直接聯繫」的全面推廣而更加密切，它對國際事務的參與也更加積極，蘇聯絕對不可能放棄這個最親密的盟友，讓其變成中共的勢力範圍，但爲了改善與中共的關係而犧牲外蒙部份的利益，並非完全不可能，畢竟在蘇聯心中，與中共關係的友善要比外蒙來得重要。因此，外蒙與中共在 1979-1984 年期間的關係就在外蒙這種矛盾的心理下發展。

自從外蒙共黨成立之後，消滅宗教一直是其努力的目標。這個目標經過二十年的努力，在 1940 年時宗教已是欲振乏力，昔日既廣且深的宗教力量似乎已成過眼雲煙，不復存在。但外蒙並未將宗教完全斬草除根，它仍保留了數座寺廟及少數喇嘛，作爲吸引觀光客的項目，1974 年 3 月還設立了宗教事務部。³ 烏蘭巴托的甘丹寺（Gandan Monastery）是外蒙當時唯一仍然進行宗教儀式的寺廟，宗教對老年人仍有影

註 2 Rupen,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360.

註 3 Sanders, "Mongolia: From Sambuu to Tsedenbal," p. 980

響，但對年輕人已失去吸引力。⁴除了吸引觀光客之外，宗教也成爲外蒙政治上運用的籌碼。在中蘇共交惡之後，數年召開一次的「亞洲佛教和平會議」在蘇聯、外蒙的運用下，成爲反中共的宣傳場合，宗教成爲外蒙用以反對中共的工具之一。

1979年和1982年達賴喇嘛曾經兩度訪問外蒙。在1979年6月達賴喇嘛訪問期間，與蘇聯政府關係密切的路易斯（Victor Louis）在其書中提出一個主張，建議達賴喇嘛在烏蘭巴托定居，把烏蘭巴托建立成一個佛教中心。路易斯認爲，達賴喇嘛在外蒙的出現可能成爲外蒙歷史的轉捩點，可能導致外蒙宗教的復活，外蒙將很快變成西藏精神功能的唯一繼承者。⁵雖然有此提議，但在當時的環境下，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爲共產黨是無神論者，蒙共花費龐大的心力時間才把宗教影響力拔除，雖然仍有寺廟及喇嘛的存在，但其存在乃是爲了替政治服務，蒙共豈能容許宗教力量再度復活呢？一旦烏蘭巴托成爲佛教中心，宗教力量再度深入外蒙人民心中，則對蒙共政權必是一大威脅，蘇聯也不會容許此種情況發生。路易斯之所以有此建議，完全是基於政治上的考慮，想藉此拉攏亞洲各國間的關係，也可能有對付中共的意圖存

註 4 Thomas B. Allen, "Time Catches Up With Mongolia,"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vol. 167, no. 2 (February 1985), pp. 265, 269; David Marsh, "Cities in a Land of Nomads," *The Geographical Magazine*, July, 1984, p. 379.

註 5 Victor Louis, *The Coming Decline of the Chinese Empire* (New York: Times Books, 1979), pp. xv, 47-50.

在。達賴喇嘛第二度訪問外蒙是在 1982 年 9 月。訪問期間，達賴喇嘛強調西藏與外蒙在歷史上的親密關係，認為二者有如雙胞胎一樣，在人種、文化及宗教上均十分相似。⁶

對於流亡在印度的達賴喇嘛，中共一再拉攏誘惑，希望他能重返中國大陸，但達賴喇嘛一直不為所動。1978 年 11 月，中共釋放了三十四名在 1959-1966 年間逮捕的西藏「重要罪犯」，並且呼籲流亡在外的西藏人回去。是年 12 月，中共並給予五名流亡的西藏人簽證。⁷ 爲了吸引達賴喇嘛重返中國大陸，1979 年中共允許一個代表達賴喇嘛的代表團訪問西藏一個多月，代表團成員中包括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Gyalo Thondup），中共希望代表團的報告能夠促使達賴喇嘛重返中國大陸。⁸ 後來，達賴喇嘛先後又派了幾個代表團訪問西藏，可是他本人至今未曾返回西藏，中共對西藏的治理情況依舊無法令其滿意。在爭取達賴喇嘛方面，顯然外蒙較中共佔上風，而中共對西藏的控制手段也一直是外蒙批評中共的重點之一。

1979-1984 年期間，除了在 1981 年的上半年稍有停息外，⁹ 外蒙對中共口頭文字上的攻擊仍然繼續進行，攻擊的重點也

註 6 Robert Wesson, ed.,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1983)*, p. 202.

註 7 《人民日報》，1978 年 11 月 16 日，一、二版；《蒙藏敵情月報》，175-178 期，頁 124-128。

註 8 Richard F. Staar, ed.,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1980)*, p. 284.

註 9 Alan Sanders, "A Preventive Strik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15, no. 1 (January 1, 1982), p. 21.

不脫以往的範疇，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是中共要求蘇聯從外蒙撤軍問題，一是外蒙境內華人不法活動問題。

在中共、蘇聯改善關係的談判中，中共提出的條件（亦即關係正常化的障礙）之一就是要求蘇聯撤出在中蘇邊界及外蒙的紅軍。這個要求對外蒙刺激極深。外蒙認為蘇聯在外蒙的駐軍是外蒙得以維持獨立、對抗中共併吞野心的保證，¹⁰因此對中共此一要求嚴加駁斥。外蒙表示，蘇軍駐防外蒙是基於外蒙本身的請求，是為了保障外蒙的獨立，對中共的安全並無影響，也不是中共、蘇聯關係正常化的障礙。又說，駐軍一事是外蒙與蘇聯之間的事，不該在中共、蘇聯的談判中討論。¹¹外蒙認為，屬於外蒙的事要由外蒙自己來解決，外蒙在中共、蘇聯關係中保持中立，外蒙和中共關係的發展和中共、蘇聯關係的發展無關。又表示，假如中共希望和外蒙關係正常化，就必須放棄大漢霸權政策，尊重外蒙主權，停止干預外蒙內政。¹²外蒙對中共、蘇聯關係正常化表示支持，

註 10 Alan Sanders, "Revenge of the 'Weed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25, no. 36 (September 6, 1984), p. 17.

註 11 Alan Sanders, "Warning to Chernenko,"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23, no. 13 (March 29, 1984), p. 45; Alan J. K. Sanders, "Mongolia in 1984: From Tsedenal to Batmonh," *Asian Survey*, vol. 25, no. 1 (January 1985), p. 129.

註 12 William R. Heaton, "Mongolia in 1983: Mixed Signals," *Asian Survey*, vol. 24, no. 1 (January 1984), p. 128. 對於中共要求自外蒙撤出蘇軍，蘇聯曾經要中共直接和外蒙會談，但中共認為外蒙充其量只是蘇聯的傀儡，不夠資格作為談判的對手。參見 Nayan Chanda, "A Thaw in Siberi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20, no. 17 (April 28, 1983), p. 26.

但認為不應該損害第三者的利益。此外，外蒙也表示願在和平共存和睦鄰的原則下，與中共改善關係。¹³

外蒙不但駁斥中共要求蘇軍撤出外蒙的舉動，而且要求蘇聯強化蒙軍，更新外蒙軍隊的裝備。1980年9月底，澤登巴爾聲稱，莫斯科已經接受外蒙的要求，替外蒙軍隊配置最新型的武器及設備，使得蒙軍的火力、機動性大幅提高。¹⁴1981年5-6月蒙共召開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中共依然未派代表參加，而蘇共代表團由政委兼書記戈巴契夫（M. Gorbachev，後來曾擔任蘇共總書記）率領參加。戈巴契夫在其演說中向外蒙保證，確保盟邦的安全是蘇聯神聖的責任。¹⁵同年6月，蘇聯國防部長烏斯蒂諾夫（D. Ustinov）並且率領五名高級將領前往外蒙訪問五天，巡視駐防外蒙的蘇軍，並接受外蒙所頒與的最高勳章—蘇赫巴托勳章—及「蒙古人民共

註 13 Alan Sanders, "Cool Celebration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22, no. 45 (November 10, 1983), p. 46; Sanders, "Warming to Chernenko," p. 45.

註 14 Alan Sanders, "More Help from the Kremli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10, no. 45 (October 31, 1980), p. 47. 但由於1982年11月外蒙國防部長阿伯希亞（J. Abhia）下台，可能強化軍力的工作進行並不順利。參見 William R. Heaton, "Mongolia in 1982: Looking Forward But Also Back," *Asian Survey*, vol. 23, no. 1 (January 1983), p. 48.

註 15 Alan Sanders, "New Faces at the Top,"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12, no. 26 (June 19, 1981), p. 11.

和國英雄」的頭銜。¹⁶1982年3月布里茲涅夫在塔什干（Tashkent）的演說中也依舊堅持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談判，將不會對第三國造成傷害。¹⁷從這些事實就可以看出蘇聯的態度。

華人的不法活動也是這段期間外蒙抨擊的重點之一，外蒙甚至於展開大規模驅華行動，影響了外蒙與中共的關係。事實上，自從1960年代前期外蒙大舉驅除華工之後，外蒙就曾斷斷續續批評華工怠工、罷工、工程品質不佳，對外蒙經濟造成傷害。¹⁸1967、1975年時外蒙也曾經有驅逐華人的行動，批評其不守法、反蒙。自1979年以後，華人問題再度成爲焦點之一，筆者在前一章中曾經提及是年3月、6月外蒙二度驅華之事。1980年3月，七名華人也以破壞外蒙法律、盜取公家財產、從事黑市買賣等罪名被驅逐出境。同年6月，中共一外交人員被外蒙以從事間諜活動的罪名加以驅逐。這是文革以後中共外交人員首度遭外蒙驅逐，也是首次以間諜罪名遭外蒙驅逐的華人。¹⁹同年9月，又有六名華人以破壞公

註 16 Alan Sanders, "The Sabre-Rattling Bear,"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13, no. 30 (July 17, 1981), p. 16;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1982)*, p. 214.

註 17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FBIS*, March 25, 1982, p. R7, 轉引自廖淑馨，「外蒙驅華事件與匪蒙關係」，頁 26。

註 18 Alan Sanders, "Poetry of Dissen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82, no. 39 (October 1, 1973), p. 31.

註 19 Alan Sanders, "A Diplomatic Lesson for Chin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09, no. 29 (July 11, 1980), p. 34.

共秩序的罪名被逐。²⁰1981年7月30日，外蒙真理報透露，過去三年間共有三十七名華人因為從事間諜、偷竊、破壞公家財產、販毒、走私、賭博等不法行爲，而遭驅逐出境。²¹蒙古通訊社（Montsame）後來也在其俄文刊物《蒙古新聞》（Novest' Mongolii）中報導，從中國大陸寄給華人的包裹中，發現有避孕藥及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品。外蒙由於人口稀少，一向鼓勵生育，避孕藥的輸入自然引起外蒙當局的不悅，蒙古通訊社指稱這種行爲是企圖「腐蝕（外蒙）人口成長的基礎」。²²1982年6月下旬，外蒙也驅逐若干華人，指稱他們犯法、走私、投機、沒有固定收入。²³

1983年，外蒙的驅華行動達到高潮。是年3月9日至6月1日，外蒙當局先後通知居住在烏蘭巴托的294戶、1764名華人，在接到通知二星期內，遷往其他省份的農場，並且自3月30日起，成批將它們驅逐出境或限期離境。5月底，自莫斯科搭火車經外蒙抵北京的旅客證實，該列車停靠烏蘭巴托時，有一百多名華人上車。中共也報導，二連浩特車站歸僑接待站，自4月2日至5月31日，已接待了六百多名自

註 20 FBIS/AR, September 3, 1980, 轉引自 Mary Frances Weidlich, "Mongolia in 1980: A Year of Adjustment and Resolves," *Asian Survey*, vol. 21, no. 1 (January 1981), p. 64.

註 21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sia Yearbook (1982)*, p. 205.

註 22 Sanders, "A Preventive Strike?" pp. 21-22

註 23 "Mongolia Expels 'Criminal' Ethnic,"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ne 24, 1982, p. 8, 轉引自廖淑馨，「外蒙驅華事件與匪蒙關係」，頁25。

外蒙返回中國大陸的華僑。²⁴

是年4月15日，外蒙向中共使館遞送備忘錄，指責其庇護犯法的華人。據外蒙表示，在兩千五百名有能力工作的華人中，只有少數人擁有固定的工作，從事有益社會的勞動，而絕大多數華人逃避勞動，有系統地破壞外蒙法律，外蒙提供機會讓他們到偏遠地區的國營農場做事，若他們拒絕，則外蒙允許他們返回中國大陸。但中共的說法和外蒙出入頗大。中共在是年6月3日向外蒙提出正式抗議，指責外蒙令華人移往偏遠地區，拒絕接受此命令的華人就遭到驅逐，並且受到敵視的待遇，遭外蒙當局搜查，沒收財產。中共聲稱已和外蒙就此事進行了十四次的交涉，可是外蒙置之不理，任由情況繼續惡化，認為這是外蒙長期歧視華人的政策。中共警告外蒙，若不停止這種行動，一切後果將由外蒙自行負責。²⁵ 外蒙拒絕接受中共的抗議，指責抗議本身就是中共干預內政的證明，也阻礙了外蒙與中共關係的改善。²⁶

註 24 《人民日報》，1983年6月4日，二版；Michael Rank, "Move on or Get out, Says Mongoli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21, 1983, p. 12; 《大公報》，1983年6月7日，二版；均轉引自廖淑馨，「外蒙驅華事件與匪蒙關係」，頁25。

註 25 《人民日報》，1983年6月4日，二版；William R. Heaton, "Mongolia in 1983: Mixed Signals," p. 128; David Bonavia, "Old Game, New Move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20, no. 23 (June 9, 1983), p. 14

註 26 Heaton. "Mongolia in 1983: Mixed Signals," p. 129.

1960年代後期以來，外蒙驅逐的華人數目極其有限，為什麼會在1983年然展開大規模驅華行動呢？這極可能和中共、蘇聯改善關係談判的進展有關。1979年9-11月，中共與蘇聯在莫斯科舉行了十多年來雙方首次的關係正常化談判，但未獲致結果。原本雙方同意在次年年底於北京重開會談，但由於在1979年12月蘇聯出兵阿富汗，中共藉此中止談判。²⁷1979年蘇聯也未曾向中共提議談判，但在1981年3月至1982年2月短短十一個月中，蘇聯卻向中共提出了五次建議。1982-1983年間，蘇聯並且派遣若干官員前往北京公開提出談判的要求。²⁸

中共在1982年9月召開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後，與蘇聯改善關係的腳步加快。是年10月，雙方在北京恢復副外長級的「磋商會談」，11月中共外長黃華赴莫斯科參加布里茲涅夫的喪禮，1983年3月雙方再於莫斯科舉行另一回合的談判。雙方貿易額迅速增大，科技、文化、體育的交流也增加。²⁹由於中共、蘇聯改善關係的速度加快，加上蘇聯的態度顯然比中共來得積極，因此引起了外蒙內心的恐懼，深怕蘇聯為了爭取中共更大的讓步，會犧牲外蒙的利益，於是外蒙大舉驅逐華人，趁機製造事端，希望減緩中共、蘇關係正常化的速度。外蒙雖然對這種說法加以否認，³⁰但事實上這是極有可能

註 27 廖淑馨，「外蒙驅華事件與匪蒙關係」，頁 25-26。

註 28 Su,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p. 245.

註 29 《人民日報》，1982年11月15日，一版；國防部情報局，《匪情年報 1983-1984》，頁 2：266-268。

註 30 Heaton, "Mongolia in 1983: Mixed Signals," p. 129.

的。長期觀察外蒙情況的桑德士（Alan Sanders）也認為這項行動是外蒙給蘇聯的一個暗示，提醒蘇聯不要屈服於中共的要求。³¹當然，這更是外蒙對中共的一項嚴重抗議。假若這個推斷正確，則外蒙此次驅華行動可能事先並未與蘇聯磋商。但是也有一些人認為，外蒙這項行動是蘇聯一手策畫，或至少經過蘇聯同意，想藉此向中共表示，蘇聯無法干預第三國的行動，以抗議中共所提及第三國（外蒙、阿富汗、越南）的關係正常化條件。³²

當大批華僑在 1978 年因為不願參加公社而逃出越南或遭驅逐時，中共反應激烈，也因此加強其在 1979 年初對越南發動懲罰性戰爭的決心。可是中共對外蒙此次的驅華行動，反應卻相當溫和，默默接待遭驅逐而返回中國大陸的華人，³³直到 6 月 3 日才打破沈默，向外蒙提出正式抗議。除了抗議之外，中共對外蒙一直保持和緩的語氣。是年 8 月，中共向外界透露，由於蘇聯的壓力，³⁴外蒙驅華的行動已經減緩；9 月，新華社在報導中國大陸舉行的蒙古史座談會時，強調雙方在歷史上對彼此的貢獻；10 月，香港親中共的文匯報表

註 31 Sanders, "Cool Celebrations," p. 47.

註 32 David Bonavia, "On a Firmer Footing,"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20, no. 24 (June 16, 1983), p. 15.

註 33 Bonavia, "Old Game, New Moves," p. 14

註 34 可能是中共對蘇聯施加壓力，甚至以中止談判相威脅，要蘇聯命令外蒙停止驅華的行動。參見 William E. Griffith,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the Asian Quadrangle, 1984," *Issues and Studies*, vol. 21 no. 1 (January 1985), pp. 119-120.

示，中共和外蒙的關係已有改善。³⁵ 中共這種低姿勢，一方面是怕處理不當會影響和蘇聯談判的進展，³⁶ 一方面也符合中共一貫爭取外蒙的心態。

雖然在這段期間外蒙依然對中共多方批評，甚至大規模驅逐居住在外蒙的華人，但由於中共蓄意淡化的結果，雙方關係在量的方面仍然有進展，簽訂了一些協定，彼此的貿易額也增加了。³⁷ 1979年，中共重新恢復1969年時被大幅縮小的內蒙古自治區範圍；³⁸ 1981年11月，中共恢復蒙古語言和文學課程；³⁹ 1982年6月，外蒙新任大使沙格達蘇倫（P. Shagdarsuren）前往北京就任。⁴⁰ 1982年2月18日至4月3日，外蒙和中共舉行「邊界聯合檢查委員會」第一回合會議。這個委員會是在1964年雙方簽訂「邊界議定書」後設立的，但因為文革時期雙方關係惡化，這個委員會從未開過會，形同虛設。⁴¹ 雙方經過四回合會議之後，於1984年7月

註 35 Heaton, "Mongolia in 1983: Mixed Signals," p. 130.

註 36 廖淑馨，「外蒙驅華事件與匪蒙關係」，頁 29；喬雄飛，「蘇聯勢力下的偽蒙：發展與動向」，《共黨問題研究》，10 卷 5 期（民 73 年 5 月），頁 64。

註 37 Heaton, "Mongolia in 1982: Looking Forward But Also Back," p. 48; Heaton, "Mongolia in 1983: Mixed Signals," p. 127.

註 38 《人民日報》，1979 年 7 月 21 日，四版。當初因為中共北方邊界受到蘇聯與外蒙的嚴重威脅，所以中共削減內蒙古自治區的範圍，以方便對俄備戰及對內控制。

註 39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1982)*, p. 215.

註 40 《人民日報》，1982 年 6 月 29 日，四版。

註 41 Heaton, "Mongolia in 1982: Looking Forward But Also Back," p. 48; 《人民日報》，1982 年 4 月 6 日，六版。

由中共副外長韓敘和外蒙第一副外長雲登（D. Yondon）代表雙方在北京簽訂了「邊界聯合檢查議定書及附圖」。簽字前，中共外長吳學謙和雲登交談。吳學謙聲稱，中共願意和外蒙發展經濟、貿易、技術和文化各方面的關係。雲登也表示，外蒙願意和中共發展關係，開展邊境貿易和文化交流。⁴²出席1984年中共使館國慶招待會的外蒙代表職位比1983年高，包括大呼拉爾主席團秘書長和外貿部長。⁴³在同年秋天的聯合國大會期間，雙方外長也舉行了會談。⁴⁴

外蒙與中共在1979-1984年期間，國與國的關係雖然稍有進展，但黨與黨的關係卻仍然毫無改善。雙方的關係和中共、蘇聯的關係一樣，都是在量的方面增進，質的方面並未加強。⁴⁵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外蒙與中共都希望增加彼此的接觸，改善彼此關係，因為雙方關係友善對彼此都有利。可是，由於外蒙長期受蘇聯控制，假使中共、蘇聯關係無法改善，則外蒙與中共關係的改善也必充滿障礙。

澤登巴爾下台事件與外蒙、中共關係

1984年8月23日，蒙共中央委員會召開了一次特別全會，在會議中宣布澤登巴爾被解除了黨中央總書記和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務，並當場宣布由巴特孟和（Jambyn Batmonh）

註 42 《蒙藏地區敵情週報》（台北：蒙藏委員會），10期，頁1-2；Sanders, "Mongolia in 1984: From Tsendenbal to Batmonh," p. 129.

註 43 《人民日報》，1984年10月4日，六版。

註 44 Sanders, "Mongolia in 1984: From Tsendenbal to Batmonh," p. 130.

註 45 Su,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p. 245.

接任總書記。根據蒙古通訊社的報導，這個決定是「政治局全體一致的提議」，又說，澤登巴爾被解除職務是「考慮他的健康狀況，並且徵得他本人的同意」。當天下午召開的大呼拉爾第五次會議中，也解除了澤登巴爾大呼拉爾主席團主席的職務。⁴⁶四個月後，巴特孟和在12月12日的大呼拉爾會議中當選為新的大呼拉爾主席團主席。⁴⁷由於蘇聯對外蒙一向控制嚴密，因此澤登巴爾下台一事必定經由蘇聯策畫或事先經過蘇聯同意而進行的。又因為報導中使用「徵得他本人同意」一語，所以這絕非澤登巴爾主動辭職，而是被迫放棄一切權力。再者，蒙共中央委員會召開的是「特別全會」，因此這並非正常的人事安排，而是臨時發生的問題。⁴⁸

澤登巴爾於1940年當選蒙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⁴⁹當時這個職位僅次於喬巴山中央委員會主席的職務。1952年喬巴山去世之後，澤登巴爾接任喬巴山部長會議主席一職，並且繼續擔任總書記，此時已不再有中委會主席一職，因此澤登巴爾等於掌握了黨政大權。1954-1958年期間，澤登巴爾一度被迫辭去第一書記（即總書記）之職，專任部長會議主席，但他在蘇聯支持之下，將其政敵一一整肅，奪回蒙共領導大權，並自1974年起當選大呼拉爾主席團主席。在長達三十年

註 46 *Unen*, August 24, 1984, 轉引自 Sanders, "Mongolia in 1984: From Tsedenbal to Batmonh," pp. 122-124.

註 47 同前註, p. 125.

註 48 郝致誠，「偽蒙頭子走馬換將事件剖析」，《蒙古現況研究》，第一輯（台北：蒙藏委員會，民74年11月），頁2。

註 49 *History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p. 364.

的掌權期間，澤登巴爾對蘇聯唯命是從，不但積極加強與蘇聯的關係，在內政上配合蘇聯的要求，而且在國際事務上完全附和蘇聯的語調，隨著搖旗吶喊，對於與蘇聯交惡的中共更是大加撻伐，唯恐後人。既是對蘇聯如此忠心耿耿，澤登巴爾為何又會觸怒蘇聯，招致被迫下台的命運呢？

澤登巴爾下台一事，外蒙對外宣稱是基於對其健康上的考慮，但根據一些觀察家表示，澤登巴爾在這方面並沒有特別苦惱。⁵⁰ 在特別全會之前，他的活動一如往常，7月24日，澤登巴爾主持了大呼拉爾主席團的會議，會中批准與匈牙利簽訂的「友好合作條約」，當天並接見了若干曾經參加過哈勒欣河戰役的老兵。7月25日澤登巴爾頒獎給若干藝術家，也可能參加了政治局的會議，會中證實他曾和來訪的越南國家主席長征（*Truong Chinh*）舉行多次會談。⁵¹ 假如澤登巴爾身體狀況不佳的話，他不可能如此活動的。從7月25日到8月23日，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澤登巴爾竟然因病下台，實在令人懷疑。此外，蘇聯塔斯社電訊表示，7月26日澤登巴爾接受蘇共中委會邀請，前往蘇聯渡假。自此之後，外蒙與蘇聯的報上再沒有關於澤登巴爾活動或身在何處的報導出現。⁵² 假使澤登巴爾真的病情嚴重到必須解除黨政重職的地步，則應有治療進展的後續報導才是。再者，倫敦泰晤士報（*London Times*）1984年10月9日刊出該報駐莫斯科記者歐文（*Richard Owen*）的報導，提到有人曾經看見澤登巴爾在列

註 50 Sanders, "Revenge of the 'Weeds'," p. 16.

註 51 Sanders, "Mongolia in 1984: From Tsedenbal to Batmonh," p. 125

註 52 同前註。

寧山（Lenin Hills）散步。⁵³ 由此可知，澤登巴爾絕非是健康上出了問題，極可能是遭蘇聯軟禁了。而且共黨國家的首領，除非是真正死亡，否則不可能主動讓出大權，所以澤登巴爾的下台顯然是被迫的，和他的健康情況根本無關。

假使澤登巴爾並非因為健康不佳而遭罷黜，那他下台的真正原因為何？筆者認為有下列數個可能原因：

- 一、日趨專制的領導作風：1974年6月，澤登巴爾辭去部長會議主席之職，就任大呼拉爾主席團主席。他的就任距前主席桑布之死已隔兩年，這種延遲頗不尋常。可能是蒙共內部有人反對他身兼總書記及大呼拉爾主席團主席二職，他們可能比較喜歡蘇聯式的三人執政，但兩年之後，澤登巴爾依舊在布里茲涅夫支持下當上了大呼拉爾主席團主席。澤登巴爾希望擔任大呼拉爾主席團主席，其目的可能是爲了自己國際聲望的緣故。⁵⁴ 1980年4月，澤登巴爾結束在莫斯科的訪問，返回外蒙之後，就試圖減緩對其本身的個人崇拜，他表示他的政治角色被誇大了，而且自認並非馬克斯主義的理論專家。⁵⁵ 可能在外蒙已形成澤登巴爾的個人崇拜，引起他人的不滿，向蘇聯檢舉，在蘇聯的警告下，他只得展開壓制個

註 53 同前註，p. 125, note. 10. 澤登巴爾散步地點靠近當地高級別墅區。

註 54 Sanders, "Mongolia: From Sambuu to Tsedenbal," p. 973.

註 55 Alan Sanders, "Undermining the Myth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08, no. 20 (May 9, 1980), p. 35.

人崇拜的活動，以免觸怒蘇聯。此外，澤登巴爾自1981年發起的「根除莠草」運動，使得許多優秀份子遭到整肅。⁵⁶而根據親中共的《大公報》的報導，澤登巴爾的俄國妻子在外蒙橫行霸道，替澤登巴爾樹敵不少。⁵⁷

- 二、過分親蘇的態度：蒙共內部一直存有兩大派系，一是明顯的親蘇派，向以蘇聯馬首是瞻；一是民族主義派，希望在蘇聯及中共之間保持中立，尋求真正的民族獨立。澤登巴爾畢業於蘇聯的財經學院，妻子是俄國人，他每年均數度前往蘇聯，受蘇聯影響極大。他是蘇聯一手培植起來的，而從他的作法看來，他是明顯的親蘇派，當然無法得到外蒙民族主義分子的真正擁護，1954-1958年期間澤登巴爾總書記之位遭丹巴取代，其最大原因便在於此。他積極加強與蘇聯的關係，在各級單位設立與蘇聯的「直接聯繫」，並再三整肅對蘇聯忠心不足的幹部。1982年1月遭到整肅的外蒙科學院院長錫林迪布（B. Shirendev），罪名之一便是由於他未能接受蘇聯學者對外蒙科學研究「再三提供的寶貴意見」和「重要提議」，並且曾「粗野地攻擊兄弟國的專家」，「破壞了黨的外交政策路線」。⁵⁸錫林迪布

註 56 Sanders, "Revenge of the 'Weeds'," p. 17.

註 57 《蒙藏地區敵情週報》，28期，頁1。

註 58 Alan Sanders,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15, no. 8 (February 19, 1982), p. 28.

被認為有與毛澤東思想妥協的跡象。⁵⁹而1983年7月遭整肅的蒙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兼大呼拉爾主席團副主席札蘭阿札布（S. Jalan-aajav），罪名是「反黨份子」，因為他被發現參與1964年的「反黨集團」，當時三名親中共的幹部因為企圖顛覆澤登巴爾政權而遭整肅。⁶⁰此外，澤登巴爾在經濟、外交各方面均配合蘇聯的需要而進行，在實質上幾乎把外蒙完全附屬於蘇聯之下。

- 三、人事組織管理上的失敗：自1981年以來，外蒙的人事一直不穩，許多人遭到整肅，也有許多人因此獲得升遷。遭到整肅的官員中，除了札蘭阿札布是由於涉及十九年前的政變陰謀外，其他大多數人的罪名是浪費公帑、工作不力、績效不佳、官僚作風、缺乏進取心、沒有原則、不負責任。蒙共中央監察委員會（Party Control Committee）主席戴集德（Bugyn Dejid）要求加強勞工訓練，他表示，單單在1982年中，浪費的工作時間所造成的工業生產損失就高達五千兩百萬圖格里克。⁶¹此外，與錫林迪布有關的人員，反蘇的思想也是他們被整肅的原因

註 59 Alan Sanders, "And Now a Chinese Angl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15, no. 9 (February 26, 1982), p. 32.

註 60 Alan Sanders, "A Purge Postscript," p. 40.

註 61 Alan Sanders, "Shuffling the Deck,"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23, no. 1 (January 5, 1984), p. 23.

之一。⁶² 這些人事上的問題，澤登巴爾難辭其咎。

四、近年來民族意識的增長：由於東歐共黨國家有追求獨立自主的傾向，而且也獲得某種程度的效果，外蒙自然也會受到影響，希望有更多的自主權。1982年7月加拿大《多倫多星報》刊載一篇報導文章表示，是年2月外蒙大學生曾舉行反蘇聯殖民統治的示威遊行，並在中共駐外蒙使館前放置鮮花，對中共反蘇立場表示同情。報導中說，那次遊行曾獲得外蒙科學院和作家聯盟的支持。澤登巴爾對外蒙這種傾向即使未曾加以鼓勵，在蘇聯心中，他也難脫姑息之嫌，因此引起蘇聯不悅，將他加以撤換，並藉此對東歐各國收殺雞儆猴之效。⁶³

五、對中共政策觀點上與蘇聯的差異：關於此點，外蒙在1983年大舉驅華一事就是最好的例子。當時蘇聯正積極與中共進行關係正常化，而外蒙偏在此時突

註 62 自1981年以來的整肅行動，參見 Alan Sanders 在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中的數篇報導："Big Brother is Watching," "And Now a Chinese Angle," "Rooting out the Weeds," vol. 116, no. 14 (April 2, 1982), p. 35; "Follow the Leader," vol. 116, no. 22 (May 28, 1982), pp. 36-37; "Shuffling the Deck," "No One is Indispensable," vol. 123, no. 9 (March 1, 1984), pp. 32-33; "A Purge Postscript."

註 63 郝致誠，「偽蒙頭子走馬換將事件剖析」，頁3-4；加拿大《多倫多星報》，1982年7月13日，一版，轉引自郝致誠，《外蒙古與蘇俄、中共的關係及發展》，蒙藏學術演講叢書（台北：蒙藏委員會，民75年4月），頁6-7。

然大規模驅逐華人，意圖減緩中共、蘇聯關係正常化的速度，此舉當然會觸怒蘇聯。

根據以上五個可能原因，可歸納成兩點：一是基於蒙共內部對澤登巴爾本人的不滿，迫使蘇聯必須加以撤換，以便平息衆怒，繼續有效地控制外蒙；一是基於澤登巴爾本身態度的轉變，不再完全聽命於蘇聯，影響了蘇聯的利益，因此澤登巴爾只有被迫下台。這兩個可能性，或許只有一者存在，或許兩者兼具。⁶⁴

接替澤登巴爾出任蒙共總書記和外蒙大呼拉爾主席團主席的巴特孟和也是由蘇聯一手培植的。他畢業於外蒙國立大學及蘇聯社會科學院，是一位經濟專家。他 1974 年 5 月當選部長會議副主席，一個多月之後就躍升為主席，接替了澤登巴爾之職，並且進入政治局，1984 年 8 月更成為外蒙的頭號人物。⁶⁵ 同年 10 月，巴特孟和就前往蘇聯，進行工作上的正

註 64 澤登巴爾下台後四年，巴特孟和和外蒙的官方媒體才開始點名批判他，說他的掌權使得外蒙的政治、經濟陷入停滯的階段。外蒙民主改革後，外蒙政府曾計畫引渡他回國接受審判，但因其健康情況惡劣，該計畫遭放棄。澤登巴爾在 1991 年 4 月 21 日去世後，遺體歸葬於烏蘭巴托，其子也試圖爭取支持，對其父親重新評價。參見 Sanders,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Mongolia*, p. 199. 1997 年 11 月初，外蒙總統巴嘎班第(N. Bagabandi)簽下命令，恢復澤登巴爾在 1990 年 4 月 18 日被取消的元帥、蒙古英雄、勞動英雄的頭銜，並將沒收的勳章歸還其家人。參見 Email Daily News, nos. 209 (296), 211 (298), 211 (299), October 30, November 3, November 4, 1997.

註 65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1985)*, pp. 218-219.

式訪問。在訪問期間，他大力頌揚蘇聯，聲稱若無蘇聯的幫助，則外蒙無法維持本身的獨立及主權，人民生活也無法提高。而外蒙與蘇聯簽訂的聯合公報中再度表示，願在平等、睦鄰而不損及第三國利益的原則下，和中共改善關係。⁶⁶ 這次訪問中，巴特孟和並且頒贈外蒙最高勳章給蘇聯領導人物契爾年柯（K. Chernenko）、葛里辛（V. Grishin）及葛羅米柯（A. Gromyko）。⁶⁷

巴特孟和上台，但他在政策上與澤登巴爾並無差異，仍是親蘇的傳統作法。戈巴契夫 1980 年代後期開始在蘇聯進行改革時，巴特孟和也在外蒙推動經濟改革、政府重造的工作，可是他卻十分不恰當地把政治開放 (political openness) 的工作交由一群不公不法的黨務官僚執行。當柏林圍牆倒塌、外蒙民主化的幼苗開始茁壯，1990 年外蒙的人民公開站出來批判國家的「停滯不前」、反抗長期執政的「蒙古人民革命黨」，由於未能獲得克里姆林宮的支持，巴特孟和所領導的政治局在是年 3 月倒台，他本人也被迫辭去蒙共總書記和大

註 66 Alan Sanders, "Let's Make Friend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27, no. 1 (January 10, 1985), p. 32.

註 67 Sanders, "Mongolia in 1984: From Tsendenbal to Batmonh," p. 129;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1985)*, p. 218.

呼拉爾主席團主席的職務，從此淡出政壇。⁶⁸ 稍後，外蒙政府宣布放棄共產主義及一黨專政，踏上了民主改革的新紀元，而外蒙與中共的關係也有了一個新的開始。

註 68 *Sanders,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Mongolia*, p. 20. 外蒙權貴秀異分子的兒女們在 1989 年發起非暴力運動，進而導致外蒙專制制度的解體。這些改革者多來自知識分子與專業階層，沒有軍力，而他們的領導人也拒絕使用暴力。因此，這個原由社會上層階級發起的改革運動逐漸轉化成群眾運動，吸引了社會底層的民衆。蒙古當局並未採取壓制行動，一方面因為這些抗議者是秀異份子，一方面也因為當時的蘇聯未批准使用暴力。在 1980 年代，溫和派逐漸填滿政府的職位，這些人反對強硬派提出的激烈做法，雙方僵持不下。蒙古當局也害怕，一旦政府和示威者間爆發衝突可能導致中共介入，因此對改革者加以容忍，進而奠定了改革者獲得勝利的基礎。Morris Rossabi, "Mongolia: A Peaceful Transition," 中國邊政協會編，《蒙古民族與周邊民族關係學術會議論文集》（台北：蒙藏委員會，民 89），頁 81-153。

第六章 結 論

十三世紀是蒙古民族在世界歷史上大放異彩的世紀。雄才大略的成吉思汗統一了蒙古各部族，進而領導他們征戰四方，開疆拓土，建立橫跨歐亞的大帝國。蒙古鐵騎所到之處，盡皆望風披靡，氣勢之盛，史所罕見。歲月悠悠，七百餘年之後，雖然蒙古民族內心深處仍存有昔日的尊榮與驕傲，但時不我與，曾經威赫四方、不可一世的蒙古帝國早已在歷史的巨輪中灰飛煙滅，消逝的無影無蹤。二十世紀的「蒙古人民共和國」表面上雖為獨立，但受地理位置的限制，前狼後虎，被迫在中共、蘇聯夾縫中尋求生機，未能享有真正的獨立自主。

早在 1911 年，外蒙因為不滿清廷在蒙古地區的激進政策，又受中國革命的影響，乘著清廷自顧不暇的機會，逕行宣告獨立。1915 年接受中國的宗主權，改為自治，1919 年在徐樹錚的強硬手段下撤銷自治。1921 年受俄國共產政府的誘惑，再度宣告獨立。1921-1924 年外蒙採行君主政體，以哲布尊丹巴為「蒙古人民國」大汗。1924 年哲布尊丹巴去世，外蒙禁其再度轉世，改採共和政體，國號改為「蒙古人民共和國」，「蒙古人民黨」也更名為「蒙古人民革命黨」。1921-1928 年，溫和派當權，王公喇嘛仍有極大影響力。1928 年蒙共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激進派在蘇聯支持之下，把溫和派逐出人民革命黨，控制了黨政大權，並且積極展開剷除封建勢力的工作。1940 年蒙共召開第十次代表大會，王公喇嘛至今已欲振乏力，影響力不復存在，喬巴山成為外蒙頭

號人物，在蘇聯指示下，開始長達十二年的獨裁統治。

1928年溫和派遭到整肅之後，左傾的激進派起而代之。他們將蘇聯的發展模式奉為圭臬，蘇聯也以導師的身分，逐漸加深對外蒙的影響力，進而控制外蒙。1937年，由於日本的威脅日增，蘇聯更派軍進駐外蒙，把外蒙納入其防衛體系。

1945年2月，英美兩國爲了要求蘇聯參戰，與其簽訂「雅爾達協定」，出賣我國利益。事後，美國並且促使我國與蘇聯訂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同意讓外蒙舉行公民投票。公民投票在蘇聯導演之下，全票贊成獨立，我國迫於國際情勢，爲了國家更大的利益，只得承認外蒙獨立。

雖然我國承認外蒙獨立一事原是出於無奈，但一旦承認之後，我國也希望外蒙能夠真正獨立自主，1946年外蒙申請加入聯合國，我國投票表示支持。然而外蒙雖名爲獨立，實際上卻無法脫離蘇聯的控制，成爲蒙古研究名家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所稱的「衛星國」(satellite country)，處境與殖民地相差無幾。由於蘇聯一再違反「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精神，威脅我國政治獨立及領土完整，因此我國在1953年2月正式明令廢止該條約，也連帶撤銷了對外蒙獨立的承認。

在抗戰中力謀坐大的中共，披著「農村改造者」的外衣，在蘇聯扶植下，於1949年據有大陸，建立政權。中共建政之後，與外蒙迅速建立外交關係，並在喬巴山死後，於1952年10月與其簽訂爲期十年的「經濟及文化合作協定」，開始極力發展彼此的關係。

1952-1960年期間，外蒙與中共的關係進展迅速，在質與量方面都有具體的成果，中共也打破了蘇聯獨佔的局面，在

外蒙擁有一席之地。在這段期間，有兩件事情對外蒙與中共關係的發展有很大助益，一是烏蘭巴托至集寧段鐵路的興建完成，一是中共提供外蒙的大批金錢、人力援助。鐵路的完成使得雙方的聯繫更為方便，中共的貨物、勞工得以經此源源不斷湧入外蒙，而外蒙也因此獲得更多與外界接觸的機會，中共、蘇聯、外蒙三者的關係也因為這條鐵路的開通而更加密切。至於中共提供外蒙金錢、勞工，對外蒙經濟的發展貢獻不小，也贏得外蒙的好感，中共不顧本身經濟的破敗，依然大力援助外蒙，其目的即在此。

隨著雙方關係的進展，中共對外蒙的影響力日增，不但在物質上有其作用，在精神上也開始影響外蒙。許多人對中共不同於蘇聯的革命方式感到好奇，蒙共內部也有親中共的派系存在，他們希望加強與中共的關係，以減輕對蘇聯的依賴，進而使外蒙趨於真正的獨立自主。1954-1958年丹巴得以接掌蒙共第一書記之職，便是這種心態下產生的結果。

眼見中共在外蒙的勢力日增，大有取蘇聯而代之的企圖，蘇聯自然心生警惕，開始加強對外蒙的投資、援助，以免苦心積慮卵翼的傀儡政權逐漸落入中共的支配。而自中蘇共交惡之後，蘇聯在外蒙的活動更加積極，深怕外蒙落入中共之手，成為中共運用以威脅蘇聯的籌碼。

1960-1966年期間，中蘇共關係日益惡化，外蒙與中共關係受此影響，難免產生動搖。外蒙本想儘量保持中立，但在蘇聯壓力之下，不得不作一決定，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原則下，只得表明立場，靠攏蘇聯，外蒙與中共的關係也因此由動搖而趨於惡化。

在此期間，雖然中共力謀補救與外蒙惡化中的關係，甚

至犧牲部份土地，與外蒙簽訂「邊界條約」及「邊界議定書」，並且迎合外蒙民族情感，盛大慶祝成吉思汗八百週年誕辰，但均於事無補，頹勢已無法挽回。外蒙也開始要求中共撤回華工，一批批的華工搭乘火車，返回中國大陸，1966年華工幾乎已完全撤回，外蒙、中共關係發展的有利條件之一已不復存在。

由於中共與蘇聯、外蒙的關係惡化，中共大幅降低經由烏蘭巴托鐵路的貨運，並且爲了邊境安全理由，把原本與蘇聯、外蒙一致的寬軌改成標準軌。鐵路使用率降低，使得外蒙貨運收入連帶減少，對需錢孔急的外蒙不無傷害，而助益於外蒙、中共關係發展的此一條件亦告消失。

蘇聯爲了穩固外蒙對它的向心力，挾帶外蒙進入聯合國，並且讓其參加經互會，使外蒙能夠增加參與國際事務的機會，獲取蘇聯集團更多的援助。這兩個組織雖然是外蒙樂意參加的，但在聯合國中外蒙只能追隨蘇聯的意見，而在經互會國家經濟「一體化」的口號下，外蒙只能發展畜牧業及輕工業，重工業根本無從建立，外蒙實際上成了蘇聯的畜牧場。毛澤東1964年透露曾在十年前要求蘇聯討論外蒙問題，但遭拒絕。中共希望外蒙了解蘇聯將其淪爲附庸的事實，可是外蒙卻嚴厲抨擊中共對它本身的領土野心。由於中蘇共關係的惡化，蘇聯並且把原已撤出的紅軍重新進駐外蒙。

1966-1979年期間，中共、蘇聯成爲彼此最大的敵人，雙方關係緊張，百萬重兵在邊界處嚴陣以待，1969年雙方甚至爆發了珍寶島的戰事。外蒙和中共在此一時期的關係也較前一時期惡化，彼此的貿易關係就靠每年一度的「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維繫著，但貿易額極低，其他方面的關係也幾乎

不存在。文革時期，雙方人民之間的衝突時有所聞，1967年雙方甚至撤回大使，直到1971年才重新派任。外蒙、中共在此一時期言語文字上的相互批評增多，外蒙更在意識型態、民族問題、對外關係、內政、歷史解釋各方面抨擊中共，中共也對外蒙甘於附庸地位、歧視華人等問題加以斥責，但在1970年代中共又恢復只攻擊蘇聯而不直接指責外蒙的作法。

這個時期外蒙積極加強和蘇聯的「直接聯繫」，雙方關係日益密切，而外蒙與中共的關係似乎就是一再重複的叫罵，真正有利於雙方關係改善的接觸極其有限。中共在此時期不再參加蒙共召開的代表大會，聲稱雙方黨與黨的關係已不再存在，而事實上雙方國與國的關係也只靠若干不重要的協定象徵性地維持著。

1970年代由於中共積極拉攏美國，而美國也企圖利用中共牽制蘇聯，因此二者關係頗有進展。蘇聯深怕美國、中共聯合起來對抗它，有心與中共和解，以減緩中共、美國關係的進展，而中共爲了進行現代化，也必須改善與蘇聯的關係，於是雙方在1979年開始關係正常化談判，後因蘇聯出兵阿富汗，雙方未再進行下一回合的談判。1981年之後，蘇聯的態度又轉趨積極，1982年10月，雙方重開談判。

蘇軍駐防外蒙以後，對中共威脅極大，1973年周恩來就要求蘇聯把軍隊撤出外蒙，與蘇聯開始改善關係的談判後，中共更把此一要求列爲雙方關係正常化的條件之一。可是蘇聯對此條件並不接受，外蒙也對中共嚴加斥責，指其干預外蒙內政，並在中共、蘇聯積極進行談判之際，大舉驅逐華人，以爲抗議。

1979-1984年期間，由於中共、蘇聯的關係略有改善，外

蒙與中共的關係因而也有進展，但不論是中共與蘇聯關係，或是外蒙與中共關係，均只有量的增加，而無質的改善；經濟、文化、科技、體育的交流增多，而在政治關係上並無具體的進展。

1984年8月，掌權近三十年之久的澤登巴爾，在蘇聯的指示下，被解除了政黨重職，巴特孟和繼任為外蒙頭號人物。外蒙首領的交替，使得蘇聯與外蒙的關係更為密切，新首領的上任對外蒙、中共關係的發展並沒正面意義，一切仍要視中共、蘇聯關係的發展而定。

縱觀外蒙、中共關係在1949-1984年期間的發展，似乎受中共、蘇聯關係的影響頗大，中共、蘇聯關係友善之時，外蒙、中共的關係也頗有進展，而自中蘇共交惡之後，外蒙與中共的關係也由搖擺不定而終致決裂。雖然這是事實，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影響並不是絕對而且唯一的，事實上，外蒙本身與中共關係的處理，並非全然被動，外蒙也有其主動性。

外蒙的主動性在於它能認清事實，並根據事實的狀況，作出對其本身發展最有利的決定。當中共政權建立之初，與蘇聯正處於蜜月時期，外蒙利用這個機會，配合中共有心增強彼此關係的心態，讓中共的勢力進入外蒙，藉用中共的金錢、勞力建設外蒙，並且促使蘇聯加強對外蒙的援助。當中蘇共交惡之後，外蒙並不立即表明支持蘇聯的態度，它想利用這最後的機會，從中共手中再獲取部份利益，中共1960年提供的貸款及1962年簽訂的「邊界條約」便屬於這分利益。外蒙直到迫不得已之時，才決定表明態度，支持蘇聯，而它選擇蘇聯作為支持的對象，這當然也是深思熟慮後的結果。

在外蒙的想法中，蘇聯對外蒙的幫助要比中共來得大，因為當時蘇聯在國際上的聲勢比中共強，再加上中國大陸的龐大人口素來令外蒙畏懼。當 1979 年中共、蘇聯雙方有了改善關係的跡象之後，外蒙當然立即跟進，宣布願和中共改善關係，雙方的關係也有了進展。上述這些作法都是外蒙自認最合乎本身利益的作法，也是其在與中共關係上主動性的表現。

雖然外蒙在中共、蘇聯交惡時選擇支持蘇聯，並且和它建立相當密切的關係，但這並不表示外蒙內心真正喜愛蘇聯。事實上，從外蒙的發展情況看來，外蒙內部一直存在有相當大的反蘇力量，在適當時機就會表現出來。外蒙支持蘇聯的作法只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是迫於現實的無奈選擇，儘管外蒙為此付出相當的代價，但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外蒙民族意識強烈，它最關心的是如何成爲一個真正獨立自主的國家，並且把外蒙帶上現代化的道路，因此外蒙一直在設法增加參與國際事務的機會，並且盡量利用自己地處中蘇之間的重要策略位置，以達成本身的願望。在澤登巴爾下臺之前，外蒙這個願望已有部份的實現，國際接觸的增多使得外蒙已經不太可能像唐努圖哇一般遭蘇聯併吞，而外蒙的現代化，雖然離理想的目標仍遠，但它也不再是昔日那個幾乎沒有工業存在的外蒙。

1984 年後外蒙與中共關係的發展，依然和中共、蘇聯關係的發展密切相關，外蒙仍在可能的範圍內，發揮本身的主動性，繼續在中共、蘇聯二者之間，尋求一條對自己發展最爲有利的道路。由於中共對外蒙的人口壓力依然存在，外蒙仍與蘇聯較爲親近，但外蒙內部的反蘇力量也並未消失，這

從外蒙民主改革後許多當地人對蘇聯的批判即可看出。中共仍對外蒙保持一貫的爭取態度，期望本身勢力再度進入外蒙，並擴大其影響力。

蘇聯在戈巴契夫領導下，開始政經改革開放政策，外蒙也獲得喘息機會，民主化的呼聲隨之而起，終於在 1990 年宣布放棄共產主義與一黨專政，步入民主改革的新紀元。1991 年蘇聯解體後，由於本身政治、經濟上困難重重，無暇花費太多心力在外蒙身上，加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經濟上蓬勃發展，外蒙與中共的關係得以獲取更大發展空間。

外蒙民主改革後，儘管俄羅斯與中共仍是外蒙最重要的夥伴，但外蒙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也隨著外蒙的民主化與開放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外蒙的選擇增加，不再是一個只能在前狼後虎夾縫中求生存的可憐蟲。在民主改革中前進的外蒙，雖然面臨諸多問題，但其應知今日擁有的獨立自主得來不易，相信它會發揮更大的主動性，珍惜這份成果，並積極追求其國家各方面的發展。

附表 1：外蒙駐北京歷任大使

使 者 姓 名	任 職 時 間
賈爾卡賽汗 (B. Jargalsaikhan)	1950 年 7 月-1953 年
奧其爾巴特 (G. Ochirbat)	1953 年 7 月-1957 年
魯布桑 (S. Luvsan)	1957 年 5 月-1959 年 6 月
沙拉夫 (D. Sharav)	1959 年 7 月-1962 年
策伯格米德 (D.Tsevegmid)	1962 年 6 月-1967 年
索蘇爾巴拉姆 (S. Sosorbaram)	1971 年 12 月-1976 年 5 月
楚龍巴特爾 (L. Chuluunbaatar)	1976 年 11 月-1982 年
沙格達蘇倫 (P. Shagdarsüren)	1982 年 6 月-

附表 2：中共駐烏蘭巴托歷任大使

使者姓名	任職時間
吉雅泰	1950年7月-1954年9月
何英	1954年9月-1958年8月
謝甫生	1958年9月-1963年8月
張燦明	1963年9月-1967年
許文益	1971年8月-1974年2月
張偉烈	1974年10月-1978年4月
孟英	1978年8月-
李舉卿	1984年-

**附表 3：外蒙與中共 1952-1984 年期間簽訂
的條約、協定一覽表**

時 間	條 約 或 協 定
1952.10.04	經濟及文化合作協定
1953.01.16	郵政協定
01.16	電信協定
02.24	非貿易貸款協定
02.24	非貿易貸款協定結算技術手續議定書
08.20	1953 年貨物週轉及付款協定
08.20	1951 及 1952 年貿易結算議定書
1954.04.07	1954 年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
04.07	交貨共同條件議定書
12.16	1955 年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
1955.03.14	1955 年文化合作計畫
10.17	關於國境鐵路的協定
12.21	廣播合作協定
1956.02.07	1956 年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
02.07	交貨共同條件議定書
02.25	互換郵政包裹協定
08.29	關於中共給予外蒙經濟和技術援助的協定
12.22	1957 年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
1957.10.03	關於鐵路服務的議定書
1958.01.17	航空交通協定
01.24	航空運輸和互相服務議定書
01.28	1958 年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
02.21	文化合作協定
12.29	關於中共給予外蒙經濟技術援助的協定

12.29	關於中共給予外蒙經濟技術援助協定的議定書
1959.01.05	文化合作協定
01.30	1959年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
12.22	非貿易支付的貨幣比價和清算協定
1960.02.23	文化合作協定 1960年執行計畫
02.23	1960年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
02.23	關於修改和補充 1956年交貨共同條件的換文
05.06	廣播合作協定
05.23	關於中共給予外蒙經濟和技術援助協定最後結算議定書
05.31	友好互助條約
05.31	中共給予外蒙經濟技術援助協定
05.31	科學技術合作協定
05.31	聯合聲明
09.20	關於中共派遣工人幫助外蒙生產建設的協定
11.10	1960-61年貿易協定
1961.04.07	文化合作協定 1961年執行計畫
04.26	雙方貿易代表團會談公報
04.26	通商條約
04.26	1961年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
08.31	聯合鐵路議定書
1962.01.31	文化合作協定 1962年執行計畫
02.25	1962年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
05.31	科學技術合作協定執行計畫
06.04	關於執行「科學技術合作協定」的共同辦法
06.04	1962年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
12.26	邊界條約
1963.03.18	1963年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
03.30	文化合作協定 1963年執行計畫

05.06、05.25	關於中共變更科技合作執行機構的換文
1964.01.17	第二次科學技術合作會議議定書
01.20	1964年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
06.14	聯合勘界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紀要
06.17	文化合作協定 1964年執行計畫
06.30	邊界議定書
11.20、12.19	關於科技合作協定中共變更執行機構的換文
12.08	第三次科學技術合作會議議定書
1965.03.24	1965年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
06.09	文化合作協定 1965年執行計畫
1966.03.28	1966年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
03.28	交貨共同條件議定書
05.30	第四次科學技術合作會議議定書
09.29	文化合作協定 1966年執行計畫
1967.07.26	1967年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
1968.05.13	1968年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
1969.07.24	1969年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
1970.07.14	1970年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
1971.06.05	1971年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
11.30	國境鐵路聯合委員會例會議定書
1972.05.12	1972年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
08.16	關於延長 1952年「經濟及文化合作協定」有效期的換文
09.07	關於中蒙邊界 548-I 號界樁重建的協議書
09.23	國境鐵路聯運會議議定書
1973.03.01	1973年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
03.23	中共向外蒙提供經濟援助協定會議紀要
11.04	國境鐵路聯運議定書
1974.04.26	1974年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

1975.04.19	1975 年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
10.14	國境鐵路聯合委員會議定書
1976.11.11	1976 年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
1977.06.17	1977 年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
08.30	國境鐵路聯合委員會例會議定書
12.10	氣象通信專家組會議議定書
1978.03.01	1978 年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
11.18	國境鐵路聯合委員會例會議定書
11.25	改變非貿易支付辦法的會議紀要
1979.08.10	1979 年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
10.20	國境鐵路聯合委員會例會議定書
1980.04.17	1980 年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
09.08	國境鐵路聯合委員會例會議定書
1981.10.03	國境鐵路聯合委員會例會議定書
1982.02.26	1982 年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
04.13	邊界聯合檢查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會議紀要
1983.02.04	換貨和付款議定書
1984.03.01	1984 年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
07.19	邊界第一次聯合檢查議定書

參考書目

壹、中文出版品

一、專書

- 中俄交涉公署編，《中俄會議參考文件》，第肆類，中俄協商草案。台北：文海出版社，未載印行日期。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友好條約匯編》。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
-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文件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4。
- 札奇斯欽，《蒙古之今昔》。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44。
- 李毓澍，《外蒙古撤治問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65，再版。
- 茲拉特金著，陳大維譯，《蒙古人民共和國發展史》。北京：時代出版社，1953，三刷。
- 姚明理著，莫昭平、傅依萍合譯，《林彪的陰謀與死亡》。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民72，三版。
- 美國國務院根據檔案編輯，中華民國外交部譯印，《美國與中國之關係—特別著重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九年之一時期》，未載印行日期。
- 《匪俄爭執原始資料彙編》。台北：國際關係研究所，共十四冊，民53-56。
- 唐在禮、唐在章，《蒙古風雲錄》，南昌，民1。

- 郝致誠，《外蒙古與蘇俄、中共的關係及發展》，蒙藏學術演講叢書。台北：蒙藏委員會，民 75 年 4 月。
- 孫福坤，《外蒙簡史新編》。台北：文海出版社，民 67。
- 畢桂芳，《外蒙交涉始末記》。台北：文海出版社，民 57。
- 張大軍，《外蒙古現代史》。台北：蘭溪出版社，民 72。
- 張遐民，《俄帝侵略下的外蒙古》。台北：蒙藏委員會，民 53。
- 陳崇祖，《外蒙古近世史》。民 11；台北：文海出版社，民 54。
- 葉伯棠，《中共與蘇俄衝突之研究（赫魯雪夫時期：1956-1964）》。台北：正中書局，民 69。
- 《雅爾達會議記錄全文》。台北：聯合報社，民 44。
- 楊汝舟，《外蒙共黨之今昔》。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 63。
- 蒙藏委員會編印，《邊疆涉外關係》，民 51。
- 劉彥撰，李方晨增補，《中國外交史》。台北：三民書局，民 51。
- 鄭學稼，《黑毛之爭》。台北：帕米爾書局，民 52。
- 藍美華，《布里雅特人在外蒙古的活動，1921-1928》。台北：蒙藏委員會，民 88。
- 蘇聯科學院、蒙古人民共和國科學委員會合編，巴根、余錦繡等合譯，《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
- 鐵瑞夫·杜畢著，扁舟、若如譯，《外蒙共黨之真相》。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 64。
- Gerard M. Friters 著，李約譯，《外蒙古》。台北：國立編譯

館，民 41。

Harrison E. Salisbury 著，《外蒙簡介》。台北：國防研究院，民 48 年 11 月。

Robert A. Rupen 著，中央社譯，《外蒙古（1957-1960）》，民 49。

S. G. 樸希加廖夫著，呂律譯，《俄羅斯史》。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 66，三版。

二、期刊、年鑑、報紙

《人民手冊》。香港：大公報社。

《人民日報》

《大公報》

《中央日報》

《匪情年報》。台北：中共研究出版社，國防部情報局。

《蒙古消息報》

《蒙藏地區敵情週報》。台北：蒙藏委員會。

《蒙藏敵情月報》。台北：蒙藏委員會。

三、論文

王啓中譯，「今日偽蒙」，《今日大陸》，238 期，民 54 年 8 月 16 日，頁 23-25。本文譯自 1965 年 5 月 28 日西德《播種》週刊。

「我國控蘇案全文」，《我們的敵國》。台北：中央日報社，民 41，下集，頁 276-309。

吳熙憲，「毛、蒙分界後，失地之多少？」，《問題與研究》，16 卷 2 期，民 65 年 11 月，頁 193-196。

郝致誠，「偽蒙頭子走馬換將事件剖析」，《蒙古現況研究》，第一輯。台北：蒙藏委員會，民 74 年 11 月，頁

1-8。

喬雄飛，「蘇聯勢力下的偽蒙：發展與動向」，《共黨問題研究》，10卷5期，民73年5月，頁62-69。

廖淑馨，「外蒙驅華事件與匪蒙關係」，《匪情月報》，26卷2期，民72年8月，頁25-31。

_____，「民主改革後外蒙對成吉思汗的評價」，《成吉思汗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蒙藏委員會，民87，頁179-190。

蔣廷黻，「三年控蘇的奮鬥」，《我們的敵國》。台北：中央日報社，民41，下集，頁262-275。

貳、外文出版品

I. BOOKS, YEARBOOKS, AND NEWS

Akademiia Nauk SSSR. *Ocherki istorii kul'tury MNR*. Ulan-Ude: Buriatskoe Knizhnoe Izdatel'stvo, 1971.

Baabar (Bat-Erdene Batbayar). *Twentieth Century Mongolia*. Trans. D. Sühjargalmaa, et al. Ed. C. Kaplonski. Cambridge: The White Horse Press, 1999.

Bawden, Charles R. *The Modern History of Mongolia*.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8.

Borisov, O. B. and B. T. Koloskov. *Soviet-Chinese Relations, 1945-1970*.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5.

Coox, Alvin D. *Nomonhan: Japan Against Russia, 193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Crankshaw, Edward. *The New Cold War: Moscow V. Peking*.

- Balti more, Maryland: Penguin Books, 1963.
- Djilas, Milovan. *Conversation with Stali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62.
- Dindub (Dendev), L. *Mongghol-un tobchi teuke*. Ulaanbaatar: 1934. Reprinted with a titled as *A Brief History of Mongolia in the Autonomous Period*. The Mongolia Society Special Papers, Issue 6. Bloomington, 1977.
- Dreyer, June Teufel. *China's Forty Mill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Dupuy, Trevor N. and others. *Area Handbook for Mongolia*.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0.
- Email Daily News*. Ulaanbaatar.
-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sia Yearbook*. Hong Kong: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Limited.
- Floyd, David. *Mao Against Khrushchev*.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3.
- Friters, Gerard M. *Outer Mongolia and Its International Position*.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4, Reprinted.
- History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Translated by William A. Brown and Urgunge On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Institut Dal'nego Vostoka, Akademiia Nauk SSSR. *Vneshniaia politika KNR*. Moscow: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ia, 1971.
- Institut Narodov Azii, Akademiia Nauk SSSR. *Sovetsko-mongol'skie otnosheniia 1921-1966, sbornik dokumentov*. Moscow: Nauka, 1966.

- Kazakevich, I. S. (Redaktor sovetskogo vypuska). *Sovetsko-mongol'skie otnosheniia 1921-1974, dokumenty i materialy*. Moscow: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ia, 1979.
- Kapitsa, M. S. *KNR: Tri desiatiletia - tri politiki*. Moscow: Politizdat, 1979.
- Louis, Victor. *The Coming Decline of the Chinese Empire*. New York: Times Books, 1979.
- Mongolyn ard түмний 1911 оны үндэсний эрх чөлөө, тусгаар тогтнолын тэвдэг төмөр, баримт бичгийн эмхэтгэл (1900-1914)*. Ulaanbaatar: Ulsyn Khevelelin Gazar, 1982.
- Murphy, George G. S. *Soviet Mongolia*. Berkeley & L. 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 Navaannamzhil, G. *Övgөн бичеэчиин үгүүлэл*. Ulaabaatar: Ulsyn Khevelelin Gazar, 1956.
- Nogee, Joseph L. *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Two*.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Inc., 1984. 2nd Edition.
- Onon, Urgunge and Derrick Pritchatt. *Asia's First Modern Revolution; Mongolia Proclaims its Independence in 1911*. New York: E. J. Brill, 1989.
- Rahul, Ram. *Modern Central Asia*. New Delhi: Vicas Publishing House, 1979.
- Rossabi, Morris. *China and Inner Asia: From 1368 to the Present Day*. New York: Pica Press, 1975.
- Rebinstein, Alvin Z. *Soviet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Two*.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Winthrop Publisher, Inc., 1981.
- Rupen, Robert A. *Mongo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 2.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1964.

_____, *How Mongolia is Really Ruled*. Stanford,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9.

Salisbury, Harrison E. *War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69.

Sanders, Alan J. K.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Mongolia*. Lanham, MD. & London: The Scarecrow Press, 1996.

Sanders, A. J. K.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Mongol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Schwartz, Harry. *Tsars, Mandarins, and Commissars*. Philadelphia & New York: J. B. Lippincott Company, 1964.

Snow, Edgar.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8.

Tsapkin, N. V. *Mongol'skaia narodnaia respublika*. Moscow: Ogiz 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Politicheskoi Literatury, 1948.

Ulam, Adam B. *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8.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Stanford,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Zagoria, Donald S.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956-1961*.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木村肥佐生訳，宮地亮一編，《モソゴル人民共和のすべて》。東京：ビブリオ，1977。

II. ARTICLES

Allen, Thomas B. "Time Catches up with Mongolia."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vol. 167, no. 2 (February 1985):

242-269.

- Bartow, Barry George. "The Policy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Toward China, 1952-1973." Ph. D. Dissertation,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1974.
- Boldbaatar, J. "The Eight-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Chinggis Khan: The Revival and Suppression of Mongolia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Stephen Kotkin and Bruce A. Elleman, eds. *Mongoli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andlocked Cosmopolitan*.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9.
- Bonavia, David. "Old Game, New Move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20, no. 23 (June 9, 1983): 14-15.
- _____. "On a Firmer Footing."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20, no. 24 (June 16, 1983): 14-15.
- Bouteiller, George de. "La Mongolie Dans le Conflit Sino-Sovietique." *De'fense Nationale* (Juin 1980): 71-86.
- Brown, Neville. "The Myth of an Asian Diversion." *Military Review*, vol. 54, no. 1 (January 1974): 34-38.
- Cassidy, Robert B., Jr. "Mongolia: At Plan's End." *Asian Survey*, vol. 11, no. 1 (January 1971): 86-91.
- Chanda, Nayan. "A Thaw in Siberi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20, no. 17 (April 28, 1983): 26-27.
- "China is Waging 'Expansionist' 'Cold War'." *The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vol. 16, no. 34, pp. 3-7.
- Ginsburgs, George. "Mongolia's 'Socialist' Constitution." *Pacific Affairs*, vol. 34, no. 2 (Summer 1961): 141-156.
- Griffith, William E.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the Asian

- Quadrangle, 1984." *Issues and Studies*, vol. 21, no. 1 (January 1985): 113-125.
- Haggard, M. T. "Mongolia: The First Communist State in Asia." in Robert A. Scalapion, e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Asia: Tactics, Goals, and Achievement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69.
- _____, "Mongolia: New Soviet Moves to Bolster Ruling Group." *Asian Survey*, vol. 6, no. 1 (January 1966): 13-17
- _____, "Mongolia: The Unesay Buffer." *Asian Survey*, vol. 5, no. 1 (January 1965): 18-24.
- Hart, Joe. "Mongolia: 20th Year of Economic Planning." *Asian Survey*, vol. 8, no. 1 (January 1968): 21-28
- Heaton, William R., Jr. "Mongolia: Looking Forward at Fifty." *Asian Survey*, vol. 12, no. 1 (January 1972): 69-77
- _____, "Mongolia: Troubled Satellite." *Asian Survey*, vol. 13, no. 2 (February 1973): 246-251.
- _____, "Mongolia 1978: Continuing the Transition." *Asian Survey*, vol. 19, no. 1 (January 1979): 58-64
- _____, "Mongolia 1979: Learning from 'Leading Experiences'." *Asian Survey*, vol. 20, no. 1 (January 1980): 77-83.
- _____, "Mongolia in 1982: Looking Forward But Also Back." *Asian Survey*, vol. 23, no. 1 (January 1983): 47-52.
- _____, "Mongolia in 1983: Mixed Signals." *Asian Survey*, vol. 24, no. 1 (January 1984): 127-133.
- Hyer, Paul. "Mongolia's Measured Steps."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21, no. 6 (November/December 1972): 28-37.

- , "The Re-evaluation of Chinggis Khan: Its Role in the Sino-Soviet Dispute." *Asian Survey*, vol. 6, no. 12 (December 1966): 696-705.
- Izvestia*, January 16, 1968. p.2. In *The Current Digest of Soviet Press*, vol. 20, no. 3, p. 16.
- "Joint Soviet-Mongolian Statement." *The Current Digest of Soviet Press*, vol. 9, no. 20 (June 26, 1957): 19-20.
- Jones, P. H. M. "Jenghiz over Mongoli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37, no. 4 (July 26, 1962): 165-168.
- , "Mongolia Between Two Fire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33, no. 7 (August 17, 1961): 305-307.
- , "Mongolia in Transitio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33, no. 5 (August 3, 1961): 211-215.
- Langer, Paul F. "Outer Mongolia, North Korea, North Viet-Nam." in Adam Bromke, ed. *The Communist States at the Crossroads*.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5.
- Lisann, Maury. "Moscow and the Chinese Power Struggle."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18, no. 6 (November/December 1969): 32-41.
- Marsh, David. "Cities in a Land of Nomads." *The Geographical Magazine*, July 1984, pp. 374-380.
- Moses, Larry W. "Inner Asi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ole of Mongolia in Russo-Chinese Relations." *The Mongolia Society Bulletin*, vol. 11, no.2, pp. 55-75.
- Purevdorzh, I. "Sotrudnichestvo SSSR i MNR v gody vtoroi mirovoi voyny." *Problemy dal'nego vostoka* (Mart 1985): 36-46.

- Rahul, Ram. "Mongolia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Asian Survey*, vol. 18, no. 7 (July 1978): 659-665.
- Romance Francis J. "Sino-Soviet Policies Towards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1945-1965: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Involved." Ph. D. Dissertati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1967.
- Rosenberg, Daniel. "Leaders and Leadership Roles in a Mongolian Collective: Two Cases." *Mongolian Studies* 7 (1981-2): 17-51.
- Rossabi, Morris. "Mongolia: A Peaceful Transition." 中國邊政協會編，《蒙古民族與周邊民族關係學術會議論文集》。台北：蒙藏委員會，民 89。
- Rupen, Robert A. "The MPR and Sino-Soviet Competition." In Doak Barnett, ed. *Communist Strategies in Asia*.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3.
- _____, "The MPR: The Slow Evolution." *Asian Survey*, vol. 7, no. 1 (January 1967): 16-20.
- _____, "Russian-Mongolian-Chinese Conferenc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17, no. 3 (May 1958): 537-541.
- Sanders, Alan J. K. "A Diplomatic Lesson for Chin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09, no. 29 (July 11, 1980): 34-35.
- _____, "A Preventive Strik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15, no. 1 (January 1, 1982): 21-22.
- _____, "A Purge Postscrip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24, no. 14 (April 5, 1984): 40-41.
- _____, "And Now a Chinese Angl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15, no. 9 (February 26, 1982): 32.

- _____,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15, no. 8 (February 19, 1982): 28.
- _____, "Cool Celebratio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22, No. 45 (November 10, 1983): 46-47.
- _____, "Follow the Leader."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16, no. 22 (May 28, 1982): 36-37.
- _____, "Let's Make Friend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27, no. 1 (January 10, 1985): 32-33..
- _____, "Mongolia: From Sambuu to Tsedenbal." *Asian Survey*, vol. 14, no. 11 (November 1974): 971-984.
- _____, "Mongolia 1975: 'One Crew in Battle, One Brigade in Labour' with the USSR." *Asian Survey*, vol. 16, no. 1 (January 1976): 66-71.
- _____, "Mongolia 1976: Drawing Together Frankly with the Soviet Union." *Asian Survey*, vol. 17, no. 1 (January 1977): 27-33.
- _____, "Mongolia in 1984: From Tsedenbal to Batmonh." *Asian Survey*, vol. 25, no. 1 (January 1985): 122-130.
- _____, "More Help from the Kremli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10, no. 45 (October 31, 1980): 47.
- _____, "New Faces at the Top."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12, no. 26 (June 19, 1981): 10-11.
- _____, "No One is Indispensabl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23, no. 9 (March 1, 1984): 32-33.
- _____, "Poetry of Dissen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82, no. 39 (October 1, 1973): 31-32.
- _____, "Revenge of the 'Weed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 vol. 125, no. 36 (September 6, 1984): 16-17.
- , "Rooting out the Weed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16, no. 14 (April 2, 1982): 35.
- , "Shuffling the Deck."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23, no. 1 (January 5, 1984): 23.
- , "The Sabre-Rattling Bear."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13, no. 30 (July 17, 1981): 16-17.
- , "Undermining the Myth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08, no. 20 (May 9, 1980): 35-36.
- , "Warming to Chernenko."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23, no. 13 (March 29, 1984): 45.
- Smith, Robert A. "Mongolia: In the Soviet Camp." *Asian Survey*, vol. 10, no. 1 (January 1970): 25-29.
- Strong, John W. "Sino-Soviet Relation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Adam Bromke, ed. *The Communist States at the Crossroads*.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5.
- Su, Chi.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Current History*, vol. 83, no. 494 (September 1984): 245-247, 281.
- "The Sino-Soviet Border Dispute." *Military Review*, vol. 50, no. 1 (January 1970): 77-83.
- Thornton, Thomas Perry.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Asia Communist Satellites." *Pacific Affairs*, vol. 35, no. 4 (Winter 1962-63): 341-352.
- Tsedenbal, Iumzhagiin. "Otchetnyi doklad tsentral'nogo komiteta mongol'skoi narodno - revoliutsionnoi partii XIV s'ezd partii." *Kommunist* 11 (Iiul' 1961): 114-155.

- Tsedenbal, Yu. "The Life and Achievements of Comrade Choibalsan." in Urgunge Onon, ed. *Mongolian Hero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AMS Press Inc., 1976.
- Wedlich, Mary Frances. "Mongolia in 1980: A Year of Adjustments and Resolves." *Asian Survey*, vol. 21, no. 1 (January 1981): 63-69.